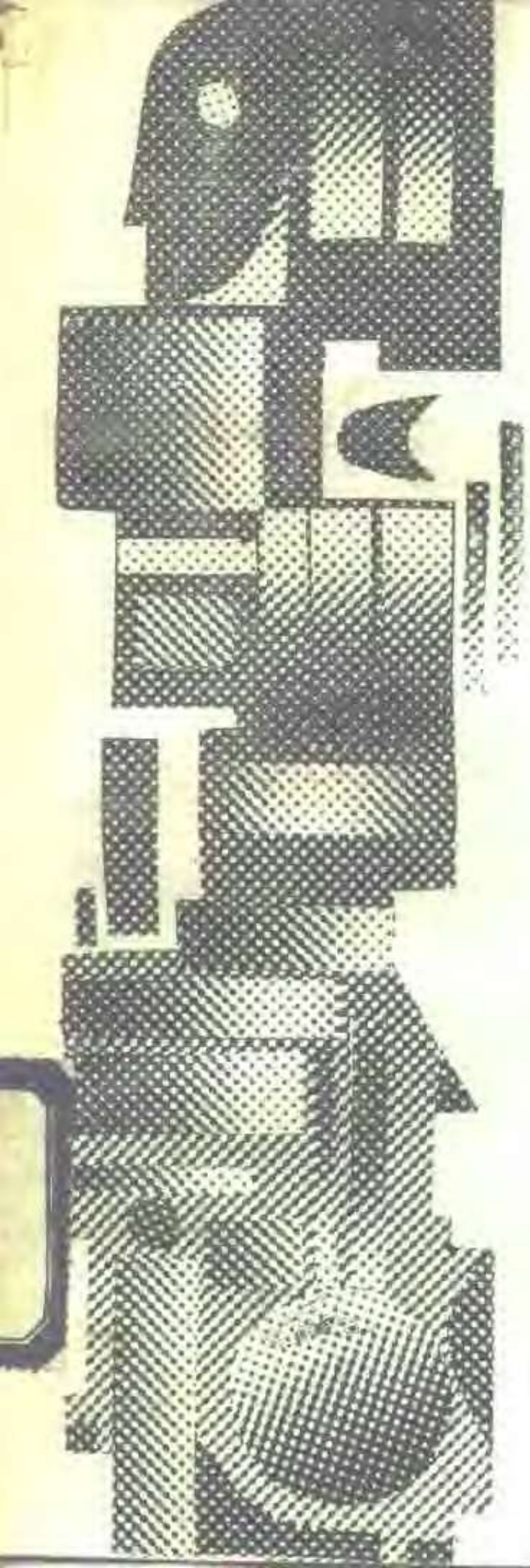


探寻新的模式

VISIT…

探寻新的模式

——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罗首初　万解秋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金　笙
特约编审：黄　鸣
封面设计：张士和
插　　图：刘长顺
装　　帧：盛寄萍

走向未来丛书

探寻新的模式

罗首初　万解秋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30mm 1/32　印张10.25　插页 5　字数145千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0013—8/C·5
统一书号：17118·181　印数：1—112,000

定价：1.83元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

I595/26

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投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投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卷第15页。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导　言

宇宙间现有的万物都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果。

——德谟克利特

人类在一起劳动、交往、生息、繁衍、创造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追求着自己种族的延续和进化。就人类的这一切活动受意识支配而言，历史是人类自己选择的。

可是，人类又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历史，因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承前启后、循序渐进的，就象单履虫不会在指日之间进化为哺乳类一样，人类社会从饮血茹毛的史前时期，一下子飞跃到现代文明社会，也是不可想像的。于是，人类在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既是人类在既有意识指导下奋斗的结果，又制约着人的意识，从而约束人类的选择。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根据自己的意识去行动，又是历史选择的结

果。

不可否认，意识对既定存在的反映，可能滞后，也可能超前。超前的意识虽然作为对今后社会发展方向的预测，会成为人类选择历史的依据，促进人类加快进化的步伐，但却不能使人类历史发生跳跃，这就象滞后的意识不可能把历史拉回到它的起点，但却会延缓社会进步一样。

当前，在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内，经济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这场改革，不是哪个天才人物的异想天开，也不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摹仿效尤，而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在商品经济还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力所必要的生产方式时，它不会寿终正寝，而是要求经济运行组织结构与调节机制与之相适应。否则，生产资源，包括劳动力，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就不能得到合理配置，人类也就难以做到以既定的资源生产出尽可能大量的满足自己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当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不适应商品经济要求时，这一客观规律显示了历史选择的力量——资源配置出现紊乱，这从反面教训人们，从而意识到需要改革，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体制来替代旧体制。并且，正是因为改革是历史的选择，因此，各个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民族素质不同的社

会主义国家，就会有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而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人们，更是用不同的眼光来分析评论社会主义的体制演变。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色俱全的画卷。

现代文明使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的人们的意识，不再封闭于自己民族的生活圈子，而是有可能超越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在全球范围内驰骋，在历史的纵向发展和现实的横向比较中，得到校正、充实、丰富和发展，从而使历史的选择在更广阔和更深远的时空中展开。

中国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样是历史的选择。而这一选择，同样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展开，这就包括需要了解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关于经济体制的理论和改革的实践，甚至了解西方学者的评价。基于这一出发点，我们借助于现代文明，并倾自己的菲薄力量，在此向朋友们展现粗略描绘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与改革实践的绚丽画卷。我们认为，在这个画卷中出现的任何一种场景和色调，无论是理论上的一个有局部意义的提问，有启迪价值的观察角度的开拓，还是实践中有新的方法发现和尝试应用的成功，或是有因循守旧或仓促行事的失败；无论其中掺杂了卓有成效的创新而使人欢欣的

暖色调，还是渗入了改革惨遭失败而令人辛酸的冷色调……对于我们来说，都有分析和研究的必要。

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无论是理论上透彻的揭示，还是实践的完成，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本书并不是做完善的说明和最后的结论，它现在勾勒出的一条历史思考的线索，旨在使人们对现实的改革更有历史感，从而清醒地看到在中国这场民族再生的改革运动中会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有更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从中得到的启迪，将使我们更明智地选择适合于中国的改革道路，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和方法。

中华民族在改革中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每一个中国人在改革中的选择，则将汇合成中华民族的选择。朋友们，在比较和借鉴别国的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想一想吧：我们的选择应该是什么？

目　录

导言…… 1～4

第一章　写在新时代路标上的问号…… 1～32

1-1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模式…… 3

1-2 历史性的论战…… 8

1-3 困惑之中的探索…… 15

1-4 继承者们的回答…… 20

第二章　社会主义可行吗？…… 33～58

2-1 提出问题的背景…… 35

2-2 “魔鬼辩护士”的挑战…… 38

2-3 兰格的答辩词—“社会主义竞争解决”…… 43

2-4 多布—论战的第三方…… 53

第三章　堡垒内部的改革冲击波…… 59～95

3-1 从严冬到解冻…… 61

3-2 理论经济学阵地上的交锋…… 69

3-3 隙缝里长大的数理经济学派…… 78

录

3-4 改革的曲折和新的冲击波…… 87

第四章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奇葩…… 97～125

4-1 斯大林模式的典范作用…… 99

4-2 异军突起……105

4-3 自治理论之花……111

4-4 苦果，酸果，还是甜果？ ……124

第五章 匈牙利：静悄悄的革命……127～162

5-1 沿着自己的历史轨迹……129

5-2 “布达佩斯”学派的回答……133

5-3 分权模式的建立和完善……141

5-4 科尔奈的方法与模式……149

第六章 铁蹄踩踏不了思想之光……163～194

6-1 捷克人的醒悟……165

6-2 “布拉格之春”与改革夭折……171

6-3 锡克模式—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理论尝试……174

6-4 创新与矛盾—锡克模式的实践意义……188

第七章 改革实践的命运多舛和经济学说的群芳并起…… 195～243

7-1 几经波折……197

7-2 波兰的幸运—三位经济学家……210

7-3 布鲁斯模式……223

7-4 完美中的不完美……234

第八章 “可行的社会主义”——比较研究…… 245～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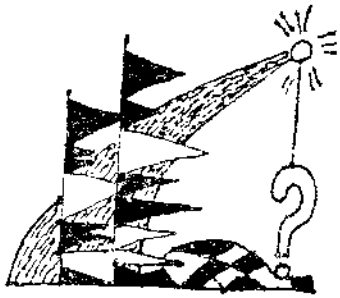
8-1 来自西方的关注—比较研究……247

8-2 “苏联型经济”能使资源配置有效率吗？……252

8-3 伊利里亚……259

8-4 “可行的社会主义”……268

结束语……277～280



第一章
写在新时代路标上的问号

>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
> ——恩格斯

1-1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模式

蒸气机的轰鸣声宣告了产业革命的到来；生产力在十九世纪这次飞跃，为资本统治世界打下了最后一块基石。而与此同时，它又孕育着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

“社会主义”一词，据澳大利亚学者约瑟夫·维京斯基考证，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流行于英国。它的首次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1827年。1924年英国学者D·F·格里菲思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书中披露，不到一个世纪，“社会主义”一词的定

义，已超过二百六十种。事实上，在这期间，社会主义确实走过了不寻常的历程，它已经成为许许多多不同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时髦旗号。

真正通过暴力革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来取代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运动，则是以马克思的学说为理论指导的。投身这一运动的劳动大众，和站在他们一边的知识分子，不仅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产生、运行、发展、灭亡的理论，作为消灭旧社会制度的行动指南，并且把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见，作为自己建设新世界的蓝图。

马克思把未来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出于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没有专门著书立说来对它加以详尽描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只是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偶尔勾画几笔未来社会的轮廓。倘若把分散在他著作中的有关文字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①。在这个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分涌流，分工界限消失，商品货币关系退出历史舞台。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既参加管理，又参加生产劳动，社会劳动有计划按比例分配于每一生产环节，每个人的需要都能满足。而在这种需要中，劳动占第一位。因为它已不再是谋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6页。

生手段，而成为个人表现和发展自己全部体力与脑力的活动。人们既在劳动与其他各种需要的满足中求得个体的自由发展，同时，需要的满足又“失去了利己主义的性质”①，人们在别人享用自己的产品时，得到这样的直接享受：既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要，又意识到它创造了与其他人的物质需要相符合的物品。这样，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也就是个人愿意从事的劳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当然，马克思十分清楚，他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的。因此，这个社会的到来，必然要经过一系列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除了要在资本束缚生产力发展时，适时打碎这一桎梏，还必须经过过渡时期，和一个经济关系在本质上类同于未来社会的初级阶段，来推进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自我改造。在逝世前八年写就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他的上述思想，并描绘了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其一，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其二，个人劳动已经直接地作为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劳动的耗费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商品与货币退出社会经济生活。显然，这是初级阶段类

① 《马恩全集》第42卷，第124页。

似于高级阶段之处。另外，还有两个重大区别，即其三，在社会对其总产品进行必要的再生产和公共消费扣除之后，个人消费品按每个人提供的劳动量进行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其四，它在各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发挥你的想像力，构思一下在上述基本特征约束下的经济运行过程，涌现在你脑海中的将是这样的场景：社会象一座大工厂，各个相对独立的企业已不存在。管理中心根据人们衣、食、住、行和再生产的各种需要，根据各种机器、原材料的性能，根据劳动者的技艺，根据物质变换的客观规律，将生产要素配置于生产各环节。每个人的劳动耗费由管理中心直接尺度，开出证明。劳动者凭借证明领取同度量单位的各种消费品。由此，不难进一步推论，在这样的场合，既要严格实行按劳分配，又要使资源配置最优，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物质基础。因为如果撇开管理机构的素质与主观意志不论，光从客观物质条件来看，首先，社会必须拥有高度灵敏的信息收集、处理、反馈手段，才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生产与需求的一切变化，迅速作出调整机器、劳动力、原材料配置的决策，从而不仅从占有关系方面，而且从物质变换意义上，消除个别劳动与社会总劳动的矛盾，使产品总是能可人心

意。其次，不管生产的物质变换如何日益复杂，产品种类如何地增多，都必须由人体延长了的四肢——机器来完成。人的劳动主要是控制机器，而且趋于同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撇开物质条件差异和劳动方式本身差异，以劳动时间准确计量劳动耗费。从而既使按劳分配丝丝入扣，刺激劳动生产率提高，又可使物质资料耗费得到严格控制。而如果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也就不可能具备上述客观物质条件。难怪马克思及恩格斯多次告诫人们：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能使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成为持久的真正的进步。”也正因为此，当他们在晚期著作中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进程时，既看到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认为在落后国家中，存在无产阶级领导与团结农民参加民主革命，并由此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同时又在指出东方落后国家可通过不同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时，强调了其物质上的条件是享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生产力，强调了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存在这一重要前提，强调了东方革命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补充关系。

1-2 历史性的论战

尽管马克思声明：我所能肯定的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这颗巨星陨落之后，他的学说却被一代又一代寻求人类解放道路的优秀人物奉为真理，当作行动的指南。不同国籍、肤色、民族的马克思学说的信仰者，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阵营。他们在各自国家的历史舞台上活动，努力把马克思的理论转化为实践。

时针指向二十世纪。人类生存的这个星球，此时充满动荡。无限的贪欲，残酷的竞争，象两个不停的车轮，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向前发展。资本垄断、资本输出和直接在海外投资，垄断国际市场，占据落后国家为殖民地，成为剥削的一个个重要手段。然而，这种在被资本统治的国土上无一例外发生的变化，又是以不均衡的状态出现的。它使资本主义列强的统治实力与军事力量对比不断变化。重新瓜分殖民地，分割资本输出和世界市场份额的你争我夺，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已跻身于资本主义列强之中的俄国，当然不可能避免潘朵拉盒中的灾难。然而，作为1861年才废

除农奴制的落后国家，它又有自己特殊的容貌。首先，尽管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但在列强之中，俄国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国。1913年，它的工业产值仅为法国的40%，美国的7%，农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高达57.9%。经济的发展还得依靠外国资本的输入。其次，俄国的资本主义带有明显的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痕迹。在主导产业农业中，村社土地集体所有制尚存一息，地主贵族仍然占有大量土地，并维持着变相的农奴制。工业资本的人格化代表，也有不少同时又是大地主。这一切构成了政治专制制度的重要基础。其三，正因为前两个特点，俄国资本主义借助外国资本，封建势力与专制政权，在未经充分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与西方国家同步跨入垄断阶段。其四，广大劳苦大众受本国资本、外国资本、封建势力与专制政权多重盘剥，反抗意识特别强烈，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由于这四个特点，使俄国在卷入世界大战后，经济状况比西方更恶劣，阶级矛盾比西方更尖锐。全国40%的男子被拉去服役，土地荒芜，食品奇缺。绝大多数企业生产萎顿，倒闭的达四分之一，国家财政赤字与日俱增，同时对外债台高筑，1917年举债额竟达150亿卢布。死去的劳动者得到了解

脱，活着的则无法再忍受日益深重的苦难的煎熬，反抗的烈火在俄罗斯大地上熊熊地燃烧起来。

马克思在俄国的追随者们，自始至终与劳动大众站在同一条战壕中，并逐渐地成长为他们的领路人。这样 怎样实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问题，就被提到了历史的议事日程之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俄国工人政党的多数派领袖列宁认为，鉴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和俄国的特殊国情，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具体的进程，可分为二步。第一步，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通过组织政党，联合农民同盟军，举行武装斗争，来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第二步，建立工农联盟的民主专政政府，而不是资产阶级政府，来取代专制政权，以便使无产阶级能够尽快地走过和结束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迈进。1917年，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开始了把这一战略思想付诸实现的历史新纪元。

要是没有人反对这场革命，倒是不正常的现象。但在自己的阵营中出现反对者，就不得不引人注目了。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伟大

思想家，1856年生于俄国中部乡村的退役上尉家庭。从父亲身上，他学到遵守纪律，独立自主与勤劳；从母亲那里，他继承了热爱知识，正直与善良。然而，他又是家庭的叛逆。在彼得堡求学期间，他开始投身于民粹派反对沙皇政权的活动。1876年在喀山广场作了破釜沉舟的演说之后，成为职业革命家。四年之后，他去国外避难，更多接触到马克思学说，转而成为这一学说的忠实信仰者和热情宣传者。他的许多著作，被列宁誉为必读的经典。1917年的“二月革命”之后，普列汉诺夫结束流亡颠沛回到祖国。在这一年中，他与列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至少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可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而当时俄国不仅吃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发达的苦头。换言之，俄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因此，普列汉诺夫反对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过早跨越民主革命阶段。他恪守马克思的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主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寻求一条经济与政治妥协的道路，一起清除封建专制制度残余，推动生产力发展。在资本已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无产

阶级在俄国居民中占绝大多数，并具有高度阶级觉悟和政治民主意识时，再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

为了使人们接受他的主张，普列汉诺夫不仅一再强调马克思关于经济结构在耗尽它的发展潜能之前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思想，和恩格斯对时机尚未成熟就夺取政权的行为的责难，并多次提出警告：在不具备上述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企图这样做，"所能组织的只是饥饿。"① 因为其一，"既然经济上极端落后的俄国使这些广大的群众暂时还完全不能自觉地和有组织地进行社会主义活动，革命就只能依靠群众性格中那些代表着可悲的黑暗时代和奴隶制时代可悲的遗产的各个方面。而越是向群众性格的这些方面求援，就越是对彼得大帝的改革（指资本主义）的野蛮的反动，这将导致恢复旧制度。"其二，在生产社会化既缺乏客观条件，又未得到群众赞同的情况下，沿着社会主义路线来组织全国生产，那就将"不得不在'家长专制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寻求解放，在这些理想中只作一点改变，即由一个社会主义者阶层代替秘鲁的'太阳之子'和他们

① 普列汉诺夫《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斗争》，《在祖国的一年》中文版第121页。

的官员们，来管理全国的生产，”①这同样将导致“东方专制主义”②的复辟和损害经济发展。其三，工人阶级可以指望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的支持，但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他们并不需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将来当农民得到地主的土地之后，他们的经济活动将不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③因此，工人阶级只能指靠自己，而他们“是少数，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却需要多数”，所以，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④

基于上述思想，普列汉诺夫预言，纵然十月革命胜利，“你们终于会到我们所到的地方去，”⑤即他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妥协必将兑现。

我们提及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论战，绝不是想讨论十月革命是否应该进行这类无意义的话题。十月革命已成史实，它对俄国打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制度和剥削关系，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况且，人们也不可能做一次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俄国和人类历史又将如何重写的试验。事实上，人类历史

①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二卷第81页。

③④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中文版上484页。

⑤ 同上，第288页。

的发展也不是只能循西方模式，也就是非要经由资本主义才能走向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我们提及这场论战，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根据经典著作，资本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代名词，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必须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育乃至衰亡后才能建立，因此，虽然在落后国家进行推翻资本关系的问题上，普列汉诺夫表现出恪守西方模式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在他挑战背后的深层意义，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就是：撇开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后，是否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按马克思的蓝图来重造经济制度并取得成功？如果不成功，又不允许资本主义发展，那么，是否存在能够容纳商品经济，但又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的第三条道路？是否能够创造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马克思蓝图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事实上，本书介绍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沿革，都是围绕着寻求这一潜台词的答案而展开的。

让我们接着看看十月革命之后的历史进程吧！

1-3 困惑之中的探索

事实上，在主张抓住夺权时机的同时，列宁对俄国缺乏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样认识得很清楚。因此，十月革命一胜利，他即把发展生产力提到议事日程首位。

普列汉诺夫挑战的潜台词，现在清晰了。没有教科书，也没有先知先觉，人们只能向现实求教，依靠在“各种各样的尚不完善的具体尝试”① 中寻求答案。

然而当时的现实是：西方十四国联盟进犯苏联；国内反动阶级组织反革命叛乱；不理解革命的人们拒绝为新政权服务，贫困、饥馑、骚乱与死亡的幽灵在困扰人们。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来说，压倒一切的任务变成了：想办法生存下去。要生存下去，本来最重要的发展生产力的任务，现在不得不让位于保卫红色政权的阶级斗争。经济战线的工作目标，就是为在阶级斗争中取胜服务。

这何等艰难的服务！连年战争使苏联濒临几乎是绝对贫困的境地，“一国胜利”又使苏联缺乏有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6页。

力外援。因此，必须集中一切财力与物力，才能保证红军的辎重、人民的面包和社会的安定。可是，资本主义企业与小生产的自由与涣散，却与集中的方针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苏维埃政权只得对国民经济施行严格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制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战时共产主义”。

在肯定战争与贫困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助产婆时，我们也不回避这一事实：缺乏在落后国家发展经济以单独走向社会主义的经验，拘泥于经典著作的某些结论，是“战时共产主义”发育的思想温床。

党的一些领导人，如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以“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名义，提出了直线进入社会主义的主张：“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用“最坚决的社会化”①方法来组织社会生产，取消商品货币关系。这一主张，几乎是一边倒地得到理论界的赞同。研究无货币经济的运行和管理，寻找劳动耗费的直接计量单位，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这方面，首推斯特鲁米林的工作最全面、最详尽。他不仅探讨了劳动耗费计量问题，还从劳动耗费和物质效用两个方面，研究了计划方法问题。

① 《布哈林言论》中文版第71—72页（三联书店出版）。

列宁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之间是存在分歧的。由于认识到俄国经济落后，列宁主张采取一系列在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的特殊方法来发展经济，例如，除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收归国有外，允许国内外私营企业存在，采取由国家对它们实行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以通过“入口”，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列宁没有，也不可能，对两种经济并存的时间长短及其相互间矛盾的演化趋势作出定论，这就难以使反对派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表示信服。此外，“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①在列宁头脑中也是烙印至深，因此，他虽然与“左派”不同，主张在过渡时期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但是，在过渡时期结束，就应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这一点上，他是赞同“左派”观点的。这种既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又把它作为消灭对象的两难观点，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容易为整个社会的实物经济思潮所融合而实际上选择后者。所以，列宁后来承认，“战时共产主义”形成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地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了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112页。

产和产品分配。”①

因此，不仅是客观条件的逼迫，而且还有主观意识的作用，使这一时期的苏联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则”：大工业和商业均国有化；工业企业取消了经济核算，供、产、销均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集中决策；非国有的工艺合作社、手工业等，也受计划严格控制；工业产品全部上交；在农村则实行余粮征集制；国家掌握社会产品的绝大多数，以实物配给方式进行分配。货币活动范围大大缩小，信贷关系日益削弱。

然而，由于生产力十分落后，除了集中计划管理，在主要经济领域中消灭私有制和商品货币外，“战时共产主义”又与马克思的蓝图存在极大差距：供给制是因物资匮乏不得已采用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不是按劳分配，更不是按需分配；劳动者缺乏参加社会与经济管理的文化素质，只好由“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②来做代理人；农村仍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城市中的社会化大生产也仅仅处于发育早期。很明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这里是脱节的，因此，这个经济不可能有效率。1920年，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889页。

苏联农业总产值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下降一半，工业产量仅为战前的七分之一。人们四处奔波，连面包、火柴、食盐、肥皂等生活必需品也难以得到满足。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由于战争破坏。可是，内战结束后，经济也没有复苏的征兆。这充分说明，“战时共产主义”不可能促进经济发展。

“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① 勇于和善于在实践中探索的列宁做出这一结论，并提出要改弦更张，即以“新经济政策”来取代“战时共产主义”。

列宁主张：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使农民可以自由出售余粮而提高生产积极性；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允许国内外资本家租用指定的工厂、矿山、森林和土地，开办国家监督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允许国家调节下的自由贸易和私人商业存在和发展；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不再作强制性计划，鼓励其实行经济核算，提高利润，与私营企业竞争；实行按劳分配，使工人关心物质利益，等等。列宁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所以不用害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相反，它们的发展在无产阶级国家控制下，可以在很多年内逐渐过渡到大规模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社会化经济，使苏联建成社会主义。

不难看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面对苏联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现实，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所需的物质基础；在于面对小生产汪洋大海的现实，通过自愿而不是强制的手段，逐步引导农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这是符合苏联国情的，但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蓝图相比，似乎是一种“倒退”。但是，这种“倒退”的必要性和持久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因此，在列宁还来不及将“新经济政策”全部付诸实践就被病魔夺去生命时，他留给他的继承者们的未竟事业中，包括着这样一个写在新时代路标上的问号：

“新经济政策”仅仅是临时的缓和经济衰竭的短期政策，还是应该在较长时期中起作用的经济体制的基本准则？

1-4 继承者们的回答

“战时共产主义”的中止，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某种程度上的实施，使苏联经济迅速好转。1925年，苏联农业总产值超过战前水平。1926年，整个

国民经济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

或许正因为经济有所好转，列宁的继承者们在如何对待新经济政策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布哈林。关于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下面这些情况是可以肯定的：他具有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深受西方文化熏陶。18岁入党，29岁进入中央委员会；因为在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并且性格随和，曾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全党最喜欢的人物，同时又因为不完全了解辩证法犯过错误，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38年，布哈林被指控为反革命谋杀犯，同年3月15日深夜被处决。

我们并不打算在此讨论布哈林是否无辜，也不打算在此陈述他一生的功过。我们提到布哈林，只是想围绕本书的主题，介绍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作为一个勇于认识错误，同时又有着独立思考精神的经济学家，布哈林在列宁逝世前，就已经摒弃“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左”倾观点，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拥护者。在列宁逝世之后的党内分歧中，布哈林可以说是新经济政策的代言人。

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不仅仅是恢复经济的短期对策，更不是暂时的退却，而是苏联通过“过渡时期”实现工业化的长期背景和基础。其理由

是，无产阶级掌权后，阶级斗争呈逐渐消失趋势，因而可以“渐进地”和“有节制地”，而不是采用镇压手段来发展经济。在此基础上，他勾画了不同于苏联后来实行的中央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新经济政策”模式。

布哈林主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理由是，从长远看，私有经济要取消，但这并不意味着短期内就必须由无所不包的国营经济来取代它；资本家将被消灭，但应当通过效率更高的国营和合作化企业在市场上赢得胜利的办法来实现。对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更不能采取一举压垮的政策，因为它们对工业化起着补充的作用。针对有些人担心资本主义复辟，布哈林指出，只要抓住经济命脉，并鼓励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竞争，就能既促进整个经济发展，又逐步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那种认为无产阶级一掌权，就可以消灭私有制，实现计划经济的想法，倒是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陈腐观念。

根据上述思想，布哈林自然反对用“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不是驼鸟，并不想回避农村中的两极分化。但是，他反对绝对地把农民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认为虽然对农民的分化要采取某种程度控制，但不能简单进行剥夺，而应该采用组织合作社的方法，引导农民自愿走社

会主义道路。

最有创见性的，是布哈林对这一模式的运行与调节，提出了市场与计划结合的意见。他指出，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国家对经济实行过度集中的管理，反而容易导致官僚主义和低效率。计划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它应该只具指导性，并应该适应客观经济比例。市场则不然，它可以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性经济形式。布哈林也承认市场存在盲目性，但他指出，只要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完全可以指导市场，减少其盲目性。他相信，市场可以与计划结合起来，成为过渡时期经济的调节者。在当时市场与计划截然对立观点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布哈林的观点可以说是个突破。

布哈林还对这个模式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反对“速度决定一切”，更反对杀鸡取卵，以剥夺农民的办法来积累建设资金，而是主张通过扩大工农业产品交换来促进生产，在此基础上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使经济在按比例、在计划保持平衡的基础上达到长期的持续增长。他再三呼吁人们放弃置农业、轻工业不顾，强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

在理论界，布哈林不乏支持者，有的人甚至比

他走得更远，例如名不见经传的勒·尤罗夫斯基教授等人。布哈林还仅仅把存在多种经济形式，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看成是过渡时期的模式，勒·尤罗夫斯基在1926年则直接提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后，还存在一个不仅只起过渡作用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时期。它与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不同，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市场起尺度劳动和调节供求的作用，计划则适应商品货币经济运行机制，而不采用管理实物经济的那种集中决策和指令强制的方法。这一观点显然更为“离经叛道”，以致后来教授遭到被起诉的命运。

当然也有人反对布哈林们的意见。从理论方面来说，代表人物是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洛茨基派的首席理论家，也是老资格的党的工作者。富有戏剧性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一度与布哈林一同站在“左倾”战壕里，并合著过《共产主义ABC》一书；三十年代，他同布哈林一样被清洗。而在此时，他却是布哈林的论敌。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当时为了稳定小生产与资本家的情绪，缓和经济上的窘迫而进行的暂时退却。一旦经济恢复，就应该考虑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新经济政策已不适用于后者。一方面，它使占人口五分之四的小农两极分

化，使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日益严重，从而造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无法迅速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因为如果按布哈林的意思，通过扩大工农业产品交换促进生产来增加积累的话，其前提是工业能够提供足够的产品，而当时的工业却因缺乏固定资本更新与扩大资金而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放弃新经济政策，而由国家通过财政、信贷、价格等手段来重新分配国民收入，以剥夺非社会主义经济（包括小农经济）的方式来积累发展工业的资金。这是一箭三雕：一是制止了农村中的两极分化，为农业集体化铺平道路；二是加速了工业化，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条件，其中包括为农业集体化提供技术装备；三是发展了国营工业，使其逐步取代资本主义成分的工商业。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没有忘记为他的主张建立理论依据。在他看来，过渡时期存在着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互不相容的，相互对立的。计划经济的规律，在过渡时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即为了实现工业化，应该自觉剥夺非社会主义经济（包括对农民实行比较温和的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来积累资金，并有意识地把这些资金集中投入工业化的重点发展部门中去。而这种对于建设

社会主义至关紧要的积累，是不可能依靠市场经济得以实现的，因为市场经济的主宰是价值规律，这一规律的作用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它实际上还会起干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作用。因此，当经济恢复之后，应该创造一切条件让原始积累规律起作用，而让价值规律随私有经济的消失而消失。至于对国有经济中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它解释为是“私营经济（市场经济）强加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形式，而不是现象的本质。”

很显然，两派分歧的焦点还在于普列汉诺夫挑战的潜台词：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能否按马克思的模式建立社会主义，还是可以有其他社会主义的模式？这场论战的裁判者是斯大林，裁决的工具不仅是语言，而且是实际行动。列宁逝世后至1927年，他选择了布哈林。在斯大林支持下，1925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大会，是以布哈林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获胜为标志的。但是，此景不长。1927年秋，农村的富裕农民以粮价太低为借口，拒绝交售余粮，给城市工业发展造成了困难。在流通领域中，出现了某些不协调。这时，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首先，他放弃了过去对农民所抱的乐观态度，

认为购粮危机反映了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因此，要通过集体农庄的形式，甚至包括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消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以在集体劳动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其次，他一方面认为农业集体化不一定以工业化为前提，但另一方面又认为集体化要具有实际的社会化生产内容，必须要机械化，这就要求工业迅速发展，首先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这背离了他曾经提出过的以农、轻、重为序发展经济的主张。再次，斯大林也认为布哈林的积累资金的方法行不通，故提出要向农民征收“额外税”、“贡税”来积累加速工业化的资金，并把农业集体化看成是取得“贡税”的重要制度保证。最后，斯大林还主张限制私人贸易，加速工业与商业中的国有化进程。

尽管斯大林声称，他的意见既不同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把新经济政策看做退却，又不同于布哈林等把新经济政策看作长期的战略方针。但实际上，他的主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没有本质区别。这当然要遭到布哈林的反对。他的反对派立场虽然极其温和和谨慎，布哈林还是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他的思想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全盘否定，他本人则被视作富农的代言人。

有不少学者批评斯大林的转变是玩弄权术。在

不了解内幕的情况下，很难断定事实是否如此。不过事实是否如此实质上又并不重要。因为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后来的思想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基础，也就是说，没有斯大林，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表达同样的思想。

苏联革命的目标是实现马克思的未来社会蓝图，建立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不仅是斯大林，而且是绝大多数苏联人，在当时都是就这个蓝图本身来理解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严格地说，这种教条主义又是苏联经济文化落后的必然后果。）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生存，保护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小生产发展，鼓励商品货币关系起作用，必然与革命目标发生矛盾。斯大林批评布哈林忽视来自新经济政策的"右面"——即工业中资本主义经济比重上升，农村两极分化等——的威胁不是没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即使在赞同新经济政策时期，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要比布哈林敏感得多。而且，谁也没有向斯大林提供在国家控制下，既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又不允许其威胁社会主义经济的两全其美的办法。连布哈林也没有。只有理论而无实际对策可以说是布哈林的致命伤。所以，当征粮危机发生时，斯大林判断它是资本主义进攻的信号，为了不偏离

目标，他当仁不让地进行反攻，显然也是合乎逻辑的。也正是为了维护既定目标，党内大多数人才站到了斯大林一边。

斯大林思想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现实——"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的压力与现实的冲突——的要求。一方面，国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国内人民的期待，都迫切要求实现工业化，要求经济高速度增长。另一方面，国内生产力又极落后，农业仍是主导产业，且基本上是小生产，发展工业的财力、物力又极其有限。如果按布哈林的意见行事，工业化进程在初始时期必然进展不会很快，前景也难以预测。因此，对于面临资本主义竞争的苏联，选择借助国家力量强行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当然更在情理之中。

与此同时，苏联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大一统国家集权的民族意识，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机制的不发达，自然经济的根深蒂固，不仅是斯大林模式产生的土壤，又是这一模式得以生存的条件。国家对经济的高度行政管理，不仅能够为社会所接受，而且在经济关系比较简单的条件下，能够取得一定的特殊效果。

在二、三十年代，苏联理论界充斥着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以致于在客观现实距离马克思设想的

未来社会还那么遥远的时候，许多人仍在按图索骥。斯特鲁米林宣称，客观规律已不存在，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已出现。沃兹涅夫斯基则认为，苏联已在向自觉制定经济规律时代迈进。计划经济本质上与市场机制不相容，商品、货币只是在形式上被保留的观点，仍然在理论界占统治地位。连那些根据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肯定过商品货币关系的人，也认为在完成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商品货币关系将消亡。经济学成为政策诠释学。

正因为有上述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基础，斯大林不仅能发动对布哈林等人的批判，而且能够在1929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实施他的主张。在所有制方面，城市中对私人工商业发动了全面进攻；农村中，消灭富农并强制实行集体化；在发展战略上压低劳动者消费水平，强行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经济运行的调节上，建立了采用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实物化经济。企业所需资源由计划机构定量配给，价格由计划机构确定；企业产品由计划确定数量、品种、花色、规格，几乎是无所不包，并带有强制性；产品由计划机构包销，价格也由计划机构确定；计划机构根据多项指标考核企业，决定企业的扩张活动；市场机制仅局

部地在个人消费品分配和劳动者就业领域中起某种程度的作用。就这样，除了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式，企业核算等方面的细微区别外，一个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建立起来了。在社会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的苏联，它显示出自己奇特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农业生产一蹶不振。1933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29年下降23%，以后也长期不景气。工业中因管理不善，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只及设备增长的二分之一。另一方面，财力、物力与人力的高度集中，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西方国家瞠目结舌的增长率。“一五”计划期间年增长率达19.2%，“二五”期间为17.8%，“三五”期间也达到了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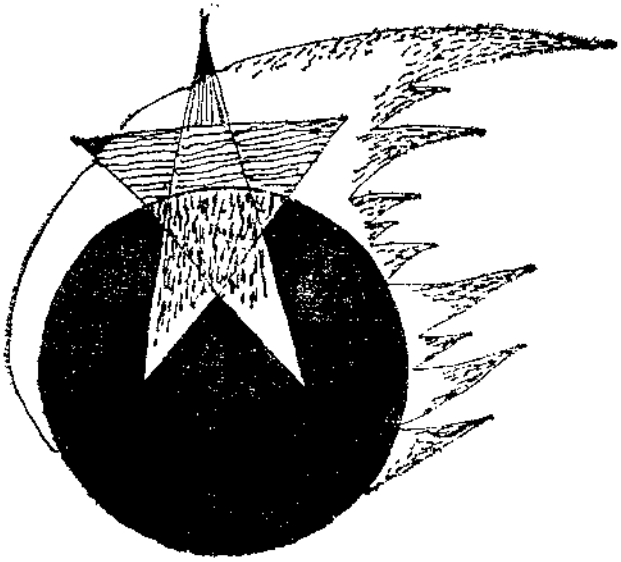
至此为止，似乎可以说，新经济政策之争波打上了句号。普列汉诺夫的置疑也已经得到了回答。斯大林模式的建立，不是足以说明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掌权后，至少可以建立一个在生产关系和经济运行体制的总框架方面类似马克思蓝图，在生产领域中可以不必再借助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经济吗？

正因为此，有许多学者认为它具有历史必然性。例如七十年代初，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

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中就提出，如果没有经过西方殖民者的长期侵略，在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发展起来的东方落后国家，将不经历资本主义盛衰，而由"官僚主义的集体制"，即斯大林模式，再进入马克思设想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观点，似乎与前面提到的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特殊发展道路的推测，又有着相通之处，从而增强了说服力。

然而，事实上历史并没有这么匆忙就给自己下结论。尽管斯大林模式在落后国家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对"原始积累"起了巨大作用。然而，它是否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真的可以不用建立适合商品经济的体制，就能继续推动生产力发展，并实现马克思的蓝图了呢？或言之，斯大林模式是否就能成为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并存，而向马克思蓝图演化的稳定的社会经济体制？

当然只有历史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时至今日，历史的回答是：各个建立过斯大林模式的国家都在图谋变革，寻找着适合本国的商品经济发展的新体制来取代斯大林模式。各国的选择是多色彩的，但却都循着历史前进的内在规律，在不同程度上建立市场调节机制。让我们细细地考察这一变革的发展过程，从中体会一下历史的选择——底色相同但色彩又不同的选择吧！



第二章
社会主义可行吗？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
——达·芬奇

2-1 提出问题的背景

当苏联人在探索寻求通往理想境界的捷径时，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人们，无时不在注视着他们。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资本主义经济风雨飘摇的年代，革命、战争、危机严重地威胁到它的生存和发展。1929年的一个星期五，华尔街的股票突然下跌，谁也没有想到，它竟是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滑向深渊的征兆！由此，整整三年，不景气的阴云笼罩着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谐的美梦彻底破灭。粉饰太平和指引生财之路的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面对现实的挑战陷入了危机。而在同时，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阐述已经变成现实运动，以往被视为异端邪说的社会主义学说，现在已在现实中开花结果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在

地球的一方建立。并带来经济的高度增长，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不能不引起西方经济学各家各派的注意。它的生命力如何？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比，是否有存在的理由？人们想寻找答案，结果引起了三十年代一场有关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大论战。论战一方为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以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与伦敦学派的海耶克、罗宾斯为代表，论战的另一方以美国经济学家泰勒、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以及勒纳为首，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同情者。

有趣的是，这场争论没有发生在苏联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学者之间，却发生在西方经济学者内部，而且论战也没引起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任何重视与科学的分析。

上一章已经谈到，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指导偏重于政治方面与社会革命运动，先哲们一向反对对未来社会的具体状况作出详细的规划，认为许多问题必须由革命实践来解决。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提出了几条原则，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人资本，取消商品交换与货币经济，用自觉的计划控制取代市场机制，消费品按个人的直接劳动量进行分配，这些原则对以后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塑造，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无论是苏联模型，还是我们将在后面介绍的南斯拉夫模型，以及改革后的匈牙利模型等都与这些原则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并且，我们已经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些原则，是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出发构思而成的，它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生活水平，各个不同的民族环境，需要在实践中予以具体化。此外，这些原则还包含了先哲们的某些预测、展望，有些条文在社会、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也需要新的实践的验证。然而在二、三十年代，不仅苏联人，就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也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勾画的蓝图，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既定模型，并以此进行组织构造的推想，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的全部批评正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不过，他们并不把马克思的蓝图视为不可触动的神圣规范。因此，他们更多的是从西方经济学正统的资源配置思想出发，直接剖析马克思的模式，并作出自己的判断的。这和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时期的理论争议中，很大部分精力置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根本性质的认识，以及难以跳出已有框框，从资源配置角度考虑问题，有很大差别。

这一论战的另一重要背景，就是苏联经济发展

的实际状况。在此之前，有关社会主义是否可行的小规模争论，仅以上述的假设为分析对象，争论双方都缺乏实际的经济根据，如以皮尔逊为一方的否定派与巴罗纳为另一方的肯定派都以此立论。然而，在三十年代大论战时，已出现了苏联的实际模型，尤其是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了废除商品货币的高度集中的“命令经济”，给西方经济学提供了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际范例。虽然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调整，但二十年代末的工业化及集体化运动，又很快恢复了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正式定型成“斯大林模式”。可见，战时共产主义模型是当时论战中可以找到的唯一实际根据，它对论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转可行性的全盘否定，正是建立在这一经验根据之上的。而社会主义同情者却往往从福利经济学的命题出发，来建立分析的前提，这种差异在以往未被人们重视，但它对实际结论却有着重要的作用。

2-2 “魔鬼辩护士”的挑战

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这

场论战的始发难者。尽管作为战后的国际联盟奥地利赔偿委员会主任，他常常是公务缠身，但出于维护资本主义，他似乎还是能抽出时间来抨击社会主义。1920年，他发表了《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计算问题》一文，否定了巴罗纳关于社会主义生产部通过解出数百万个联立方程建立均衡的论点，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没有市场价格机制，没有私人财产制度，就不可能对供给、需求和价格进行合理的计算，因而也就不能解决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后来，米塞斯将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系统地归入1936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在1948年又发表了《人类的行动》一书，从信息、刺激的角度对其论点进行了补充说明。

米塞斯认为，为了经济的运转，一个经济必须有一个经济计算的工具。经济计算提供了一种估价，这种估价以现在与未来预期为条件，它使生产者产生选择。当经济估算失败时，资源使用也是无效的。因此，经济计算问题即等价于经济效率问题。经济计算问题作为辨认效率所必需的特征，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同样的意义。他根据对资本主义的经验，认为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中，经济活动超出了人类控制的能力，人们的经济计量往往是建立在对未来的预期之上，而判断这种决策准

确性的唯一途径是市场。市场具有这种判断力，并报之以利润。因而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由市场决定供求均衡和出清价格的过程，是合理的计算过程，它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这种市场活动也只有在私人财产制度下才会产生实际的刺激作用，使其发挥正常的功能，这就是他竭力推崇的企业主制度。

从上述前提出发，米塞斯转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模型，就是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消除了商品、货币与市场交换，实行产品直接配给的实物经济。他的基本思路是：在没有私有财产制度与自由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下，不可能解决资源合理分配问题。他宣称："凡是没有自由市场的地方，就没有确定价格的机构，而没有确定价格的机构，就没有经济计算。"此外，生产资料的交换关系也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离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愈远一步，就使我们同合理经济学的距离愈大一些。"米塞斯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的条件，不可能被社会主义所模拟，因此，他判定巴罗纳的观点，即通过中央计划生产部求解经济行为的线性方程式，来建立均衡的理论假象，是错误的。他作出的结论是，代替"无政府"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将是一种不合理的无意

义的生产。“车轮还是会转动的，但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社会主义缺乏一个正常运转的效率机制，它虽然能够存在，但是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而是不合理的。可见，米塞斯的这种挑战，是从一个极端的立场向社会主义发难，它既出自于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性经验，又来自于对社会主义实际的狭隘理解。他的观点被人称为“魔鬼辩护士”的挑战。

米塞斯的论点，遭到了社会主义同情者的反驳，人们认为米塞斯实际上并不了解帕累托和巴罗纳的基本思想，它的挑战在巴罗纳的论文中，已经作出了实际性的回答。但是，也有人支持米塞斯。其中最著名的是曾做过他的学生，而又青胜于蓝，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海耶克，和以自由主义著称的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罗宾斯。两人并肩作战，进一步发展了米塞斯的思想。他们认为，从理论上可以承认社会主义合理分配资源的可能性，但在实践中它是不可能实现的。按他们的意见，按照帕累托与巴罗纳的逻辑，社会主义计划生产部可以与完全竞争的市场一样，通过求解方程式来获得均衡。然而，这个方法在实际上难以行得通。因为它需要在几百万个预测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根据更多的千百万个数

据，各别计算，还要统计数据，等解出结果，实际经济已变化得面目全非，因此，要建立起真正的经济均衡是不可能的。

在1935年发表的《辩论现状》一文中，海耶克对上述命题提出了两个基本依据，一是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二是经济活动中风险承担的作用。海耶克提出信息问题，作为其否定经济计算实际可能性的依据，其意义在于他指出了中央集中收集、处理信息的困难，而这确实是在当今生产力水平下无法解决的问题，也确实成为斯大林模式对资源配置失误的重要原因。他的批评不无道理。但是，就论战本身而言，他分析问题的前提却是对论战对手的误解。他实际上不了解泰勒在1929年提出的调节规则，即社会主义的计划生产部通过试验错误的方法来求解经济均衡方程。他对中央集中计划困难的估计，是建立在计划必须由中央集中制订的假定之上的，这样，他的结论也必然失之偏颇。他提出的第二个依据是所谓的风险承担问题，当私人财产制度为国有财产制代替时，企业经理对待风险的态度势必改变，他认为国有企业经理不会甘冒风险，因为不存在利益刺激，他必然谨慎从事，唯命是从，使中央的信息与命令失效。从海耶克看到物质刺激与动力问题来说，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他又片面地

将之与私有财产制度相联系，从而得出他偏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辩护性结论，又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

对海耶克与罗宾斯的论点，美国经济学家泰勒在1929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的指导》一文中，实际上已作出回答，这就是最早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试错法理论，而兰格在1936年的论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则对这一问题作了更为全面详细的答复。

2-3 兰格的答辩词——"社会主义竞争解决"

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人能公正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考虑遴选已故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无疑可以金榜题名。这位波兰学者的经济学造诣很深，他在经济理论的许多领地里留下了足迹。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首推从资源配置角度提出社会主义体制多样化思想并塑造"兰格模式"。而这一模式，又是在与米塞斯、海耶克等人的论战之中问世的。当时正在美国等地任教的兰格，对米塞斯、海耶克等

人的挑战作了全面的反驳，他在泰勒调节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计算问题的“竞争解决”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试错法”。

兰格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实物经济模式。他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财产制度，但公有制本身并没有决定消费品分配与就业制度的固定模式，也没有规定指导生产的原则，兰格把消费者偏好的最大满足作为资源配置的根本标准，因而，社会资源使用的最优效率存在于供给与需求的一般均衡之中，这与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竞争的均衡条件是一致的。

兰格提出的这个效率标准，是福利经济学的根本命题。他的目的在于要针锋相对地在同一阵地上与米塞斯见面，这是他论战的力量。

由此，兰格在他的社会主义模式中，首先假定消费品的分配与劳动力就业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但不存在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市场，自然资源与生产资料的价格是一种由中央计划当局确定的“会计价格”，只起选择指数的作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一般均衡与竞争市场一样，是由两个过程决定，即主客均衡与客观均衡。所谓主客均衡，就是指消费者要用既定的收入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下，购

买消费品使其效用达到极大化，劳动者则在劳动市场上争取实现最高收入，而生产企业的经理则要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用最小投入获得最大利润。可见，主观均衡条件就是要使价格定在使供给数量等于需求数量的水平上，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价格起参数作用，从而一般均衡的函数方程很容易被解出。

现在，兰格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均衡条件在一定的原则下同样成立。从主观均衡方面看，消费品有选择自由，价格由供求关系确定，在消费者的收入与消费品价格被客观地决定后，消费品的需求函数也就被确定了，这一点与完全竞争市场是一样的。

而问题是企业的生产决策与目标选择，企业经理决策不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而以中央计划当局规定的准则行事。它包括两条原则：一条原则就是在任何生产规模上，生产要素的组合，在已经确定的价格水平下，使其单位产出品的平均成本达到最低点。第二条原则就是企业经理在确定生产规模时，必须遵循使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的原则，这第二条原则对一个产业部门的经理人员也同样适用。

此外，劳动者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他们把劳动

贡献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企业，工资也由市场供求客观决定，自然资源则由计划当局给出价格。

作为客观均衡条件，要求价格由市场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共同决定，从而形成市场均衡价格，在市场机制下，价格由竞争决定。均衡价格由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然而，在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中，消费品与劳动力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客观均衡显然是可以给定的。而问题是生产资料及自然资源的价格是由中央计划当局给定的，在没有市场供求作用的情况下，这种价格是任意确定的，还是有客观依据的。如果价格是任意给定的，不反映供求水平，从而失去提供其他条件指数的参数意义，那么，客观均衡则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也无从说起。米塞斯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资源合理配置的可能性，海耶克与罗宾斯也认为求出均衡价格要解数百万个方程式，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但是，实际上并不需要中央计划当局去求解数百万个方程式。兰格指出，中央计划局可以起到一个市场的作用，它可以模拟一个客观市场的作用，从而使价格的确定与竞争市场很相似。兰格解释道，中央计划当局可以利用与竞争市场一样的试验错误的办法，来确定均衡价格，在开始时，中央计

划当局可用随机的方法选定一组物价，一般会根据历史上给出的物价作为初始价格，企业经理的一切决策，作为消费者个人的一切决策，以及作为劳动力提供者的决策，都以这些物价为基础，这些共同行动的结果，决定每一种商品供求数量。如果在会计期末，一种商品的需求量不等于供给量，那么就改变这种商品的价格：求过于供，则提高价格，供过于求，就降低价格。这样，中央计划当局根据供求数量的变化，不断地调整价格，最终可逼近均衡价格。可见，中央计划当局实际上起了一个市场的作用，它利用价格参数作用的原理，有意识地调节供求以达到均衡。这种试错法不需要收集和处理全部经济活动的信息，也不需要去求解数百万个方程，这对于计划当局来说，是可以办到的，而企业与消费者也只需要根据既定价格计算自己的均衡位置，这与完全竞争市场没什么两样。

兰格的竞争社会主义模式，既满足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前提——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消灭剥削，又解决了福利经济学提出的难题，从理论上解决了资源最优配置问题。

“竞争解决”回答了经济均衡与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兰格提出了社会主义运行模式的多样化问题，这是对米塞斯挑战的更进一步的

回答。

在社会主义基本框架与资源最优配置（等价于一般均衡）前提不变的条件下，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也可以多样化，可以是较分散的，可以是集中的，也可以介于二者之间。这就是所谓的“试错法的普遍性”。在上文中分析的兰格模式，通常被称为兰格模式Ⅰ，是一个较分散的模式，它具有两重价格体系，三个基本决策层次。消费品与劳动力的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它是真正的市场价格，而生产资料以及其他生产资源的价格则由中央计划当局根据供求数量变化决定，它只是一种选择指数的会计价格，后者不经过市场的实际交易而进入生产领域。在经济活动中，三个基本决策层次为：中央决策主体，企业决策主体与家庭的决策主体。中央计划当局的决策只限于生产资料价格的决定、积累率与红利分配的决定，企业则决定生产的规模、结构、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家庭决策包括对消费品的选择与职业的选择。可见，兰格模式Ⅰ是一个以消费者偏好为向导，以市场为基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并存的分散型社会主义模式。

与此同时，兰格又提出了较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被称为兰格模式Ⅱ。这一模式的两个基本前提不变（公有制与追求资源最优配置），但是，这一

模式里不存在消费者偏好与职业选择自由，资源分配已不遵循消费者偏好导向，除了生产资料与自然资源的会计价格仍由计划决定外，计划当局直接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消费品用配给的方法发放给居民，就业实行计划统一安排，因此，生产不是反映消费者偏好，而只是按计划当局的意图进行。在这种集中模式中，计划当局首先确定自己的偏好函数，如先发展什么，后发展什么，然后确定所有资源与产品的价格，企业经理决策的两条准则不变，中央计划当局根据供求数量调节价格，重复试错过程，追求均衡。但在兰格模式Ⅱ中，配给只限于消费品的分发，而不用于平衡供求，否则价格是任意的，不起参数作用。显然，这是一种集中决策程度很高的体制，如果再往前走一步，所有产品实行全配给；企业经理也不再按上述两条规则行事，而由计划部门直接规定产量指标，并对其实绩进行考核，而中央计划当局确定会计价格的试错过程同样是有效的。那么，它就和战时共产主义的苏联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差别了。

除此而外，兰格还提出了一个介乎上述两者之间的模式Ⅲ，在这个模式里，消费者具有选择自由，消费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但生产与资源配置不受消费者偏好影响，它由中央计划当局制定的

偏好决定。企业经理仍按会计价格决定自己的均衡位置，这样，消费品就出现了两套价格，一套是实际市场价格，一套是计划制定的会计价格，形成了一个双重价格制度。虽然这一模式在兰格看来，实际存在的可能性不大，但社会主义后来的实践却证明它是可以存在的，这是后话。

既然兰格的“竞争解决”模式是由计划模拟市场机制，实行资源分配，那么，这种模式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相比有何优越性呢？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兰格指出，社会主义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劳动者都根据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收入，因而社会收入平等化，可使社会成员的边际效用及其需求价格与其收入水平相适应，而整个社会成员的收入的边际效用曲线相同，则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总之，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避免那种富者一掷千金，贫者无衣无食的不合理现象，使社会总福利极大化。其次，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能更准确地计算外部成本，使社会资源分配更合理化。此外，兰格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由于中央计划决策的作用，可以使达到均衡的时间缩短，减少资源浪费，并可避免资本主义市场中出现的商业循环。

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并不势单力薄。继泰勒、兰

格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勒纳也加入了论战，他在《控制经济学》一书中对兰格模式中的企业行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并对公共财政与对外贸易的作用进行了讨论。此后，兰格提出的“竞争解决”模式，被称为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兰格—勒纳解，是对米塞斯挑战的回答。

兰格的“竞争解决”模式既非无瑕之壁，亦非垂手可摘之果，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从理论上回答了社会主义能否合理分配资源这一点。就是从理论的角度看，也有其历史局限性。首先，中央计划当局所模拟的是一个短期市场，这种供求变化趋势与长期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变化会出现不一致，因此，模拟也会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其次，信息处理过程同样存在困难，中央计划当局要收集全国的供求变化的信息与存货水平，再计算新的价格均衡点，这是个十分复杂的工作，时滞现象将变得十分严重。再次，动力机制也是“竞争解决”模式的一个漏洞，企业经理的决策，信息数据的提供，都必须与刺激机制相配合，这样，各个决策主体才会有动力，运转才能如常进行。

显然，社会主义者不能要求兰格模式去回答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全部问题，它的历史性意义在于给后来者指出了一条新的思路，为社会主义计划局

大厦的建筑奠下一块基石。

遗憾的是，当时的苏联人似乎没有领兰格的情，兰格模式的诞生及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巨大冲击，并没有引起社会主义者的注意。甚至在兰格的祖国波兰，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的很长时间内，对他的模式也置之一边。因为战后按照斯大林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是清一色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这种体制的理论依据，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条文的正统解释。或作另解，或有变通，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修正主义”，更何况于以福利经济学为分析基础的兰格模式，只是碍于不可助长奥地利学派的威风，才没有实行公开讨伐。所以，对兰格模式长期保持沉默，偶尔，在评述经济理论史时，也略假以词色，斥之为腐朽，空想，谬论。然而，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达·芬奇所说“真理是时间的女儿”。正统的苏联模式并没有带来预想的效率结果，进入六十年代后，社会主义各国纷纷实行体制改革，以探索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运行模式，其中，无论是改善计划的效率，还是引进市场机制，国家与企业实行分权，都是兰格模式早就涉及的命题，人们从历史文献中找到了一个崭新的思想。兰格模式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国家、企业、消费者实行分权决策，中央计划当

局根据供求变化调节价格被重新发现。奥斯卡·兰格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学领域里的亚历山大·费莱明。“竞争解决”模式的实践意义虽然比不上盘尼西林对人体抗菌的功能，却也给濒于窒息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注入了一些活力。当然，由于社会科学的检验，比之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手段周期更长，困难更大，半个世纪后，人们认识到兰格模式的价值时，作者早已长辞人世，不可能对其早期思想进行纠正、完善了。但是，兰格终究留给了后人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了。

2-4 多布——论战的第三方

世界往往是多元的，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对立统一，这次大辩论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这两派之外还站着一位“第三者”，他是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他是论战参加者中的唯一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十分有趣的是，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者又认为他是非马克思主义者。

多布理论体系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与理论体系，使他在分析

问题时不是从福利经济学的最根本命题出发，而往往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命题出发。他坚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形成要素，并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因而他反对边际主义分析，在其经济理论中抛弃了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等基本概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平均分析。多布也坚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的市场导致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认为市场机制与私有制条件下的自发性相联系，因而他赞成社会主义实行中央集中控制经济，通过集中计划来安排生产、消费、积累，调节各种比例关系。可见，多布的思想体系已从福利经济学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来了。但是，囿于生活环境，耳濡目染，多布又摆脱不了福利经济学的影响，许多的命题仍然没有跳出福利经济学的圈子。如把社会福利的增加，消费者的满足作为评判效益的社会标准等。因此，多布是一个带着福利经济学印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多布从其理论体系的倾向性出发，大发议论。不过，由于已失去了论战双方共同承认的前提，所以，他的议论对论战双方的基本框架都予以否定。这样，米塞斯的挑战命题被转移了，他们之间无法从同一目标出发，用相同的标准来判断一种经济制度与组织的效率。因此严格地说，多布是论战的第

三方。

在社会资源配置的标准上，多布否定了所谓的最优福利状态。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根据这种福利条件来引导生产与消费，因为这种最优条件事实上并不存在，它仅是理想化的目标，而社会所享有的效用之和比消费者个人的最大满足更为重要。因此，社会主义的经济福利目标则在于追求实际收入与社会消费标准的增加，而集体消费尤其重要，这种标准才是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准则。

在资源配置的方法上，他基本上倾向于计划集中分配，否定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他把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看作是一种腐朽的制度，认为它不断地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周期性危机，因而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资本主义的腐朽基础之上。那么，如何安排社会的生产、消费、积累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呢？多布承认，消费者有利用自己收入获得个人最大满足的倾向，应保持消费品市场及其自由选择；而劳动者也能够根据工资差别选择职业，企业也能选择合理的生产方法，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收入分配仍通过货币形式而不是配给。但是这些经济过程已不是由价格参数调节，也不是通过中央计划模拟竞争市场来实现，而是由中央计划部门直接根据其掌握的情况及其居民消费，

经济增长等既定目标加以决定。中央计划当局也不需要象海耶克与罗宾斯提出的那样，去收集所有的供求信息，去求解几百万个方程式，以确定产品的边际值，它可以根据掌握的一般资料直接决定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生产比例，而留给企业做的，只是安排短期生产，选择投入品和雇用劳动力，并决定产品的式样等。在社会主义的消费方面，多布十分推崇集体消费，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消费者的偏好也会改变，认为集体消费能增加社会总的经济福利。由于工资是就业的选择指数，具有客观差别，为了使实际收入平等化，多布主张利用价格来调节实际收入差别，通过高价或低价来体现计划抑制与补助政策，这种产品价格为纯粹的收入再分配工具，具有任意性。

多布的思想体系，表明了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源配置的标准已不取决于福利经济学的经济效率，市场机制退出历史舞台，消费者偏好对生产没有引导作用，生产、投资、积累与部分消费的决策权集中化。这种模式与兰格的竞争社会主义模式有很大不同，它更大程度上与行政直接控制的实物经济模式，即苏联模式相类似。事实上，多布正是从前人已有的理论结论出发，以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模式与后来的斯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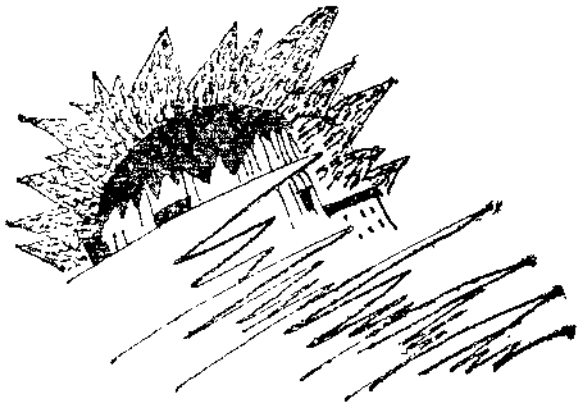
林模式为背景，与其他人展开论战。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直接否定了米塞斯的论点，又间接地批评了兰格—勒纳的“竞争解决”模式。因此，从三十年代的大论战看，多布乃是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捍卫者。

要挑出多布理论模式的缺陷似乎并不困难。它没有从根本上回答米塞斯的挑战，资源配置的标准问题是含混不清的，中央集中计划的行政命令不可能使经济运转达到他所描述的那样和谐，这已为苏联模式运转的实践所证实。后来，多布自己也渐渐倾向于改变自己的初衷，在七十年代初他提出了一个计划与市场共同作用的具有一定分散性的模式，以寻求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现实可行性。

尽管如此，多布作为第三方，却也在论战中对前两方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批评。第一是市场稳定性问题，认为市场本身具有自发波动的不稳定性，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而中央计划模拟市场没有避免这种波动的可能性，第二是提出了市场的外部效果问题。这些论点都可以说是多布对论战的贡献。

大约到了三十年代末，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讨论逐渐平息。但是社会主义是否可行，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可行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当然毫不奇怪，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现实.

才能在最后对这些问题作出确实的回答。五十年代以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构成了这一历史答卷中的重要部分。



第三章
堡垒内部的改革冲击波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歌德

3-1 从严冬到解冻

不管西方学者怎样品头评足，更不管资产阶级怎样攻击辱骂，苏联人不屑一顾，充满信心地走自己的路。经过三十多年的惨淡经营，尽管中间几经波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斯大林模式还是站稳了脚跟，并显示出了它的独特作用——以高积累和重点选择，使经济实现了高速稳定增长，赢得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奠定了作为社会主义堡垒的物质基础。1950年，苏联的社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17.2倍，其中工业产值增加了12倍。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增加高达26倍，社会国民收入总额也增长了7.8倍。

但是，随着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到了按自身逻辑要求广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但又达不到马克

思蓝图的水平时，斯大林模式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普列汉诺夫的潜台词又一次提了出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苏联发生了要求容纳商品生产的体制改革。

首先，生产力低下使计划机构不可能准确尺度各种各样不同形式与内容的实际劳动耗费，只好采取等级工资制，按劳动者潜在劳动能力支付劳动报酬。而一个人实际的劳动耗费不一定是潜在劳动能力的全部发挥，这样的按劳分配，变相承认了劳动报酬与实际劳动耗费脱节的合理性，在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的时代，显然不利于提高劳动积极性。苏联经济学家也承认这一点。在斯大林模式创立时期，这种流于形式的按劳分配，和高积累导致的低生活水平，似乎不影响人民的勤奋，其间重要的原因，是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起了调节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时期的革命理想与英雄主义，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新一代人之中逐渐淡漠，依靠精神鼓励、思想工作和纪律约束来提高劳动积极性的做法，效应逐步降低。这时，早先被精神调节掩盖的分配方式的弊病，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它最集中地表现为劳动生产率低下，和其变化速率的逐渐减慢。1954年至1959年，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4%，比战后

初期下降。进入六十年代后，除了1965年改革后稍有上升外，总的提高速度趋于下降，1981年为2.7%，1982年为2.1%。

其次，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剥夺了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应有的权力与利益。企业供、产、销活动全部按主管部门的计划指令进行，投入产出价格由国家确定，盈亏也由国家统起来。对工人来说，企业盈亏不影响个人收入，生产中又只能听从作为国家代理人的经理人员的指挥，故不关心企业的经济效益。对经理人员来说，企业盈亏同样不直接影响个人收入，但指标的完成与否却影响自己的“形象”和前途，因此，他们把完成指标视为己责。由于完成指标有两条基本途径，其中提高企业既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利用率难度较大，而向主管部门索取更多的劳动力或生产资料，或取得“软”指标则相对容易些，他们倾向于隐瞒企业实际生产能力，并以完成指标为条件，向主管部门讨价还价，要求追加劳动力或生产资料。这一方面造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企业内部的闲置和浪费，造成企业产品质量低劣，技术与产品创新缓慢，另一方面又使计划机构得不到企业经济活动的准确信息，以致计划屡屡失误。

再次，经济活动事无巨细均由计划来决定，它

的正常运行就要求计划机构能够准确地获得来自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中的各种信息，把握无数种产品在物质变换中的客观规律，从而根据这些规律处理信息，对生产资料与劳动力配置作出调节性反馈。同时，还要求计划机构能够服从公众的偏好来选择经济发展目标。然而，在经济欠发达时，计划机关缺乏高度灵敏的信息传递处理技术与设备，计划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也不高，这就很难保证计划失误不超出经济能承受的限度。经济的不发达还使整个民族的政治与文化素养不高，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实际上只能由国家机构人员来承担。人人有能力参加管理尚是遥远的事，人人有能力监督国家机构做“公仆”，也为时尚早，这样，经济发展目标偏离公众偏好，服从长官意志，以致导致计划失误，官僚主义盛行。在斯大林模式建立初期，社会生产规模比较小，生产门类划分简单，产品种类也较少，上述问题还不是很突出。随着生产规模扩张，门类划分细化，投入产出关系日益复杂，物质变换规律日益多变，经济信息因此呈几何级数增长，传递和处理难度提高，计划机构也因此膨胀和多层次化，信息传递更为扭曲，官僚主义更为滋长。这样，因缺乏信息处理的技术条件和发展战略的社会约束，计划失误的概率就更高。

上述矛盾导致的经济运行结果，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比例失调日趋严重，经济效果每况愈下。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剥夺农民强制积累的发展战略得不到纠正，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1953年，在工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20.43倍的同时，农业产值同期只增加0.46倍，并且这一增长主要发生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斯大林模式建立后，尽管农业投资份额从来没低过10%，生产却长期徘徊不前。轻工业的发展也极其缓慢，长期以来，投资比重只占5%，最高不超过7%。1953年与1913年比，生产资料生产增长45.46倍，消费品生产只增长7.85倍。农业、轻工业的落后，不仅因投入产出关系直接阻碍重工业进一步发展，还和高积累一起作用，阻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正常提高，以致在低收入的条件下，消费品仍然匮乏。五十年代初，苏联已拥有原子弹，钢铁、电子、机器产量名列世界前茅，但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产量却微乎其微，甚至连鞋袜这样的必需品也供不应求，排队、抢购、配给已是日常生活的三部曲。这势必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影响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为了缓解这一局面，就必须增加消费，压缩积累，结果势必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减速。与此同时，体制中缺乏创新机制，却有资源"饥饿"症，结果必然是经济效益低

下。虽然在航天、原子能等领域中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从整体上与西方国家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相比，苏联在技术方面落后了20——30年。1950年至1962年，法国经济增长70%来源于技术进步，意大利和挪威这一指标分别为78%和79%，苏联则只有42%。同一时期，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比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慢40%，而西方国家除英国外，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均超过固定资产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之比，西方国家也比苏联高得多。在苏联，原材料、能源方面的浪费更为严重，苏联加工业的金属利用率，比西方国家低25%；按国民收入计算，黑色金属消耗比美国高50%。至于产品质量低劣等，更是经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尽管苏联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几乎全部战略资源和工业原料均能自给的唯一大国，经济效益低下使它也难逃资源短缺的厄运，尤其是再生能力低或周期长的资源供给，更是日趋紧张，如劳动力等，已经成为卡住国民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

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经济中的各种矛盾加剧，终于无法再按粗放的方式维持原有的增长速度。严峻的现实，迫使人们开始考虑：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是否可行？它所包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矛盾，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冲突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斯大林逝世后的解冻时期，人们吹响了改革的号角。赫鲁晓夫执政后，随着斯大林家长制作风被批判，随着许多冤假错案的平反，思想解放的春风也吹进了死气沉沉的思想理论界。从个人迷信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人们，终于开始从堡垒内部冲击斯大林模式，迈出了理论上破旧立新的第一步。

这是至关紧要的第一步。斯大林模式有自己的理论依据——这就是以高积累促进工业高速增长的理论和实物经济理论。尽管从三十年代经济理论界起，它们有所变化。但直到五十年代，也只不过承认了集体农庄与国营工业之间，因所有制差别存在商品关系。国营企业之间交换的生产资料，依旧被视作是仅仅具有“外壳”的商品，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也被局限于流通领域。因此，与西方学者三十年代大辩论时无思想束缚而直接点题不同，苏联人只有从反思中清算了与现存体制共生的理论与观念，才能坚定改革的信念和明确改革的方向，才能够去批判旧模式，构思和建造新模式。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在当时，最令人心烦的是经济增长率降低，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率。提高效率又要求加强经济

核算与物质刺激，提高计划的科学性，这就必然涉及价格形成，利润分配，社会供求比例计算与资源配置调节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归结为应该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和怎样看待价值规律的作用。因此，清算实物经济观念，调整对商品货币关系，对市场作用的认识，又成为整个经济理论更新和体制再造的突破口。

以1956年7月全苏集体农庄产品成本和拖拉机站生产费用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为序幕，理论界开始旷日持久的广泛讨论。到五十年代末，瓦·吉雅钦科等人从社会分工和劳动是谋生手段角度，引伸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个别劳动或集体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又只能通过等价的商品交换这一结论，并在证明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必然性的同时，分析了它的各种矛盾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殊性。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两种公有制形式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以及商品外壳论，基本上被唾弃。价值规律不仅在流通领域，并且在生产中也起调节作用的说法，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在理论界从冬眠中复苏，开始经济学的更新时，实际变革同时在生活中展开。赫鲁晓夫想通过地区管理代替部门管理，来解决经济管理过分集

中、各部门本位主义严重、地方和企业缺乏权力与利益等问题，并加强了对农业的开发和轻工业的投资。但是，由于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周密的实施计划，由于改革只涉及工业管理权限在地区与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而未能触动行政管理的根本痼疾，这次改革以加剧国民经济的功能失调而告终。

然而，第一步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后面还会有第二步、第三步。尽管解冻初期的理论讨论，只冲击了传统经济观念坚果的表皮；改革的实践，也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但它毕竟破除了原有体制与经济观念不可触动的神话，为今后的理论更新和体制变革开辟了道路。

3-2 理论经济学阵地上的交锋

随着从劳改营、流放地回来的许多著名专家的介入，随着更多的新一代学者的崛起，学术的继续开放，必然使理论经济学阵地上的交锋愈演愈烈。其结果，必然是理论观点的多元化。在苏联围绕着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质的认识，和改革目标模式选择，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

第一种观点，开始抛弃过去那种经院式的研究

方式，转而到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理论的源头。

首先，在肯定吉雅饮科的社会主义商品论，肯定价值规律对生产起调节作用的基础上，他们确认现阶段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商品生产。利西奇金在其1966年2月27日发表的名作《生活提出修正》一文中，对三种陈旧的妨碍社会主义经济学顺利发展的观点——（一）用所有制的两种形式来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商品关系；（二）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不是生产的调节者；（三）否认劳动性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中的辩证的矛盾关系①——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利西奇金强调说，要纠正比例失调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调节标准，就象开关阀门那样能自动地把资金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这个自动阀门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生产价格②。列·列昂节夫则宣称：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应该把商品生产及其固有的商品、货币关系——价格、货币、利润、信贷等——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本质方面。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同一切经济关系有着合理化的有机联

① 利西奇金：《计划与市场》莫斯科1966年俄文版。
② 同上。

系，社会主义价值关系的发展为将来过渡到完全共产主义制度所必要的经济计算，准备着必要的条件①。

从上述理论前提出发，他们鞭笞了把市场与计划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利西奇金指出，计划如果脱离市场，它就失去了计划指标所由产生的生气勃勃的源泉。因为计划不可能直接确定社会需要，一种商品的需要程度的最终评价要由市场来做出②。他们的结论是：市场的作用是第一位的。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持上述看法，他们对旧模式的批评最为激烈，提出的改革方案也最为彻底。

1962年9月9日，叶·利别尔曼在《真理报》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一文，对经济改革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建议：重新建造整个计划工作制度，扩大企业在编制生产计划和使用奖励基金方面的权限；奖金与盈利指标直接挂钩；增加制定新产品价格的灵活性等等。这一建议引起理论界一部分人的共鸣，并受到党的首脑赫鲁晓夫的支持和赞

① 列昂节夫：《经济改革和经济理论的某些问题》，《苏联"经济改革"文集》三联书店版1975年版第256页；《评马雷舍夫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重要问题》〔苏〕《新世界》1967年第1期。

② 利西奇金：《计划与市场》莫斯科1966年俄文版。

赏①。一夜之间，这位不起眼的哈尔科夫工程学院机器制造工业经济组织教研室主任，变成了举国瞩目的改革明星。在此后，他的荣辱浮沉，成为苏联改革、甚至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演变的温度计。

继利别尔曼之后，利西奇金，毕尔曼，马雷舍夫，β·卡申等人也相继发表了与他类似的改革建议。利西奇金提出，应该让企业自由选择经营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计划机关则通过运用价格、信贷、税收等经济杠杆，使企业不知不觉地沿着计划拟定的总的方向前进②。毕尔曼则认为，虽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比例，各部门的增长速度，仍然是直接的集中计划对象，但国家应该放弃给每个企业详尽地规定产品品种，费用结构，而应该通过计划价格、信贷等来鼓励企业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③。

概括持第一种观点者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已初步自成一体的新体制模式。有人称它为“利别尔曼——利西奇金模式”。其基本框架是：

① 〔苏〕《真理报》1962年11月20日。

② 利西奇金：《过了两年》，〔苏〕《新世界》1967年第2期。

③ 毕尔曼：《竞赛还是竞争》，〔苏〕《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8年第6期。

（一）在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前提下重建整个计划制度，计划着重国民经济的总量和结构变动，用经济杠杆引导企业活动符合宏观计划的要求。缩小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自主权，并允许和鼓励企业间的竞争①。（二）把利润指标看作解决问题的关键，使奖金与盈利指标挂钩，以此刺激企业增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节约成本，提高质量。

有些西方学者在评论这一模式时，强调新经济政策对它的启迪作用。从发展商品生产，利用市场机制的角度看，似乎不无道理，这也又一次证明了商品生产在其充分发展前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它总是三番五次地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然而，不能因此忽略两个模式因历史背景不同而存在的差异。新经济政策是过渡时期的产物，多种所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是已存在的现实，因此，它比较完整，并具有较强的可实践性。利别尔曼—利西奇金模式是在生产资料已全部公有，商品、货币关系基本被否定，生产力水平与结构也与几十年前迥然不同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因此，它就显得更为粗糙和不周全。

① 拉基茨基：《经济核算的教训》，〔苏〕《共青团真理报》1966年10月9日。

首先，由于缺乏对经济的现实运行机制的解剖，缺乏对资源配置理论与实践的深刻理解，改革者提出的市场与计划结合，还只是空泛的一般议论。他们没有考虑计划与市场共存带来的资源配置标准和决策双重化之间的矛盾，自然也不会设计出相对的对策，更提不出如何有计划控制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动，又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微观投入与产出决策的具体方案。其次，由于同样原因，持第一种观点者没能充分考虑新旧模式转换的具体步骤和操作手段，例如怎样调整价格，改组银行，开放资金市场等，逐步为新体制运行创造环境和条件。再次，由于同样原因，他们过多肯定市场机制调节微观经济活动的好处，而缺乏从实践角度直面它的弊病，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及对策。这一点难免被正统派抓住辫子，成为“市场社会主义”一大证据。再次，也是最重要的，由于同样原因，他们对所有制变革在模式更替中的举足轻重作用，缺乏足够认识，因此他们也就难以预见到，由于国有制下企业无经营风险，没有积累的财产动机，又得不到完全的财产支配权，结果不仅会使市场调节失灵，还会导致消费和投资的膨胀。当然，他们更不可能提出相应的对策。

然而，指出“利别尔曼—利西奇金模式”的缺

陷，绝不等于否认他们的功绩。相反，他们的根本立足点和方向都是应该肯定的。他们的模式存在缺陷，也有其客观原因：当时的苏联，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仍有很大势力，传统理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未得到根本触动，因此不可能对经济现实作全面的分析，再来构造改革的模式。再加上这一模式没有得到实际运行机会，也就无法得到来自生活的校正与充实。从这一方面看，他们的不利条件比新经济政策时期更多，所以，说他们有胆有识，或许并不是过誉之词。

同第一种观点持相反见解的第二种观点的人，根本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他们只看经典无视现实，认为商品生产只能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是直接社会生产，因而不可能是商品生产。如果说存在价格、货币等，那也是旧社会的痕迹①。从这一点出发，第二种观点认定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不相容，强调调节经济活动的应该是有计划发展规律②。

① 赫辛等人的发言。原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律规及其作用》，莫斯科1959年俄文版，第56、63页，第172页。

② 查果洛夫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程》两卷本“社会主义部分”。莫斯科经济出版社1970年俄文版第256页。

以这些理论为基础，他们主张维持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认为不宜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第三种观点的人数众多，受官方支持，并在六十年代末期后基本上一统苏联经济理论界。

他们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但又反对利西奇金等人“夸大”商品货币关系作用的观点。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是直接社会生产，计划具有普遍意义，商品生产只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从属不是板块式地嵌在直接社会性生产之中，而是“既此亦彼”，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既是直接社会关系，又是商品货币关系，前者是主导，后者是从属，二者对立统一①。为此，他们反对把社会主义生产称为“商品生产”。

根据这一基本认识，虽然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者上存在分歧，如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等等。但大多数人还是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起调节作用。然而，有别于第一种观点把价值规律视作主要调节者，他们仅仅是在把价值规律视作经济规律体系中的一个成员的条件下，才承认它对生产的调节作用的。因此，他们强

① 鲁米扬采夫、哈恰图洛夫：《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与商品生产》（苏）《真理报》1968年8月4日。

调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并对第一种观点以比较隐晦的语言提出展开企业竞争的主张进行种种非难。

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他们也同意第一种观点的互补与统一的观点。但是为了两者地位的孰重孰轻，孰主孰从，他们又与持第一种观点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后者强调市场作用，他们强调计划唯上，市场应从属计划，应作计划的补充。后者主张减少指令性指标，他们则认为计划丧失指令性，就等于丧失社会主义性质而与资本主义计划无差异①。

综上所述，人们也就不难想象持第三种观点者对利别尔曼——利西奇金模式的否定态度。他们指摘利别尔曼建议将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破坏，主张在基本维持原有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调整管理机构，完善计划手段，提高计划质量，加强对企业和工人的物质刺激等。

时至今日可以说，第三种观点对推进苏联体制改革也起过促进作用，尤其是在改革实施前，他们至少承认了社会主义生产具有商品性的一面；承认了价值规律对生产的“有限”调节作用；承认了市

① 鲁米扬采夫的文章：《真理报》1968年8月4日，《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选集》第2卷，1973年俄文版第530页，等。

场与计划并不绝然对立；承认了采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和物质刺激的必要性。他们构成了冲破旧观念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理论大军。

但是，比起第一种观点来，他们的光彩又黯淡了许多。他们更多沿袭了经院式的研究方法，更缺乏对现实的感受、洞察与剖析，更拘泥于经典。这就使他们的理论自相矛盾和不彻底。他们肯定直接社会性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也就是说，产品直接按社会需要生产，没有是否为消费者接受——即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问题。然而，面对堆积如山的滞销品，他们又不得不把商品性从后门放进来，以说明产销脱节，个别劳动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这一现实。事实上，后者显然与生产的直接社会性不相容，强行将二者统一为一体，不过是对辩证法的拙劣玩弄。对社会主义生产性质的认识的矛盾，使他们对其他问题也无法自圆其说。

3-3 隙缝里长大的数理经济学派

完全有必要把眼光转向实力雄厚的数理经济学派。他们和理论经济学者不同，基本上是直接进入资源配置数量关系的研究，然后才涉及经济体制问

论与实际的变革的。时至今日，他们已经蜚声苏联国内外，在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中均居重要席位。然而想当年，他们却好似伊壁鸠鲁的神，只能在隙缝里生长和壮大。

早在二十年代，已有学者将数学领进经济学的天地。时格罗曼、瓦恩斯坦、费尔德曼等人对经济结构变化的研究，以及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和消费模型的尝试，都已达到一定水平。尤什科夫提出的实现经济机制“半自动最优化”的建议，尤具吸引力。数理经济学的瓦·涅姆钦诺夫、列·康德罗维奇、维·诺沃日诺夫、尼·费多连科等大师在苏联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瓦·涅姆钦诺夫，统计学家出身，苏联科学院院士，是五十年代末推动苏联经济学走向复兴的卓越人物之一。他在兰格影响下，为投入产出分析和线性规划平了反，肯定了康德罗维奇等人的研究方向，在政治、组织和理论上为数理经济学发展创造了条件，并积极投身于这一学科的研究。另一方面，他参加了理论经济学领域中批判实物经济的论战。在此基础上，涅姆钦诺夫努力探求一种新体制——“实行成本核算的计划体制”，也有人称之为“涅姆钦诺夫模式”。其核心思想是，在坚持计划性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来改善管理制度。他主

张：（一）尽可能减少中央计划指标。（二）计划管理不应依靠行政命令，而应依靠经济动因与立法约束，其中对企业实行若干年有效的盈利定额和物质奖励定额，扩大企业权限，取消对企业细微末节的监督，是构成新的计划管理制度的关键①。（三）以财政和银行体系为基础，形成一个新的信息与管理网络。不幸的是，涅姆钦诺夫病逝于1964年，来不及详尽地说明他的模式的细节。但是他与理论经济学领域中的改革派站在一起，主张引进竞争与市场机制，给企业更大的权力和利益的思路，是清晰的。利别尔曼——利西奇金和奥塔·锡克模式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受涅姆钦诺夫思想的启迪。

与涅姆钦诺夫不同，其他人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完善资源配置的方法，而不是直接卷入理论论战漩涡。他们中最杰出的人物是康德罗维奇。这位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1912年生于彼得堡，大脑皮层中计数部份异常发达，以至十四岁即考入列宁格勒大学数学系，22岁荣膺教授，次年未经论文答辩即获数学博士学位。1938年，年仅26岁的康德罗维奇提出一种解线性规划的有效方法——解乘数法，对现代应

① 涅姆钦诺夫：《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和经济管理问题》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

用数学作出首创性贡献。此后，他致力于线性规划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1954年遴选为科学院院士。

临近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康德罗维奇在《资源最优利用的经济核算》一书中，率先批评按部门平均成本规定价格的传统作法，提出必须从资源的有限性出发，利用线性规划，求解资源的最佳分配方案，并以此为基础，构成国民经济最优计划。

康德罗维奇指出，最优计划的整体标准，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因此，线性规划所要研究的是下面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有了一定量的若干资源，要求规划解决如何最合理地作出对各种产品的客观制约评价，以使这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而使产品总量达到极大。所谓对产品的客观制约评价，是指最优计划下每种产品所必然耗费的总劳动量。它由耗费的生产资料所含的物化劳动和新加入的劳动耗费构成，后者又称为对净产品的评价。如以价值形态表现之，对产品的客观制约估价也可称为产品价值。合理的资源配置目标，也就是使总产值达到极大。最优计划的数学模型为：

$$\text{目标函数：} \max Z = \sum_{j=1}^{n} c_j x_j \qquad (1)$$

$$(j=1, 2, \cdots\cdots n)$$

$$(j=1, 2, \cdots\cdots m)$$

约束条件：$$\sum_{j=1}^{n} a_{ij}x_j \leqslant b_i \qquad (2)$$

$$x_j \geqslant 0 \qquad (3)$$

(b_i = 给定的m种资源的数量

c_j = 对n种产品中各种产品客观制约评价

a_{ij} = 每单位第 j 种产品所耗费的第 i 种资源的定额，也称技术系数

x_j = 各种产品的数量)

这个数学模型的最优解 x_j，即为各种产品生产的最优计划。将解分别代入（2）式，即可求得各种资源应有的最优配置方案。

然而，上述最优生产计划没有考虑各类资源在不同组合下的消耗结构的变化会对生产有不同制约作用，因此，还有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必须考虑从已确定生产任务出发，以线性规划解决如何最合理地对各种资源作出客观制约评价，以用最小资源耗费量实现生产任务。康德罗维奇把对资源的评价，规定为在最优计划下节约一个单位的某种资源所需多耗费的劳动量，或反言之，多使用一个单位的某种资源所能节约的劳动量，简称为"间接劳动耗费"。

用数学模型表达这一思想为：

目标函数：$\min V=\sum_{i=1}^{m} b_i v_i$ （1）

约束条件：$\sum_{i=1}^{m} a_{ji} v_i \geqslant c_j$ （2）

（$j=1, 2, \cdots\cdots n$）

$v_i \geqslant 0$ （$i=1, 2\cdots\cdots, m$）（3）

（v_i = 对m种资源中的各种资源的客观制约评价

$V_i>0$ —— 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后恰好用尽，其客观制约评价又大于零，表示这一资源具有稀缺性。v_i 越高，资源稀缺程度越高。如果 $v_i=0$，则表示i种资源没有稀缺性。

a_{ji} = 每单位第i种资源所能用于第 j 种产品的数量）

这个数学模型的最优解v_i，就是从最优生产任务出发对各种资源的客观评价体系。

从数学上看，这两个模型具有对偶性。它的经济意义是，对产品的估价和对资源的估价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关系。因此，第一，最优计划是使包括使用资源的“间接劳动耗费”包括在内的生产耗费资源的评价，小于或等于对产品的评价。换言之，生产耗费资源，即成本，不仅包括生产资料价值和工资，还应包括对资源的客观制约评价。最优计划使这样核算的成本，小于或等于产品的价值——即对

产品的估价。第二，已知产品的评价，可以计算对资源的评价，又可以确定对产品的评价。

根据上述关系，康德罗维奇主张用上述对偶线性规划方法，来制定生产与资源配置计划，主张按客观制约评价的比例，来确定产品或资源的批发价，以使资源使用最有效。其理由是，过去按平均成本定价，不考虑稀缺资源的“间接劳动耗费”，结果使资源价格偏低，人们竞相争用和浪费资源。现在在定价中加入“间接劳动耗费”，使越短缺的资源价格越高，企业从最大盈利出发，会考虑节约与替代。其二，资源的客观制约评价，以对产品的评价为前提；包括对资源评价的资源价格，又会通过作为产品的物质耗费，向产品价格传递资源评价因素，从而修正对生产任务的安排。在计算过程中，它们的相互制约是同时发生的，因此，通过解乘数 λ，就可能同时找到最优的生产安排及资源配置计划，使产出更大，消耗更小。

从上述想法出发，康德罗维奇提出了他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那就是，中央计划机构只需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和总的生产任务，灵活地确定和下达各种资源和产品的客观制约价格指标。企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同样会按这些价格来确定对己最为有利的生产方法，以求投入最小产出最大。这样，企业

的分散决策就能与整个社会的资源平衡和总的生产目标协调一致。虽然这一模式忽视了如何建立企业行为的利益动机和解决信息处理的技术困难等问题，但就让企业自己作生产决策而言，已突破传统模式的框架。

为了与西方学者的“影子价格”学说划清界限，康德罗维奇小心翼翼地回避供求关系，力图用劳动价值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然而，这仍然掀起了轩然大波，日本学者说其程度不亚于凯恩斯革命。由于还没有从本本主义和形而上学中解脱出来，坚持应以经过折算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作为定价标准的正统学派，如吉雅钦科，斯特鲁米林等人，无法领会“最优化计划”中最妙的资源配置思想，只是教条式地按经典概念来审视它是否有背叛劳动价值论之嫌。为此，他们批评资源定价考虑“间接劳动耗费”和以此为基础的“最优化计划”，是把对边际资源效用的主观评价引进了价值决定，是步资产阶级学者的后尘。当然，他们更不会接受康德罗维奇的模式。

康德罗维奇也受到“自己人”的批评。涅姆钦诺夫认为，康德罗维奇宣称“间接劳动耗费”也在生产中决定价值，是不正确的，但与正统派不同，他是康的学说的补充者。他认为，如果用价格偏离

价值，用对剩余产品价值进行适当再分配来解释对资源的评价，就不存在违背劳动价值论的问题。诺沃日洛夫和费多连科等人则从另一个侧面做补台工作，结果导致了这一学派内部分化。诺沃日洛夫运用微积分方法，提出最优计划测算方法应该包括从正向和逆向两个角度，计算边际产品的边际生产耗费——"级差耗费"，从而使康德罗维奇的模型动态化。在论述自己的这一理论时，他对康德罗维奇只肯定资源效用，而回避产品效用的作法作了修正。他指出：价格既是单位产品的级差耗费，又是它满足社会需要程度的评价。各种产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而不是仅从生产耗费角度定义的对产品的评价）与实际耗费之间的对比，才能表明生产与需要相适应的程度。费多连科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在试图综合质量与数量分析方法，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运行体系"时，更是明确地指出，"劳动耗费"无条件占首位而效用居次位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应该以社会有用性为基础来比较产品的耗费与成果。这样，他们实际上在最优规划中引进了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虽然这一引进实际上只是考虑了需求者的利益，而仍然没有从供给者——企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计划机构是否可能取得计算最优计划的真实数据和企业是否愿意严格执行计划，但毕竟是

弥补了康德罗维奇的一个欠缺之处。

到了七十年代，数理经济学以计划科学化和强调市场作用为标志正式分裂为两派。前者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的模式为标志，那就是，在国家统制经济的基础上，以控制论、运筹学和电子计算机为工具，强化传统体制中的反馈控制机制，对国民经济实现自动化自我调节。这一模式的简称为O·G·A·S。它显然与改革逆转后“局部完善”传统体制的方针不谋而合。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一方针的产物。且不谈这一模式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传统体制，因而消除不了中央偏好出错导致的计划失误，改变不了企业因利益关系扭曲对计划指令的反馈失真，仅就目前尚缺乏能处理以天文单位计数的瞬息万变的信息的技术与设备而言，它也只能是“乌托邦”，一个电子计算机“乌托邦”。强调市场作用的是科学院经济数学研究所的学者。他们虽然坚持计划要与市场相结合的观点，但目前还没能拿出系统详尽的改革方案来。

3-4 改革的曲折和新的冲击波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改革。苏联的改革

更是如此。理论流派的沉浮，则成为改革兴衰的风向标。

六十年代初期与中期，既是改革理论发展，又是改革实际推进的黄金时代。苏联官方在1965年9月宣布进行体制改革初始方案虽与利别尔曼——利西奇金模式有距离，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吸收了改革派的理论，即实行以利润为核心的完善计划方法和加强经济刺激的新体制。具体的措施有：（一）扩大企业自主权，指令性计划指标由30个降至3个，企业可自行招聘或解雇工人，有权处理多余设备等；（二）利用经济杠杆调节经济，鼓励企业发展横向联系，如调整批发价格（按平均成本加15%基金利润率），实行基金付费和收缴地租，扩大银行贷款范围，调整利息等；（三）加强经济刺激，实行企业留利。

但是，改革在实践中遇到重重阻力，并产生了新的问题。本来就不坚决的苏联领导人由此转向。1973年，转向后的新改革方案酝酿成熟，它清楚地表明，改革的重点不再是扩权和利用市场机制，而是在不危及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前提下作些小修小补：建立各种联合企业，以调整中央和地方对工业的计划管理权限并扶助亏损的中小企业；改组指令性计划指标体系，加强了与盈利和创新有关

的指标，并使之与收益挂钩；依靠科学技术和电子计算机，使集中的计划实现进一步科学化。可见，苏联的改革并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经营机制的根本变革”，而仅仅是使旧体制产生“局部性变化”的改良活动。而正因为“局部性变化”，需要数学作完善计划的工具，数理经济学派的命运才胜于彻底改革派，能得以在隙缝里求生。

为什么苏联改革会发生这样的逆转？其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历史沉疴过重。改革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每一个领域的破旧立新运动，要清算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传统观念，要改变根深蒂固的旧体制运行惯性，要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均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因此，改革只能是一场时而反复，逐步推进的持久战。在斯大林模式的故乡，这场持久战必然更为曲折和激烈。因为人们要推倒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事物，惜怜之情就会更加浓烈。何况这一模式曾经带来过高速增长的奇迹！

然而，停留于这样的结论还过于空泛。它会使人们以曲折与持久为由，忽视对改革的战略目标和战术技巧自身正误的探讨。而事实上，后者对改革的成败同样至关紧要。在苏联的实践中，不乏这样的经验教训。

其一，改革是一项巨大社会工程，涉及社会关系全面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和企业内部关系的调整，对改造按行政系统管理经济的旧模式，就不能不具举足轻重的意义。可惜在苏联，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被忽略了。结果，官僚阶层维护既得利益和工人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它们从两个方向阻碍改革的推进。

其二，改革需要理论指导，要求观念的更新。修正原有的控制意识形态的方针和政策，也就同样具有重要性。斯大林模式建立以来，苏联官方对理论研究一直持两难态度，一方面把它当作工具，用以宣传官方政策，故只允许千百只喉咙唱一个调；另一方面又不把它作为工具，理论很少成为经济决策的参照系。这样做势必窒息学术空气，阻碍理论研究深化，结果使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而仅仅成为长官意志的回声。解冻之后，这一境况有所改观，但没有触及根本。可见，为理论探索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其三，改革难免付出经济代价，并牵动每一个人的利益与观念。因此，应该考虑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承受经济代价的力量，考虑人们适应利益和观念系统更新的短期和长期限度的差别，有步骤，分阶

段，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苏联的改革缺乏这一战术考虑，尤其是先行准备阶段太短，致使众多的干部和群众对利益与观念调整应接不暇，最终成为观望者或反对派。

其四，经济运行系统本身是内在构造严密的有机整体。改革战略目标是否彻底，战术实施方案是否完整协调，更是系成败于一身。在苏联，1965年的改革虽也吸收了彻底改革派的主张，但因理论探索的不充分和不彻底，终于未能树立符合商品经济原则的新体制的明确目标。改革的初始方案更是缺乏总体配套考虑。其结果是，行政管理和指令性计划体制框架未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产业结构依然故我，新的宏观控制机制也未及建立，——它们都与改革后建立的与利润挂钩的物质刺激机制在同一经济系统中摩擦、冲突、碰撞。改革因此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出了新问题。许多企业利用价格体制的弊病，利用质量、品种、技术指标作用的削弱，利用宏观控制的疏漏，弄虚作假，在实际效益未显著提高的同时，获得高额盈利，并由此提高消费基金和扩大短期盈利项目的投资。这样，导致了社会总需求膨胀，短缺加剧，产业结构失衡更加严重。除了改革初期，经济似乎显露了一下好转的苗头外，以后是每况愈下。

现状的不妙和前景的惨淡，使人们无法再回避经济体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矛盾。囿于国情，囿于历史包袱沉重而步履蹒跚的改革，终于又艰难的迈开了脚步，改革的理论，又开始有了生机。

新的冲击波首先来自西伯利亚。安德罗波夫继任总书记后不久，一份揭露苏联现行体制种种弊端并呼吁改革的"秘密报告"，在西方不胫而走，成为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直到苏联《社会科学》杂志在83年第六期上摘要披露了其内容后，人们才知道，它的作者竟是一位大胆的巾帼英雄，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研究人员扎斯拉夫斯卡娅。

这份报告的引人注目之处有三：第一，通过分析时弊，论证进一步改革的重要性。扎斯拉夫斯卡娅认为，苏联近十几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经济效益低下，"主要是由于生产关系体系及国家管理体制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造成的。"① 她指出，苏联体制的基本轮廓成形于五十年前，从那时起虽有多次小修小改，但没有一次触及根本。现在经济结构变化，其复杂性已超过中央集权所能有效调节的界限，因此，旧体制潜能业已用尽，务必通过改革新起炉灶。第二，指出改革方向，是积极利用与发展市场关系有关的"自动调节器，"以平

① 〔苏〕《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衡生产，纠正不断恶化的比例失调现象。扎斯拉夫斯卡娅为此批评道，社会主义劳动具有直接社会性的概念，是构成具有种种弊端的现行体制的理论基础的一个因素。“那些还在捍卫社会主义劳动的直接社会性的学者们，是在给社会帮倒忙。”① 第三，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的阻力，来自现有体制中占有很高地位的、因个人利益而依然留恋这个体制的社会集团。这位巾帼之英的勇敢，连众多须眉亦望尘莫及。

种种迹象表明，新领导支持改革。官方对这份激进程度胜于当年“市场社会主义”的报告，默许了它的发表。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曾负“改革倡者”盛名的利别尔曼于1982年默默逝世后一年，西伯利亚的《回声》月刊突然宣布了这一消息，并评价他为功勋人物。安德罗波夫在许多场合的讲话，更是频频向改革递送秋波。主张改革的人们以敏锐触角窥察到了这一新动向，又纷纷步扎斯拉夫斯卡娅的后尘，活跃起来。此后，苏联领导人因自然规律又发生了两次更迭，但无论是契尔年科，还是戈尔巴乔夫，都师承安德罗波夫主张改革，尤其是后者，不仅言必称改革，而且有所行动。戈尔巴乔夫大胆进行了五十年以来最彻底的人事变动，使一大批拥

① 〔苏〕《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护改革的人进入最高决策圈；二是广开言路，多方寻求改革新见。到目前为止，理论探索有可喜进展，除了重新提出许多类似“利别尔曼—利西奇金”模式的建议外，八十年代的主张改革者还有所创新。第一，提出不宜以公有化程度作为判断所有制优劣的标准，主张经济成份和公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承包制和两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第二，把经济改革和社会关系及价值观念的调整联系在一起，在更深刻剖析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病的同时，抨击了阻碍改革的势力，主张管理的民主化。

当然，这不等于说这次新的改革一定会一帆风顺。困难是存在的，其一，主张改革者虽然东山再起，但由于仍然缺乏足够的实证分析和制定对策的规范方法，由于未能完全摆脱掉旧框框，未能充分地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的理论还是不够彻底，缺乏整体性和可操作性。他们的改革建议还是流于空泛的一般议论，例如，虽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引进市场机制，却没有说明与它相关的计划控制方式的转变，市场环境的完善和国有制的变革；更没有提出变革的具体操作方案。苏联资源的丰厚，使旧体制的运行还有一定的潜力，这也可能会削弱人们对改革紧迫性的感受。

所以，改革是原地踏步，还是跳小步舞，或是快速行进，或是跳跃？都只有等它自己来回答。有意义的是，即使是重蹈覆辙，也决不会是简单重复，至少证明了改革的必然性，证明了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让更多人看到这一点，不也是进步的潜在因素吗？

第四章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奇葩

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卡尔·马克思

二次大战的炮火，摧毁了东欧各国原有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各国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出现清一色的苏式体制。但由于历史规律与发展条件的明显差别，又迫使各国相继走上体制改革的道路，修建了各具特色的具体道路和目标模式。南斯拉夫则堪称为其中的一支奇葩。

4-1 斯大林模式的典范作用

战前，东欧各国经济十分落后，社会政治处于

封闭状态。除了波兰和捷克由大资产阶级掌权外，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等国的政权均掌握在王公贵族手中。其中的保、罗、匈，均加入了法西斯的轴心国。战后的民主德国则是当时法西斯德国的一个部分。在西欧现代工人运动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在战前均已建立起共产党组织，领导国内民主运动，如1918年的匈牙利革命，共产党曾短暂地掌握过政权。在二次大战席卷欧洲时，除了南、阿之外，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大部分流亡苏联。

战后，这些国家按照苏联的意志，建立起斯大林模式，其政治、经济体制是苏联体制在国土外的延伸。这种以苏联的军事、政治、经济控制为前提而造就出新的体制，是斯大林模式扩展运转疆域的第一类方式。

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基本上是由本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赶走法西斯占领军，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在被战争摧毁了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但是，这些独立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样仿效苏联，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

南斯拉夫，这个巴尔干半岛上拥有二十五万五千平方公里土地和现今人口为二千二百多万的最大

国家，在战后的1946年，就是完全出于自愿实行国有化，按苏联人的方式来管理经济和治理社会的。这种在非强制条件下产生的新体制，是以第二类方式即仿制，来扩大斯大林模式的阵营。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模仿仅仅是因为斯大林模式的典范作用？还是因为经济过渡时期社会内部的客观规律性，迫使社会朝国家集权化的经济制度演进？看来，问题的答案决不是非此即彼的。

很显然，之所以会出现第二类方式，主要取决于当时社会主导力量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目标，以及当时的社会客观现实。这个客观现实，既包括了南斯拉夫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也包括了国际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环境。

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预测和描述，自然地是共产党人建立新社会制度的指导思想。在一些朦胧的意识中，人们对新制度的设想主要集中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商品关系与市场交易，实行平等的按劳分配。这些思想也曾被列宁反复强调过，从而成为每个共产党人的基本常识。南斯拉夫的政治力量显然也具有这种政治本能。铁托、卡德尔等政治领袖在战争末期就开始强调，战后必须按照马克思的“蓝图”建设一个新社会。这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变

成了一种“倒错型”的决定过程，这决定了落后国家，或一个历史进程突然中断而处于三叉路口的国家，能够按照社会统治力量的理想目标，建立一个完全新型的社会制度。因为在这个新社会诞生前，其蓝图已经绘制完毕，只要根据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配置以不同的装饰，加以镶嵌就行了。这就是指导思想的巨大作用。

而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环境，也是决定其转向新社会体制的基本因素。

战争，给南斯拉夫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毁灭了这个国家二十多年来取得的一点经济进步，直接损失估计达90多亿美元。所有矿井，三分之一的工厂设备，30万个农场及所有的运输、通讯系统均被破坏，占全国总人口11%的170万居民在战争中丧生。然而，战争同时也摧毁了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社会政治、阶级结构出现了重大分化，除了通敌分子外，人民都转入反法西斯统一阵线，旧有的财产关系均被破坏。这实际上为战后新社会制度建立扫清了道路。战争客观上成了新社会制度产生的催化剂。

战后的南斯拉夫，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所有社会力量都注重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有利于共产党在执政

后，迅速没收敌占财产，并进一步对所有的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事实上，面对战后百孔千疮的经济，人员、资金、设备的奇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集中机构统一管理，保证重点，经济恢复很难迅速奏效。因此，国家集中控制的模式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特殊环境所要求的。这一点，战后的所有国家，包括重建经济的日本与联邦德国，都不例外。奇妙的是，这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刚好与其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前提是吻合的。这正如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战时经济与共产主义过渡措施结合一样。这一客观条件有力地推动了国有化与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加速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的确立。到1948年，南斯拉夫的新经济制度已基本确立。

然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还是南斯拉夫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还不能完全说明南自愿启用苏式体制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必须深入考察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格局，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

前面已经谈到，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西方世界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加上三十年代的长期萧条，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景蒙上了一层可怕的

阴影。而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一片萧瑟相对映，苏联当时却在迅速地推进国家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成绩斐然。在三十年代，苏联的工业增长速度高达两位百分数，尤其是重工业，更是突飞猛进。这种粗放型的发展，依靠不断地动员资源，增加投入而维持。然而，作为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资本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这样做又有其理由，而结果又产生了另一种效应，即表明苏联的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优越，可以避免西方的经济危机。这给人以信心，对战后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人们对于苏联的制度可以说是深信不疑，苏联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模式，斯大林成了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便是人们毋庸置疑的真理。在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之下，苏联模式的普遍推广也就有了必然性。独立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南斯拉夫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他们自觉地以斯大林模式为典范，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指导作用，南斯拉夫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客观现实，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强大吸引力，三位一体，构成了南斯拉夫战后效仿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的主要根源。

4-2 异军突起

在各国竞相效仿苏联建立起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两年后，呈封闭状态的东欧集团出现了首次分裂。南斯拉夫人异军突起，打破了清一色的斯大林模式，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笔。

战后，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时期，南斯拉夫的国有化与农业合作化进程甚至比东欧其它国家更快。到1950年，铁托宣布南斯拉夫已经没有一个私人企业了。但正因为模仿是出于自愿，它也就没有否定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这是南斯拉夫的领袖们强有力的独立意识和对马克思主义深刻理解的产物，也是人民浴血奋战得来的果实。他们认定这条道路可行，就走，而认为这条路不畅通，就可以改道。这种政治基础最终导致了与苏联的决裂。在对待国内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看法上，在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与一体化的关系问题上，南苏两国首脑持不同政见，由于前者不愿随便做应声虫，后者大为恼怒，结果两国关系公开恶化。苏联撤走了在南专家，将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

局，并组织舆论围攻。

这一切，使南斯拉夫人铁了心，“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罢”！放弃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成为他们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起步点。与此同时，理论界开始对苏联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批判性分析，并重新探索具有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探索新路，当然难免不带政治色彩，但也决不能因此将它仅仅归结为是政治上赌气。它带有必然性。从以第二种方式从法西斯铁蹄下奋起争取解放时起，从以完全自觉的独立姿态选择斯大林模式时起，南斯拉夫实质上已经为自己的“离经叛道”写下了伏笔，那就是，按自己的国情和信念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已扎下了根。虽然在短短的二年多的过渡时期内，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尚未充分显露，人们还不可能象苏联开始改革时那样，已经比较深切地感受到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的历史局限性而图谋“造反”。但是，只要有哪怕一点矛盾的端倪，一些斯大林模式弊端的蛛丝马迹，就足以使南斯拉夫人图谋另辟蹊径，并且，一旦决心既定，就会百折不挠。因此，与苏联的决裂，实质上是南斯拉夫要求独立选择适合自己国情和信念的模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要想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又要回击所谓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攻击，在修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道路时，唯一的做法是使自己的模式符合这样三条基本前提：一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二是必须符合南斯拉夫本国的实际政治与经济条件；三是要与斯大林模式相异。

那么，南斯拉夫人是怎样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模式——自治社会主义——的呢？

第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概括了历史进化的一般规律，而体现这一规律的具体进程，在不同的国度里可以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也是“条条道路通罗马”。苏联人走过的道路未必就是南斯拉夫的道路。南斯拉夫人完全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南斯拉夫的实际国情，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南斯拉夫道路的基本出发点。早在1946年，铁托就明确地宣布过这一点。1948年后，则更加坚定地把它奉为指导思想。

第二，“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它表明了社会的民主化与人的独立解放。从这一前提出发，南斯拉夫人主张废除国家所有制，使国家的经济职

能逐步消亡，工人直接参与经济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进而，他们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人自治”（Self—management），以此与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划清界限。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与生产资料不能直接结合，结果劳动果实被他人占有，产生异化；而在国家集权主义下，工人同样处于异化地位，他们并不能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因为中间横隔着一个行政机构——国家。因此，废除国有制，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设想建设社会主义，才是建设与发展新社会制度的根本立足点。

第三，在确立民主管理与工人自治的基础上，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形式必须保证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国家在这一领域里的权力也应向社会转移，以保证自治能够不断发展。因此，国家的主要经济职能消亡了。生产、投资、收入分配都由直接生产者自主决定，整个宏观经济部份与微观经济活动都分散化，抛弃苏联中央计划指令一统天下的传统体制。

第四，市场是联结生产者的重要纽带。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因而价值规律仍然在起作用。这一点，卡德尔在1946年就明确肯定了。而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要通过市场加以实

现，这是保证“自由人联合体”——工人自治企业平等竞争的必要条件，市场是检验社会计划、自治协议是否有效的最终标准。

从1949年初开始，南斯拉夫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开始走上自治的道路。在此后的实践中，这一体制又不断地演变，到目前为止，大约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0年到1963年，是工人自治的创立阶段。1950年，开始了工人参加国营企业管理的初步尝试，但工人委员会仍然从属于国家任免的经理。1953年新宪法公布，将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与工人自治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式废除了国家所有制。但这一时期的改革中，许多宏观经济政策仍由国家确定，如中央计划、价格和收入政策、财政和金融政策等。

第二阶段，1963年到1970年，这是自治向社会领域进一步发展的阶段。1963年新宪法进一步规定了企业自治权限的扩大和在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险等领域中实行自治，更加削弱了国家的行政权力。在这一阶段，国家将扩大再生产权力交给了企业，取消了联邦综合投资基金与基本比例的中央计划控制，同时，一部份社会职能也向生产者移交，形成了一种社会机构独立的微观网络，并与自

治企业结合在一起。因此，这一阶段的改革将更多的行政权力移交给社会机构，并将资源动员与分配的权力、价格权限、收入分配权力都下放给企业，向更加分散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第三阶段，1976年以后，是自治向联合劳动发展的阶段。为了进一步发挥工人直接参与管理的民主作用，保证社会成员的平等利益，南斯拉夫划小了原有的核算单位，以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为细胞（相当于原来的车间、作业队），通过一层层的契约关系，组成更高层的联合劳动组织。每个基层组织既要基于市场进行独立经营，又要根据契约与其它组织发生联系，互相制约。在这种联系中，体现工人直接参与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力。

从现实看，南斯拉夫自治经济运转的基本动力在于组织内部，即其利益动机；同时，以契约的制约施之以外部校正力。这种运转的机制是一种双向性调控。联合劳动组织是独立行动的经济主体，它的内部由利益趋同的成员构成。而在联合劳动组织外部，有两条纽带连接彼此，一条是市场，另一条是由法律等社会力量规定的契约、协议。前者属于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则，而后者则渗入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它确定了联合劳动组织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以及相应的行动准则。这条社会纽带虽然不是中央

计划指令性的，或行政强制性的，但它仍是外部介入的因素，由它维系着整个社会目标。概括地说，整个自治经济就是在这两条纽带的联结下，进行运转的。

4-3 自治理论之花

在南斯拉夫土壤中产生的自治理论，是自治实践的基本前提，同时，它又在自治实践中逐步发展完善。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构筑了社会的上层建筑——政治结构，并对经济基础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种，播入南斯拉夫的社会土壤，汲取其民族营养之后绽开的思想之花。

以自治为基本准则，南斯拉夫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只是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因此，自治理论中占压倒多数的是主流派的理论，它在国内意识形态中居绝对支配地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爱·卡德尔、米·科拉奇等。这一派在研究问题的方法上并无新颖之处，但其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及其结论却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迥然不同，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独树一帜。

“人”和“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

点。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就是以消灭私有制，铲除雇佣劳动制度，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以消除“人的异化”。南斯拉夫自治理论的主流派在探索新的途径时，发现了这一点，并从这一点出发，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首先，主流派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的基本条件就是直接参与生产的管理，决定自身的事务。这样，才能消除对劳动者主人地位的异化。因此，企业应当实行工人自治，使国家的经济职能首先在微观决策领域退化。“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和概念上的起点’，不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而是他们‘自由地’联合成自治生产单位”。① 这样，在企业内部，由工人代表组成的工人委员会行使直接管理企业的职权，从而消除国家官僚机构凌驾于工人之上，使公有制国家的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主流派指出，实行国家集权，虽然在企业中排除了资本的力量，但引进了国家行政力量。这不过是由国家行政力量代替了资本家，工人被雇佣的地位没有改变。因而，实行企业工人自治，消除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经

① 米·科拉奇：《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第84页。

济管理上的集中权，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条件。

在企业工人自治的基础上，实行社会自治与削弱国家的某些社会职能，是进一步发展自治社会主义，确立工人阶级主人地位的必要条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直接生产者的主人地位，意味着其对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与干预，这是企业自治的延伸，也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直接生产者管理社会的必然结果，它导致国家退出教育、卫生、福利事业等部门的管理。

在“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问题上，自治理论主流派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自治理论主流派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自由人联合体”和无产阶级直接管理的理论，批评“间接论”派为“国家主义者”、“专家治国论”，批评国家是重新凌驾于劳动者之上的官僚机构。他们认为，国家作为超经济力量独揽管理大权，名曰代表生产者实行管理，实际上有可能成为一小撮官僚阶层发号施令的工具，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侵犯社会全体成员的权力。因此，在国家集权经济制度下，劳动者的主权徒有虚名，成为官僚机构愚弄人民的掩饰，它导致了直接生产者的异化。卡德尔的那本小册子《公有制在当代实践中的矛盾》，是对国家集权管理的集中批判。而

更激进的观点则把中央集权经济体制逐出社会主义领域，称之为“国家主义”，并认为它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并列形成了当代社会发展中三种独立的社会形态。① 而“间接论”者也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根据，认为国家是代表社会、代表工人阶级在采取社会运动。没有国家的代表，整个社会意志则无法统一，社会利益也就无法体现。这种各执一端的争论，随着南斯拉夫自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迅速地向前推进。“直接管理”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其次，为了进一步在微观领域与宏观领域中发展自治，彻底杜绝国家垄断与官僚主义复活的可能，主流派提出了联合劳动思想，即在推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自治生产者通过契约与协议将社会所有的资金与劳动联合起来。因为当企业与大部分社会事务实行自治后，微观领域的决策分散化了，企业在市场指导下运用社会生产资料与劳动独立经营。而任何独立的微观活动都需要一种协调机制，这种机制既可以是内生的，如市场机制，也可以是外部强力施加的。在早期的自治实践中，基本着眼点被放在企业内部，而企业之间的协

① B·哈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

调职能则保持在国家手中，这就是说宏观经济的决策权仍留在行政机构手中。如经济发展计划，投资的分配，积累的决定等都由联邦政府决定。在主流派看来，这是自治关系不彻底、国家主义尚未完全消除的表现。因而，他们主张，在实践中，改国民经济计划为社会计划，变计划委员会为联邦计划局，取消联邦综合投资发展基金，但在六十年代，上述措施推行后，宏观经济中失去了协调机制，结果使经济生活出现了一些混乱。① 对此，主流派又指出，应该坚持自治而不能走回头路，可以通过推行联合劳动制度来取代国家在宏观经济领域里的协调功能，以便使直接生产者在微观、宏观领域中实行彻底的自治。

从自治向联合劳动发展，要求直接生产者的自治决策权更广泛，更有保证。主流派提出通过划小核算单位，通过一级级的契约与协议关系，建立各级联合劳动组织，其中最基本的核算单位是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再逐级扩大成复合的联合劳动组织。这样做，可使生产者在较小的核算单位里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各级联合劳动组织之间的协议和契约既能发挥直接生产者的自治作用，又能对每个劳

①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发展的挑战》，世界银行国家经济报告，1979年，第52页。

动组织产生社会约束，以体现社会利益与社会意志。因此，主流派坚持必须用联合劳动及其契约、协议关系来协调社会经济，并取代国家在宏观决策领域的行政干预。

联合劳动组织及其契约关系代替了国家的宏观协调机制。但契约的制订仍然需要一个统一的社会标准。为什么目的订立契约，以什么样的方法订立契约，需要由社会代表机构通过法律形式加以保证，并有相应的仲裁机构加以执行，以保证契约不蜕变成各劳动组织之间的经营密谋，和非法勾结。对于这一点，主流派认为这是社会必要的干预，是行政机构必不可少的监督职能，也是保证生产者平等经营与竞争的前提。

第三，主流派提出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理论，以此构筑自治经济的基础。

作为私有制的对立物，公有制本身可分为许多具体形式。从目前看，按财产权的归属关系，可分为国有制、集团制（含合作制）。而社会所有制意味着财产归全社会所有。这种财产的社会所有没有具体的归属关系，任何人都是所有者，但任何人都不能占有它，因为公有财产没有外部的所有权界限。主流派从这一点出发，竭力批判国家所有制的积弊，主张实行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非所有

制的占有”，或者说是一种“非垄断性占有”。①

按照经典的所有权理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意味着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排它性占有，这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垄断，凭藉这种占有，它能给所有者提供收入。那么，非垄断的占有是什么意思呢？主流派认为，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使用不是在垄断该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实行占有，它不能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获得收入，如出租、转让等，而必须通过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结合，才能从经济上获得利益。米·科拉奇在其代表作《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式》中提出，每一联合劳动组织对其多余的生产资料，必须无偿地转到其它急需的地方，因为这些生产资料是全社会所有的，在他们的劳动不能与之相结合的情况下，应使它与别的劳动组织相结合。科拉奇甚至还提出企业的外部投资，只有在经营单位获得超额利润时，才有义务归还。他根本否定利息概念。从传统的财产关系着眼，很难理解这种所有制的真实含义。事实上，如果没有社会契约与协议对生产资料实际占有关系的维护，排斥外部侵占，这个社会将失去基本的秩序，经济很难正常运转。而所谓的非垄断性占有，是指在自治经济

① 爱德华·卡德尔《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

中，任何单位与个人都不能利用公有财产去盘剥他人，而只能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取收入。就此而言，主流派认为社会所有制已非真正的所有制，只就其形式的类同性，称之为社会所有制。

主流派进一步提出，社会所有制利益的实现，要通过联合劳动组织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应用，并按劳动成果来实行收入分配。它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内部，造成了按劳分配的条件，但在联合劳动基础组织之间，则承认市场对收入的形成与分配有调节作用，这是社会物质生产规律在收入分配上的体现。主流派认为，这种市场分配与按劳分配是不矛盾的，因为市场对劳动组织经营的收入差别调节，即使有物质条件因素在内，但也表现为过去劳动的作用，而这些过去劳动也是由联合劳动所创造的。因此，社会所有制的必然结果是收入按劳动成果分配，并由联合劳动者自主地决定。

第四，主流派理论对市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们指出，市场是协调联合劳动组织的主要工具，它构成联合劳动基本单位微观决策的依据，因而是联结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社会纽带。有关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是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最敏感的问题。翻开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文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主义经济学史即是一部计

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史。前面介绍的苏联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读者自可领会到这一点，而后面谈到的波、匈、捷等国的改革，更会使读者加深这一印象。可悲的是，在传统理论的束缚下，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始终未超出对经典著作的教义式理解，市场关系也无实质性推进，自治理论对市场问题的认识被贬为“市场社会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主流派确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仍然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基本指导力量，因此，南斯拉夫国内的统一市场必须加以维护。这是理论上迈出的第一步，即把市场机制引进社会主义经济。但引进市场机制则面临着一个市场机制与计划管理的关系问题，这带来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双重标准与决策双重化问题。主流派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并不是价值规律的独立调节，在联合劳动基础上的社会自治计划，仍然在协调社会经济活动，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也可以称为计划经济。只不过，这种计划不是强制命令，而是联合劳动组织之间的自觉的协调机制，它不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而是将计划的协调建立在市场运转的基础之上。① 计划最终要接受

① 伊凡·马克西姆维奇：《政治经济学》，贝尔格莱德版，1981年。

市场的检验。南共联盟十大的纲领指出：市场“是证明某人的劳动是否为社会需要或为社会承认的唯一仲裁者”，“否认市场就是保护官僚主义和技术主义”。这种认识比起“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共同调节”又进了一步。

在市场机制作为唯一仲裁人的条件下，资源分配市场化，这就必然地要求投资权与价格权的分散化，由联合劳动者自主地决定。与此相应，个人收入分配、积累与再生产的决策权也要由联合劳动者自主决定。价格作为市场信号，必须由市场竞争决定。自治理论的这些独创见解推动了一个分散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第五，自治经济的运转，除了社会所有制部分外，还有大量的非社会所有制成分存在，如个体经营者与农民。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把它当作旧制度的残余，而主张加以清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正是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典型。南斯拉夫在战后一度也推行过这一策略。苏南关系恶化后，还加快了合作化的步伐。但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既没有带来实践的好处，也与自治理论相悖，于是，合作社被逐步解散，大量家庭农场与个体经营出现了。

在其后的发展中，家庭农场与个体经营者大都

通过各种经济、技术方面的联系，与社会所有制企业建立业务关系，生产、经营被纳入社会化过程。对此，主流派提出了自己独创的见解。他们认为集体化并非农业走向社会化的唯一途径，甚至不是最好的途径。而通过联合劳动的契约组织形式，在保留生产资料私有的前提下，使家庭组织与社会联合劳动组织建立联系，引导他们走上生产经营的社会化，纳入社会分工体系，这是提高农业生产组织效率，发展社会化生产的有效途径。在规模经济与组织效率的选择上，农业中的家庭农场与个体经营者，因为组织结构简单，运转灵活，加以财产关系的刺激机制，能够得到较高的组织效率。而农业中的规模经济效益由于受到技术、资金投入量和分工细致程度的制约，大大低于现代制造业。因此，在主流派看来，这些曾是旧制度残余的经济，通过这种联系与协调，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化经济的一个附属部分。这一理论给了传统的斯大林模式以致命的打击，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在不同程度上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被兰、匈牙利的农业政策，明显地类似于南斯拉夫模式，我国农业家庭承包制的发展，也与这一思想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自治”同样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随着七十年代以后南斯拉夫经济中种种矛盾与困难的加

剧，理论界的非主流派也逐渐形成，提出了自己对自治经济运转的理论见解。从目前看，非主流派主要有两个理论倾向。

第一种倾向对南七十年代以来推行的联合、协议和契约提出了批评，认为“联合、协议和契约是排斥客观经济规律和南斯拉夫市场统一性的机制”①，从而是行政措施的变种，是排斥市场与计划机制的唯意志措施。因此，他们认为，克服目前经济不稳定、寻求发展的重要机制应该是实行更彻底、更全面的市场调节，让价值规律发挥真正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利用计划手段消除市场运转中的不良倾向。

这一理论倾向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方式主要有两种，计划与市场，而南斯拉夫的主流派理论却提出用第三种方式——劳动和资金的联合和社会契约来代替市场与计划机制，这必然导致在经济生活用取消市场与计划的正常调节作用，使行政措施死灰复燃。非主流派对协议、契约的基本看法可归结为下列公式：（1）协议契约=（2）超越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Ⅰ）+（3）加强经济中的行政决策（Ⅱ）=（4）产生取消市场

① 伊凡·斯托扬诺维奇：《经济稳定与价格形成》，《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10期。

和经济规律的消极后果＝（5）为克服消极的经济运动而必须采取行政措施＝（6）加强国家集权主义＝（7）削弱自治。

因此，非主流派中的第一种理论倾向主张全面恢复价值规律的客观功能，把自治经济的机制完全建立在市场和经济规律之上，具体地说，就是在价格形成上，收入分配上，积累与再生产方面实施市场调节。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取消自治协议与社会契约机制，而是要使它成为指导市场与价格政策的工具，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消除市场运转中的消极因素，如协议垄断，合谋集团利益，用地方利益破坏南斯拉夫统一市场等。总之，行政措施、计划工具以及契约、协议都必须建立在客观的价值规律基础之上。

非主流派的第二种理论倾向同样对主流派理论提出了非议，但侧重点不同。这一理论派别认为南斯拉夫统一市场的维护，经济发展的稳定，有赖于宏观经济控制与调节措施的加强。他们认为，市场机制是经济有效运转的核心，但在失去宏观经济控制与调节的情况下，市场无法稳定运转，其作用将被限制，并会导致不正当的勾结、垄断，损害社会利益，而仅仅依靠自治协议与社会契约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对收入分配、投资决策等加强宏

观控制，加强计划对市场的指导与调节。当然，这种计划也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而不是取而代之。他们还坚决主张恢复被废除多年的联邦综合发展基金，以求经济在市场基础上的平衡发展。这一理论倾向目前在行政决策机构中得到了较大反响，它将成为未来南斯拉夫经济理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流派。

4-4 苦果，酸果，还是甜果？

南斯拉夫的自治理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的独创，它是斯大林教条主义思想的冰冻期出现的第一枝报春之花。南斯拉夫人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使那些沉浸在个人崇拜之中的人们无法理解，更难以容忍。然而，时间的流逝却证明了他们的自主与勇敢在国际共运史上产生了突破性的示范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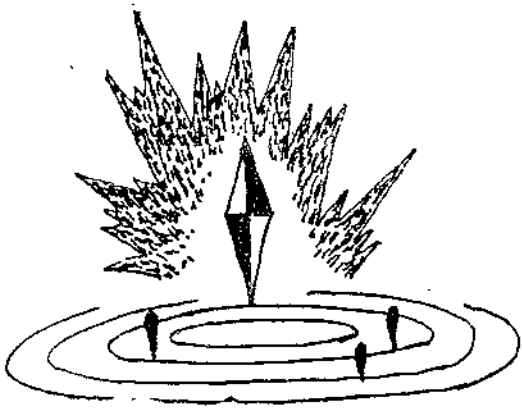
我们已经看到，自治理论之源与斯大林的理论一样，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解释，它同样清楚地表现意识形态结构对社会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重要影响。然而，南斯拉夫自治理论却更多地考虑了本国的实际状况，如政治条件、经济发展水

平、社会阶级结构、居民文化素养和民族关系等。因此，这一理论在实践中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由于自治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民主与人道主义，克服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劳动者的异化，工人作为直接生产者，参与企业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行使社会主人的权利，显然，这对于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提高微观经济活动的效率，具有直接的作用。自治理论源远流长，从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工人合作社试验到北欧社会党人的工人自治理论，从福利国家的工人参与政策到日本企业的民主精神，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工人单纯作为被使唤的奴隶的地位，刺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但这毕竟与作为主人地位的自治有着重大差别。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自治经济，它更加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加强了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它使自治经济的运转显出了诱人的光彩。

在自治社会主义实践中，南斯拉夫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大成就。1954——1975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7.2%，实际人均收入年平均递增5.2%，工业总产量每年增长9.5%，固定资产年平均增长8.6%，进出口贸易流量均以每年9%左右的速度递增。国家经济实力，人民生活福利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然而，肯定南斯拉夫人的自主和首创精神，肯定自治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并不意味着南斯拉夫人走过的道路就平坦和宽阔。相反，这是一条充满荆棘与坎坷的道路，尤其是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南斯拉夫经济中出现了失业率高，通货膨胀加剧，外贸严重逆差等问题。当然，有矛盾，有困难，才能逼人奋进，去克服堡垒，南斯拉夫人正是在种种艰难困苦状况下，表现出伟大的骑士精神。目前，对宏观控制理论研究的复兴，对通货膨胀理论的研究，对联合劳动理论的不断完善，表明自治理论在饱尝甜酸苦辣之后将更加成熟，更加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未来的自治之花将更加鲜艳。



第五章
匈牙利：
静悄悄的革命

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资产，在实践上更可笑了。

——列宁

5-1 沿着自己的历史轨迹

在匈牙利，这个面积仅为九万三千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一千万的小国，人们在以创新精神和审慎态度，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当这场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上有滋有味的改革，到开始显露出自己特殊的魅力时，匈牙利这个不起眼的弹丸之国，开始成为各国学者和政治家们热门的话题。

时至今日，在人们头脑中已形成这样的印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数匈牙利的最稳健、最顺利、最有成效。然而，在今天，最先站出来批评匈牙利改革不彻底的，却又是匈牙利自己的经济学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话不得不从本世纪初谈起。

1918年3月21日至8月1日，匈牙利曾诞生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政权，虽然因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而被颠覆，它却显示了这个民族寻求解放的斗争精神，为匈牙利在今后岁月中，无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方面的独立探索，写下了伏笔。尽管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沦为德国仆从，并与捷克、波兰等国一样经由第一条道路（即借助于苏联红军的力量）获得独立，还建立了类似苏联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它却又是沿着自己的历史轨迹向前行进的。

五十年代初，在匈牙利经过民主改革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经济关系的调整，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之后，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时，围绕着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党内展开了两条路线斗争。

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拉科西，他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声称“伟大的斯大林在我们处境艰难而复杂的时候所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忠告”，“永远都是

精辟中肯而符合于受苦受难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利益的”①。这一思想在实践中表现为，他在执政期间，在政治上搞“谁不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的”一言堂，实行家长制统治，在经济上搬用苏联模式，其一，国家以行政手段，通过指令性计划，对企业经营和收入分配实行统一管理；其二，在农村，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强行实行合作化；其三，推行高积累、低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要把匈牙利建成“钢铁之国”。

另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曾被指控为叛徒并被处死的纳吉。在他写于“匈牙利事件”前夕的给党的申诉书中，明确表示，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到处适用的学说，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根据具体条件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匈牙利也不例外。②根据这一思想，纳吉的施政纲领与施政实践都明显地区别于拉科西，也就是区别于苏联模式。在政治上，纳吉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强民主与法制。在他执政期间，实行了党政领导分家，修改了选举法，扩大了地方议会权限，建立了爱国人民阵线等。在经济上，纳吉批判拉科西的方针政策。他指

① 拉科西：《匈牙利人民民主道路》，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15——17页。

② 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中文译名《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

出，加速农业合作化和高速工业化不符合匈牙利国情；追求工业上的自给自足，拒绝利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必然加重国家经济负担；积累过高，重工业过快发展，则会引起比例失调；经济体制过于集中，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在短短二十个月的任期内，纳吉实践了自己的方针政策。第一，在1953年6月中央全会后，在群众中广泛展开了改革经济体制的讨论。人们对纠正传统体制的弊端，提出了许多意见和设想，虽然因种种原因，改革没有真正施行，但这是在思想领域中第一次破除了斯大林模式的偶象形象，成为以后改革的先声；第二，调整了国民经济比例，削减了积累基金和对重工业的投资，增加了消费基金和对轻工业、农业的投资；第三，大力扶助农民，强调合作化的自愿原则，放慢了合作化的速度，采取多种措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纳吉执政不到一年，生活必需品价格下降5%—40%，布达佩斯的各种农副产品供给，最少的增加38%，最多达200%。

以今天的思想看五十年代，很显然，纳吉的路线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历史总是让人们经历了一段波折之后，才会辨明是非。在当时，纳吉和他的路线一起被冠以“右倾”罪名而逊位，拉科西在下台二十个月后，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推

行他的路线。于是，稍有好转的经济又陷于混乱，人民生活水平在1954年略有提高之后，在1955年又以13%的幅度下降。这一切成为1956年爆发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的重要原因。

随着布达佩斯的骚乱的平息，上述两派领导人都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他们所争论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在什么样的经济管理体制下运行”的问题，却没有随之相失。相反，它在匈牙利人的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解答这一问题的过程，则成为改革的过程。

终于经过几十年安安静静的努力，在卡达尔领导下，匈牙利人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建立了既不同于南斯拉夫的“自治”，又不同于苏联的“改善”；既不同于兰格的“试错方法”，也不同于锡克的“宏观分配”，而是比较接近布鲁斯设计，但又有匈牙利特色的“分权模型”，对上述问题作了颇为出色的独具风格的回答。

5-2 “布达佩斯”学派的回答

匈牙利人所交答卷的独具风格，首先在于“在

匈牙利，改革的原则实际上是在两部分人（指经济学家和国家机构中的实际工作者——引者）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提出的。这样混合的组织形式使得后来改革在遇到困难，受到指责时能经受住考验”①。

的确，政府广开言路，重视经济学家的作用，经济学家重视研究实际经济问题，甚至成为身兼政府要职的“新的多面手”，这使匈牙利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国情创立自己的改革理论，建设不同于南、苏、捷等国的新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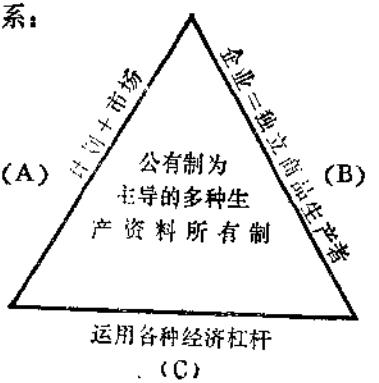
对匈牙利改革实践产生最大影响的理论，是已构成群体的经济学者——“布达佩斯学派”中主流派的经济思想。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有：涅尔什·雷热，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曾任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中央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是匈牙利改革蓝图的总设计者；奇柯什-纳吉·贝拉，大学教授，匈牙利经济协会会长，又任国务秘书，国家物资和价格局局长；纳吉·道马什，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马尔通，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等等。

主流派懂得，没有对传统体制的批判，没有对

① 纳吉·道马什：《与中国经济学家谈话（1979年12月10日）》，《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

它的弊病的充分认识，就不可能明白为什么要改革和应该怎么去改，改革也就不可能发动和顺利进行。尽管人们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斯大林模式不能适应日益复杂化的社会化生产，但还是需要在理论上作进一步说明。在64年5月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涅尔什向经济学者们提出这一建议后，很快就得到了反应。1965年，他又受命对现行体制进行正式审查。主流派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包括三部份：计划制度，经济调节制度和组织制度，这三个部分之间的协调被破坏，经济就会出现问题。匈牙利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生产发展使分工日益深化，经济活动日益复杂，资源限制日益增长。粗放发展已不能适应这一现实，必须转入集约发展，以效率作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斯大林模式是只适应粗放发展的低效率体制，与讲究效益的集约发展不相适应，因此必须谋求改革。在提出上述必须改革的“原则性”理由同时，主流派还提出了“实践的”理由，这就是，在国民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工农业发展要更多投资，人民改善生活要更多消费基金，对于这一体现于个人、企业和整个社会活动的矛盾之中的矛盾，现行体制不能很好地使之达到最好的统一，因此，必须谋求改革。

当然，仅仅说明必须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对传统体制批判的更重要目的是要弄清朝什么方向改。主流派是懂得这一点的。他们因此更多的为怎么改而绞尽脑汁。结果，向自己的人民奉献了这样一个由“三条最重要的原则”构成的目标模式。这三条原则如同三角形的三边，它们围绕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构成了简单的，然而也是稳定的体系：



A、与南斯拉夫人和捷克人不同，主流派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观点，但是，他们又对把指令性计划当作计划经济标志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主流派认为，计划经济的标志是自觉地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指令性指标只是实行计划经济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其实质或标志，用经济调节方法，自觉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提供的可能性来使经济达到平

衡，也是计划经济。匈牙利的实践表明，在苏联或许有其必要性的指令性计划，在匈牙利是不成功的，因为第一，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获得和处理无数经济信息，因此，计划常常脱离实际，导致经济活动失误；第二，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把力量置于钻国家“空子”之上。因此，应该取消指令性指标。

但是，以什么来取代指令性指标，使经济保持平衡呢？主流派找到了指导性计划这一方法。他们的思想出发点是确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商品货币关系调节经济活动的作用。而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这是无法做到的。因为价格、成本、利润只起换算作用，企业是行政机构附属物，不能作为独立生产者自主经营。因此，必须抛弃指令性计划，利用企业之间的关系和市场机制，迫使企业合理选择和使用各种资源，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并改进技术，降低成本。

但是，主流派决不是瓦尔拉市场一般均衡理论的信奉者，他们并不象南斯拉夫人和捷克人那样信赖市场。而是在主张引进市场机制的同时，又强调它的局限性，那就是，企业不可能了解国民经济全局情况，也不可能顾及全社会利益；市场调节是事

后调节，它会造成供求波动并带来相应损失。为此，主流派反对整个国民经济全交给市场调节，而是主张计划与市场结合，并把计划放在首位。

于是，目标模式的第一条原则就此产生：实行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指导性计划制度。国家通过间接的经济手段组织和管理市场，由此调节企业的经营活动，使之遵循平衡有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和发展目标的中央计划。

由这条基本原则出发，主流派引出了第二和第三条原则。

B、匈牙利经济学界的主流派对国有制持肯定态度，主张国有企业应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主张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一原则的产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如果不给企业这一市场活动主体以商品生产者资格，发挥市场作用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一句空话。而要这样做，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分割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和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权益。

主流派提出了两项分割权力的原则：

1.宏观经济决策权属于国家，微观经济决策权基本上属于企业。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消费与投资基金与两大部类生

产的平衡，财政信贷外汇平衡，某些最重要产品的供求比例，由国家决策。企业则决定日常的供产销经营活动。至于最难于分割的投资权益，大部分由国家掌握，即国家不仅决定社会总投资规模，部门投向，还直接决策重大投资项目。就是与企业日常生产有关的小型投资，虽然决策权在企业，国家也要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其规模和方向。

2．国家多控制一些分配权，企业多掌握一些生产权。理由是：第一，国家所有权的体现最主要的就在于对企业剩余产品的支配权上；第二，国家宏观计划控制的最主要的积累、消费和投资比例，最终落实到企业的纯收入分配上。第三，国家用经济方法调节经济需要财力。至于企业日常生产什么，怎么生产，生产多少，则是比收入分配复杂得多的经济活动，国家没有能力准确决策，只能由企业根据市场自行决策。

仅仅只有权力分割是不够的，没有相应的责任与利益，企业就没有用好日常经营权的积极性和责任性。对此，主流派提出，应该把企业物质利益同利润，这一反映经营效益的综合指标挂起钩来。使利润对企业发展和企业成员收入发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企业必须建立储备基金，用于承担经营不善造成的风险。由非经营的外部原因造成的风险，则

由国家承担。

C、主流派主张国家以经济方法来实现计划对市场的指导。这一条原则与上述二条原则显然不可分离。既然要使企业成为具有责、权、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要利用市场机制，那就不可能再使用行政指令的方法来管理经济。而国家又不能不管理经济，因为计划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首要因素。因此，要把市场运行和企业活动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就只能运用税收，价格，信贷，补贴，工资等经济杠杆，去影响企业的利益，刺激企业调整他们的行动。

当然，主流派也认识到经济杠杆并不是万能的，因此，他们还提出，在使用经济杠杆时，要注意它们的协调一致，力避抵触与矛盾，并且，它们被运用的领域，应该主要限于宏观平衡，对个别部门、个别产品之间的平衡，一般由市场自动调节来达到，以保证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

为了向政府提供使用好经济杠杆的建议和方案，主流派中的许多学者成了精通某一经济杠杆的专家。例如奇柯什—纳吉·贝拉，他既通晓一般经济理论，又是价格学专家，匈牙利的“混合价格机制”就是他领头设计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主流派在设计上述“三角

形”目标模式的三边时，并没有忘记定出它的“重心”，也就是这一模式运行的所有制基础。照他们的看法，匈牙利应该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应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并允许合理的私有经济成份存在。

5-3 分权模式的建立和完善

匈牙利人所交答卷的独具风格，不仅在于他们将经济理论切实运用于实践，也不仅在于他们对新体制的独特设计，还在于他们在改革这一系统工程的推进过程中，表现出了审时度势的机敏和有条不紊的组织调度才能，表现出了善于总结经验的科学态度和不怕挫折的精神。

整个改革经历过三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1957年。

匈牙利事件之后，政府吸取了拉科西执政时的教训，开始了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局部改革。首先，卡达尔放弃了片面强调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增加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并增加对农民的补助，减免农业税。其次，在农业中首先开始体制改革的尝试。除了根据自愿原则于1959—1962

年期间重新进行“第二次合作化”运动外，1957年进行了农产品的价格改革，取消了义务交售制，实行自由销售和按合同收购的制度，并逐步减少指令性指标，到1965年完全取消实物性指令指标。同时，重视发展家庭副业生产，使之产值上升达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再次，调整工业组织，改革工业管理体制。从1957年开始，逐步减少向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废弃了统一的工资率，实行在基本工资范围内的企业自定工资制；对企业工作的评价指标从总产值改为国内外市场销售额；建立了与盈利挂钩的分红基金；简化了集中分配物资和产品的制度。1962年又实行工业管理改组，合并中小企业为大企业，建立托拉斯。再次，为围绕改革进行的理论探索创造良好气氛，允许讨论当时苏联、东欧其他国家尚不能公开讨论的问题，尤其是容忍对传统体制的批评。

这一切，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基础。因为上述农业政策和农业改革，使农业生产迅速增长，1977年，匈牙利人均粮食占有量达1,153公斤，居世界第五，经互会第一。这不仅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而且使工业和整个体制改革工作免除了后顾之忧。更为重要的是，农业改革为整个体制改革树立了榜样，提供了经

验，奇柯什一纳吉。贝拉在《匈牙利经济改革的十年》一书中，充分肯定了这一点。与此进行的工业改革和理论讨论，则不仅开拓了第二步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且是第二步改革的先进准备。有的改革措施稍加改变或不作改变即可成为第二步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个里程碑：1964年12月。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个月召开全会，作出了进行全面改革的决定。此后，做了三年有余不紊的准备工作。首先，党中央成立了有三分之一理论工作者，三分之二实际工作者组成的250人改革委员会，共商改革方案。在这一基础上按主流派思想构成的改革方案，既能为各方人士接受，又易于实际操作。其次，改革方案的形成到实施，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和细致的组织工作。1965年一年，先集中力量对传统体制的弊病进行彻底的批判性审查，明确为什么要改和要改些什么。在此基础上，从1965年12月起，开始拟订比较详细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对东欧其他国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考察。1965年5月，党中央正式通过改革决议，改革委员会解散，另成立中央经济政策委员会。委员会一方面组织各业务部门拟定新调节制度的实施细则，另一方面举办各类干部训练班，讲解改革的指

导原则和内容，培养改革的骨干力量，并通过他们向人民作宣传。此外，为了防止改革开始后市场平衡方面可能出现混乱，委员会还为此作了物质准备。

1968年1月1日，改革正式在匈牙利全国铺开。有了上述充分的准备，新体制的建立就已经有了保证。而匈牙利人选择改革的时机，更为新体制较快站稳脚根提供了条件。

六十年代正是苏联、东欧各国改革风盛吹的年代，匈牙利谋求变革自然也就不会引起责难。并且，虽然匈牙利步子迈得比苏联大，但与捷克等国的改革相比，理论上与实践上都要谨慎些。匈牙利还使用外交手段，巧妙地周旋于苏联、东欧各国之间。与此同时，世界市场比较景气，匈牙利的出口商品销售比较顺利，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也比较便宜，有利于开放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改革。

在另一方面，卡达尔政府执政后，改拉科西“谁要是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为“谁要是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扩大了团结面，加强了民主和法制，改善了人民生活和党群关系，在国内创造了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民主气氛。政府也因此在民众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在这种条件下开始改革，阻力自然也要小得多。

天时、地利、人和，使匈牙利改革卓有成效。到1972年止，构成新体制的上述三项基本原则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5.9%，外汇收支基本平衡，积累与消费比例适当，投资增长平稳，居民生活水平年均提高率达6%，收入差距开始拉开。纳吉·贝拉因此把这一阶段称为改革的“黄金时代”。

然而，世界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改革。相对于苏联、东欧其他国家而言，匈牙利的改革是顺利的，但其间也有曲折。1973年，匈牙利的蓝天上开始出现乌云。反改革势力抬头，改革受阻以至在一定程度上停顿，某些方面甚至发生倒退。例如“改革之父”涅尔什被免职，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又重新加强等。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外贸连年逆差，外债急剧上升，投资膨胀，消费基金也膨胀，短缺加剧和通货膨胀等危象。

第三个里程碑：1979年。

面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和改革的波折，匈牙利人既没有退缩，也没有掉以轻心，匈牙利党和政府组织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展开讨论。大多数人认为，经济困难不是改革的结果，而是经济政策失误和外部原因造成的。其一，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爆发和世界市场形势恶化，使匈牙利产品出口困难，进口

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暴涨，这就难以避免外贸逆差。其二，在对外经济失衡时，不去控制进出口，相反却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结果导致投资膨胀，外债剧增，外贸逆差扩大。其三，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后，苏联、东欧各国改革出现逆转，使国内反改革力量抬头；外部原因和政策失误造成的经济困难，也给反改革力量造成口实。这些阻力使国家不能很好运用新体制来控制经济。据此，他们主张调整经济政策，加强宏观控制，继续进行改革。党中央听取了这些意见，于1977年11月做出了相应的决议。1979年决议开始正式执行。至此，改革进入第三阶段。

经过三年努力，到1982年，匈牙利实现了外贸平衡，经济困难得到缓解。但匈牙利政府和经济界人士认为，这一段对企业的经营采取较多的直接干预手段，降低积累，削减消费，都只能是权宜之计。目前的匈牙利的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要使之完善以至促进经济更好发展，必须进一步改革，使新体制的三项基本原则得到彻底的贯彻实现。

匈牙利人愿意把这场变革进行到底，因而，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新体制的不完善之处和如何进一步改革。

分歧无疑是存在的。匈牙利经济学界的主流派内部对1973年以后国家直接干预的增强，就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奇柯什一纳吉·贝拉认为不存在改革的“倒退”，直接干预增强只是改革方案在实施过程中的暂时措施。纳吉·道马什则反对这一意见，认为那是“倒退”。不过，这一分歧并不妨碍主流派在大方向上的一致，那就是，他们都肯定六十年代制定的目标模式，确认不完善是相对这一模式的基本原则未能充分实现而言。例如，对市场作用利用得不够；重视计划，调节制度改革，忽视了组织制度的改革；在一些大企业未能充分发挥和运用好物质刺激机制；中央计划中，价值计划不完善；生产过于集中，不利于竞争。他们也是根据这一认识来为进一步改革出谋划策的。例如，要加强企业责任制，加强对企业财产的监督，同时放松对工资增长限制，使责任真正与物质利益挂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促使劳动力和资金流动，并进一步完善商品市场，打破垄断；继续朝自由价格方向努力，强化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相联系，把竞争引进国内；进一步改革国家经济管理机构，加强经济手段的运用，如增收增值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降低利润税比率等；分解垄断性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改变企业领导体制等。这些建议有的已被采

纳，有的将被采纳。

因此，真正的分歧是在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间。

非主流派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科尔奈·亚诺什，他在七十年代末就公开批评匈牙利改革不彻底。最近科尔奈通过提出社会主义模式论，更是间接地突破了六十年代确定的三项基本改革原则的框框。他认为匈牙利目前还未脱出传统体制的窠臼，进一步改革应该是动大刀，而不是小修小补。新的目标模式应以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计划不能再干预市场具体供求，而只限于宏观调节。

鉴于科尔奈也是改革派，但又是另辟蹊径的改革派，鉴于无论是批判传统体制还是设计新体制，科尔奈都不仅不同于本国的主流派，而且不同于捷克、南斯拉夫、苏联、波兰等国的改革理论家。也就是说，鉴于他实质上是在研究方法上另辟了新路子，并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领域中开辟了新天地，我们把他的思想看作匈牙利经济改革理论的另一重要部份，似乎并不过分。为了使我们的读者能够全面领略匈牙利改革理论与实践的魅力，最后，还有必要简略介绍一下科尔奈的思想。

5-4 科尔奈的方法与模式

科尔奈·亚诺什在国内的地位低于主流派经济学家。他只是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但是，他在国外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任世界经济计量学会理事和会长、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主席，在美国、英国、瑞典等国任过客座教授。世界第一部《经济学家名人录》对他作了详尽介绍，并给予极高评价。

的确，科尔奈是个能人。他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素养，比较全面地了解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又谙熟经济系统论、控制论、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又能够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并且一直把自己的研究天地置于现实生活之中。因此，他在研究方法和理论结果上都达到了自成一派、卓有成效的境地。

首先，作为东欧最早批判斯大林模式，提倡分散化的改革和利用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家，科尔奈在研究目标、抽象层次和研究方法上，与其他关注社

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学者，如布鲁斯，兰格，沃德，锡克等人，甚至是匈牙利主流派，还是有不少共同点的。例如，综合运用东西方经济学方法，注意研究调节和控制机制，注意各类体制比较，主张利用市场机制等。但是，如果从总体着眼而不是囿于局部，则可看到，科尔奈的研究方法和结果，与其他学者存在巨大差别。那就是，当别人用规范方法讨论社会主义经济有可能、或应该按什么方式运行的时候，科尔奈开创了使用实证方法来分析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理论。

五十年代中期，年青的科尔奈接受了一项研究任务——分析指令性计划的含义及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他求助于当时各类基础理论和部门经济教材，但很快失望了，因为这些书“不是告诉人们，我们的经济机制实际是怎样运行的，而仅仅叙述如果它按照作者的愿望将会怎样运行”①。于是，科尔奈决心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来了解现实，独立发展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他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极有意义的。理由是，经济改革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透彻了解传统机制下的经济运行实况，否则不可能深刻地理解改革的必要性和明确应

① 科尔奈·亚诺什：《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英文版第8—9页，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9年。

该改什么。同时，选择目标模式的基础，也在于人们必须首先了解一旦建立这样的模式，经济将怎样运行，产生什么后果。否则，判断和选择就陷于盲目。遗憾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告诉人们，现实经济中经济运行状况是什么，而是告诉人们作者希望它是什么，并试图把现实纳入作者希望的框架之中。这样，传统经济学就成了脱离现实，于改革无补的学说。而改变这一学说的面貌，弥补它的缺陷，也就成为当务之急了。

当科尔奈打算描述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的任务时，他也就为自己提出了研究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的任务。因为经济运行过程就是经济活动当事人的行为过程，经济现象只是当事人行为法则的显示。在科尔奈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多地着墨于对经济现象的透视，以追溯导致现象的行为。

不过，科尔奈的研究并没有到“行为”而止，他指出，“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条件产生一定的行为方式。”① 因此，他还透过当事人的行为去寻求决定这些行为的经济制度条件。他的描述传统体制下微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名著《短缺经济学》，

① 科尔奈·亚诺什：《短缺经济学》第669页，荷兰阿姆斯特丹1980年版。

通篇描述企业行为，在结尾一章，科尔奈点出约束企业行为的制度因素——国家的“父爱主义”对企业预算约束过软，行为控制却过严。

因此，科尔奈的实证方法，实际上是一种以特定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主体行为出发，去说明经济现象的方法。它不是科尔奈的首创，而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的延伸。这一方法在科尔奈手中的复兴，显然给他的理论带来了活力。

其次，科尔奈不同于他的同行的，还在于他摒弃了瓦尔拉一般均衡的思想方法。在1971年的《反均衡》一书中，科尔奈对作为西方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作了全面的批判。法国经济学家、洛桑学派创始人瓦尔拉假定，在一个充分竞争市场上，所有商品生产者出卖了想卖的商品，买回了想买的商品，那就是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同时达到供求平衡，既无短缺，又无剩余，这就达到了一般均衡。瓦尔拉还试图用数学联立方程来证明一般均衡的可能性。科尔奈承认一般均衡理论代表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经济学智慧的顶峰，他认为，在瓦尔拉之后，经过冯·诺意曼、沃德、阿罗、萨缪尔逊、德布鲁、库普曼等人的工作，一般均衡理论已发展为逻辑严密的大厦。但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分理和假设存在严重的缺陷，导致数理经济学推导出

的结论不可信或缺乏现实意义。科尔奈例举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十二条分理和假设，也陈述了八种改良理论。他认为，改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十二条分理与假设脱离现实的缺陷。在现实中，存在垄断，一般均衡论却假设“原子化”的市场和完全竞争；在现实中，存在生产集中和飞速的技术进步，一般均衡论却只考虑规模收益递减；在现实中，信息结构错综复杂，一般均衡论只有价格信号；在现实中，人们之间利益冲突尖锐，一般均衡论却显示和谐，等等。由此，科尔奈下结论道，现实经济是围绕着某种状态波动的，但这并不是瓦尔拉的均衡状态，而是从某一方面持续偏离瓦尔拉均衡的“非瓦尔拉均衡”。这种“非瓦尔拉均衡”并不意味着一个经济体不能保持自我再生，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在更为现实的“非瓦尔拉均衡”状态下去分析它的运行。

在批判一般均衡理论的同时，科尔奈建立了自己实证分析的方法体系。他从现代系统论和控制论出发，把经济系统的运动分为两个运行过程。一个是实际过程，即指具体的生产、消费和产品转移；另一个是控制过程，它包括观察、信息传递与收集，决策准备与决策等。整个经济系统由组织和单位构成，按一定规则行为并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这种行为引起组织或单位内部状态的改变。如果这

一改变的内容属于实际过程，这一单位就是实际单位。虽然实际单位内部又存在控制和实际单位，但就总体而言，它是经济系统中的下级。除实际单位外的单位为控制单位，它们是经济系统中的上级。在控制单位对实际单位进行调节时，实际单位内的控制单位又对实际单位进行调控。

因此，经济运行过程是多层次、多等级控制。控制的信息除价格型的外，还有非价格型和货币流两种。现代经济日益复杂化，非价格型信息也在大量上升。此外，科尔奈还强调，决策者初始的决策愿望（渴望），和他最终受客观条件制约形成的决策之间存在差距，这是导致“瓦尔拉均衡”不可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在经济分析中重视非价格信号的作用，重视“渴望”与实际决策之差距的作用。

遵循着应在经济分析中重视非价格信号的作用的思路，科尔奈在1981年又写就《非价格控制》一书。在此书中，他进一步对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作了抽象的考察，提出经济中除了价格机制、指令机制外，还存在以投入产出存货信号和买卖双方直接联系为基础的，亚微观层次上自发形成的植物控制机制，它不会随其他机制变动而迅速变动，而按经验形成的正常值来调节经济活动，所以是一个稳态

机制。但在不同体制下，正常值又是不同的。所以说，植物控制机制又受体制或其他控制机制的影响。根据这一思想，科尔奈还描述了“按正常值控制”（即非价格的数量控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抽象模型。

科尔奈把他的方法运用于对东欧社会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1957年，以匈牙利轻工业为分析蓝本，他写出了《经济管理中的过渡集中》一书，对指令性指标体系本身和在它控制下的企业行为作了细微的实证分析，对传统体制作了批判。其深度和力度超过了当时其他同类著作。进入八十年代，科尔奈又写就《短缺经济学》和《增长、短缺和效率》二书。

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科尔奈以短缺为中心议题，对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重点是企业的经济行为作了详尽的实证分析。科尔奈认为，一般来讲，企业在扩大再生产中会遇到资源约束、需求约束和预算约束。资本主义经济处于总体买方市场之下，故需求约束为主要约束；社会主义经济则相反，企业按指令生产，能否完成指标的主要约束是投入要素，即资源的约束。短期情况下，企业以按瓶颈（短缺资源供给量）生产，或强制替代，或改变产品结构三种方式调整生产。由于产出是指令性

计划，故三种方式中又以强制替代为主。结果，在资金无偿的条件下，企业向上级多要资源并加以囤积，对产出却反应迟钝，这就导致短缺。企业这一行为特征，在长期中则表现为扩张冲动和投资饥饿，它加剧短缺。由此出发，科尔奈把短缺分为四种类型：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横向短缺；物资分配调拨中上下级之间的纵向短缺；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之间的内部短缺；和整个社会生产能力被高度利用的能力短缺。前三种短缺交错着起连锁反应，最终形成第四种短缺，即整个经济成为短缺经济。科尔奈还指出，企业上述行为赖以存在和持续的体制根源，是由国家与企业之间存在的父子关系造成的企业软预算约束。正因为是体制造成短缺，因此短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常态。科尔奈在书中还谈到，软预算约束还导致企业对价格信息反应极不灵敏，以致于“非价格控制”分析中的许多结论，对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是适用的。

《增长、短缺与效率》则是科尔奈论述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动态运行理论的著作。他以西方学者哈罗德、诺意曼以及波兰学者卡莱茨基的增长理论为基础，把短缺作为新的变量引入增长模式，并运用他区分实际过程和控制过程的多层次控制思想，从控制角度出发，把经济政策制定者、计划者

和中央管理者，也看成经济系统的内生部分，描述了在增长过程中参与多层次控制的所有层次的联合反应。这样，科尔奈把社会主义增长理论又推进了一步。

有人批评科尔奈破得多，立得少，从而违背了他倡导实证分析的本来目的。从科尔奈目前发表的著作来看，确实有这样的倾向。但我们以为不能对他过于求全责备。以一个人有限的人生和精力，能把一个侧面的问题研究透彻已属上乘，况且他开拓的本是基本上一无所有的处女地。此外，事实上科尔奈并不是完全没有规范理论，恰恰正因为有，他也就从过去与主流派站在一起，到现在走到了主流派的前面。

科尔奈在五十年代，与主流派学者一起倡导把市场机制引进计划经济，并为设计其具体运转机制煞费苦心。1965年，他在和T-利普塔曼合作的论文《双层次的计划工作》中指出，经济制度是多层次的，信息流动分为同层次的横向流，和不同层次之间的纵向流。市场经济中，横向流占主导地位，随着政府干预加强，纵向流增加；在社会主义传统体制下，纵向流占主导地位。照他的看法，极端的“横向”或“纵向”流占主导，经济都运行不好，应该使两者结合。为此，他尝试着把社会主义经济

体系划分若干层次，提出了一个使制定计划所需的信息能够在体系中上下流动，迅速传递和反复交换，形成能够自我调节和控制的系统的多层次规划模式。尽管这一模式高度抽象，并忽视了信息传递的时间差和利益关系对信息的扭曲，因而可行性较差。但它以协调互相依赖又互相冲突的经济主体的活动为目的，就表明它与保留传统体制，仅仅寻求使计划优化的技术手段的模式不同。多层次规划模式完全可以看作科尔奈在当时设计的改革目标模式，显然，它与主流派倡导的三项基本原则没有本质区别。

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实践的磨炼，科尔奈改变了他的想法。从理论上说，他从过于忽略价格机制的作用，转向重视它的作用。具体到匈牙利的改革上，表现为他对匈牙利改革的批评和在目标模式上与主流派有不同的构想。后者当然也是科尔奈的规范理论。这一构想在1985年9月于中国“巴山号”轮船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上，得到了系统的表述。

在科尔奈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从协调机制角度去分类。作为正常状态的协调机制可分为两类：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每一类又含有两种亚类。

行政协调机制的两种亚类为：直接的行政协调（ⅠA）；间接的行政协调（ⅠB）。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依靠上下级隶属关系，通过纵向的信息流和行政手段来控制经济运行。两者的区别在于纵向调节手段不同。在ⅠA中，行政机构以对企业下达具体的指令性指标，来调节控制经济运行。在ⅠB中，指令性计划已取消，行政机构假助手中的权力，通过各种形式的干预，迫使企业作出符合行政机构的意图的投入产出决策。

市场协调机制的两种亚类为：无控制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它们的共同点，都是通过企业间的横向信息流和市场力量来协调经济运行，而区别则在于，ⅡA中没有自觉的宏观调控，经济运行几乎完全受市场机制盲目调节，而ⅡB中，社会中心要借助统一的和规范的宏观约束手段或经济参数手段调节经济，使之按符合宏观比例运行。并且，对通讯、电力等公共部门还要实行直接管理。

科尔奈特别强调了ⅠB与ⅡB的区别。他指出，虽然两者都是间接控制，但在ⅠB中，行政机构实际保留了对微观活动的大量频繁的干预，企业预算约束仍是软的，它们在相互依赖的同时，仍旧依赖国家；而在ⅡB中，除了与宏观比例有关的活

动，社会中心要加以约束外，企业活动要尽量符合市场要求，企业预算约束也完全硬化，与国家的利润分割则法律化。

从上述分类出发，科尔奈把传统体制归为ⅠA，认为它是改革的起点。因此，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应在ⅠB、ⅡA和ⅡB之中。他又认为，ⅡA不足取。因为南斯拉夫的自治比较接近ⅡA，结果是宏观失控。ⅠB也不足取，匈牙利则是样本。科尔奈指出，人们已倾向于把匈牙利作为改革成功的范例，事实上，匈牙利虽然表面上已取消指令性计划，但间接的行政干预仍大量存在；老百姓形象地称这样的经济为“电话经济”。“电话经济”比ⅠA好，但由于未从根本上脱出传统的行政调节机制，存在的问题仍很多。据此，科尔奈认为，匈牙利不能满足于形式上取消指令性计划的ⅠB状态，而应当继续改革，其目标则应该是Ⅱ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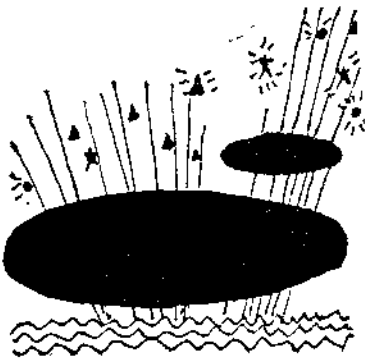
匈牙利之所以会出现“电话经济”，根本原因在于主流派设计的分权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制，没有解决“二重决策标准”的矛盾。（也就是说，市场决策标准是反映消费者偏好的自由价格，计划机构决策标准是社会偏好，二者发生差异，计划机构要企业服从计划而不是市场，那么，尽管是间接干预，最终企业还是听命于国家，市场也就没起

作用。关于这一点，下面介绍布鲁斯模式还将展开讨论。）尽管科尔奈没有正面陈述这些原因，但至少他是感受到问题的症结的。因此，他才会改弦易辙，提出以类似于捷克学者奥塔——锡克模式的ⅡB模式为改革目标。当然，他对这一模式的描述比锡克粗略得多，但明确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节机制，已足以使他脱出主流派阵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肯定科尔奈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开创性意义，并不等于说他的方法和理论成果是至善完美的了。例如，科尔奈在实际分析中点到了制约企业行为的财产关系问题，但他始终没有作过正面分析，从而不仅使实证分析缺乏深度，而且影响他在多层规划理论中，在ⅡB模型中，均缺乏对这一经济运行先决条件的规范性意见。又例如，他对“应该怎样运行”的规范问题研究较少也是事实，这同样影响他对实证分析的进一步深入。但是，考虑到它是匈牙利改革土壤上脱颖而出的新学说，考虑到除科尔奈之外，匈牙利还有一批持同样方法论和思想的学者，如T·鲍厄、K·A·苏斯、A·蒂克、A·巴拉萨、M·塔多斯等，我们决没有理由因为它有缺陷而忽视它。谁能肯定，它将来不会成为匈牙利改革的指导，科尔奈流派不会成为匈牙利的主流学派呢？谁又能肯定，科尔奈的学

说不会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发生巨大影响呢？

正因为匈牙利有理论上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争议，并且，以科尔奈为首的新的流派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正因为匈牙利人不仅有继续改革的意愿，并在实践中已从ⅠA走向ⅠB，为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匈牙利人在创新的同时又比较谨慎，善于总结经验和抓住时机，因此，可以相信，匈牙利人能够面对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交出更令人满意、给人以更多启迪的答卷来。



第六章
铁蹄蹂躏不了思想之光

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罗莎·卢森堡

6-1 捷克人的醒悟

在现代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南斯拉夫的自治与实践，波兰人的经济思想，匈牙利学派的言论与行动都是独树一帜的。而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方圆仅有十二万七十四平方公里，人口为一千五百万左右的国家，虽然改革夭折，经济学学术发展受压抑，但未实施的1968年改革方案与锡克模式，作为捷克民族的思想精华，因具有自己独特的风采而同样给选择改革道路的人们以启迪。

二次大战以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虽然只有不到二十年的历史，却是世界上十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人均国民收入约280美元，仅次于法国，尤其是机械工业，在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

战后，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前面谈到过的第一种方式，即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联邦制政权，并在经济领域里通过国有化措施，逐步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即苏联的斯大林模式。

捷克经济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摧残，百业凋敝，民众困苦，物资匮乏，资金奇缺，战后初期，面对着一片废墟，急需集中力量重建经济。而停止破坏就是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有力条件。中央集权的经济制度，集中了社会大部份资源，投入到那些破坏最严重，最急需发展，并能带来较快增长速度的部门。因此，经济发展的方式几乎全是粗放式的。在起点为零，百业待兴的条件下，数量增长是唯一目的，它几乎不会遇到任何资源的限制与效率的阻碍，也不会遇到国民经济内部的、行业领域的比例问题，几乎不需要实行经济平衡，也没有必要去选择最优资源配置结构与计算投资的社会效益，而经济增长的速度仍是相当高的。

在战后支配各国经济恢复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表现为这种状况。这告诉我们，客观经济条件决定了处于战后恢复时期经济过程阶段的经济制度与斯大林模式的矛盾冲突不明显。在短期内，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是能够得到维持的。但这种特殊经济

条件下产生的效果恰恰模糊了人们的视线，而误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斯大林模式在初期的顺利推行，并不等于它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存在矛盾。相反，正因为存在矛盾，经济越是发展，它的消极作用越是表现得突出。当时的捷克与苏联出于同一原因，患上了中央集权计划体制下的通病：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体制的矛盾日益严重，劳动力严重不足，资源浪费严重，投资效率低下，迫使经济增长率下降。见下表：

捷克斯洛伐克1950——1964年主要经济增长指标：

年份	社会产品（与上年相比）	以48年为100	国民收入（与上年相比）	以48年为100
1950	14.9	125.9	10.2	121.2
1953	5.8	158.4	6.4	156.3
1954	4.5	165.7	3.5	161.9
1955	10.2	182.6	10.3	178.5
1960	6.2	266.7	8.7	250.9
1961	6.1	285.3	6.8	207.9
1962	2.9	293.9	1.4	271.6
1963	0.0	293.9	-2.2	265.6
1964	2.9	302.1	0.9	268.1

（资料来源：奥塔·锡克《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显然，六十年代初，国民收入出现负增长时，粗放发展的潜力已穷尽了，经济生活中的严重困难迫使人们寻找根源。党内一部份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逐步看到了斯大林模式对捷克经济发展的危害，与他们的苏联同志一样，开始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理论基础产生怀疑，进而又试图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批判与清算。理论上的求索与全国上下改革的呼声，汇成了推动体制改革的洪流，在苏联“利别尔曼建议”的刺激下，改革终于问世。

捷克体制改革的背景是很复杂的。由于其起因不同于南斯拉夫人的自觉意识，而和苏联一样，是被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所迫，这就更加深了改革的难度。五十年代末，经济发展中的矛盾日益突出，当时捷克领导人诺沃提尼追随赫鲁晓夫，也在五十年代末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他的命运并不比赫鲁晓夫强多少。由于改革同样只涉及工业管理权限在部门与地区之间重新分配，尤其是在部、总管理局、企业之间重新划分，即将总管理局撤销，而代之以生产经济单位（相当于行政公司），企业仍然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因此，这一改革对于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无明显作用，对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平衡的作用亦微乎其微，国内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并没有缓和，反而在某些方面激化

了。

六十年代初，随着捷克体制的积弊日深，经济每况愈下。1963年，国民经济收入下降了2.2%，使国内改革的呼声更加高涨，面对此情此景，诺沃提尼不得不同意进行体制改革，并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体制改革委员会），策划实施方案。但由于领导集团中存在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再加上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使一些改革方案束之高阁，当局只能实行零敲碎打的“局部完善”，当然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终因国内经济的严重问题与政治上的孤立，加上追随赫鲁晓夫而为勃列日涅夫集团所不容，诺沃提尼被迫下台。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下，改革派势力上升，在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中成为优势。党内领导集团多数成员投改革旧体制的赞成票。在杜布切克出任捷克总书记后，又有一大批力主改革的激进知识分子进入最高决策圈，如姆林纳日，奥·塔·锡克，从而推动了改革的深入。

1963——1964年期间，由锡克领导的经济改革委员会，设计了一个新的体制模式，提出了全面改革旧体制的具体方案。他们主张用方向性计划代替指令性的行政计划，引进市场机制，使经济逐步转

上市场经济轨道，企业成立工人委员会，实行自治。企业的收入与经营成果挂钩，企业的投资自主决定。方案提出后，就停留在讨论阶段。直至1966年4月，捷共中央才通过《关于加速实施新管理体制的原则》的文件，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主要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变指令性计划为宏观协调计划，引进市场机制，扩大企业权限等等。1968年春，捷共中央决心把改革向前推进，又通过了一个《行动纲领》。该纲领提出要将经济工作和政府与党的工作分开，企业实行自治，由工厂委员会实行领导，改国家任免企业经理为工人委员会选举制，企业可自由参加或退出各种公司，企业的生产完全自主决定，计划只决定企业收入中投资与收入分配的比例，而投资权限则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显然，如果实施这一方案，将使整个经济纳入自治型的市场经济轨道。

显而易见，捷克改革方案是个较彻底的行动计划，它基本上否定了旧体制，全面引进了市场关系，被认为是一个转变程度仅次于南斯拉夫自治的改革构想。这必然受到国内反对势力的攻击，并引起苏联的不满，它们视摆脱旧体制窠臼为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将改革方案斥之为“修正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潜伏着危机。

6-2 “布拉格之春”与改革夭折

“布拉格之春”使危机与改革热潮同时显现。捷共党因长期的个人独裁统治与民主空气的缺乏，使社会上的不同意见，社会各阶层的意志没有正常表达渠道，极大地伤害了广大群众与知识分子的感情，追求民主自由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心声。

1968年春，杜布切克出任总书记时，党的领导阶层中的改革派暂时占了上风，取代了守旧的官僚集团。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沿用过去那种惯用的领导方法，少数人说了算。为了彻底战胜旧的保守势力，使自己的政治路线得以实施，改革派又不得不诉诸舆论与新闻工具，利用人民的情绪来推进这一历史变革。结果，在1968年春天，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闻自由，和以此为基础的舆论得以迅猛发展，民主化与自由运动的步伐迅速迈进，乃至于与其它方面的演变不相称。这就是所谓的“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的基调，就是1968年4月5日党中央批准的《行动纲领》，它表明党内改革的决心，已经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行动。而把布拉格之春推向高潮的则是由教授学者签名的《二千字宣言》的问世，它

使整个捷克沸腾了。

捷克国内民主运动的高涨，改革步伐的加快，强烈地刺激了早就忐忑不安的苏联领导集团，他们看到了这种改革有危及它的霸权地位的可能，并感受到这种可能有变成现实的危险。因此，一开始就采取的压制态度逐步升级。他们认为捷克的体制改革是企图倒向西方资本主义，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认为捷克的改革方案是搞修正主义，并软硬兼施，用各种手段诱迫捷克领导人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政治、经济等手段均已失效的情况下，苏联终于诉诸武力，于1968年8月20日深夜，侵入捷克，逮捕了改革派的领导人，迅速更换了捷克党内的最高领导层，清除了大批改革派成员，并强迫签订了全盘否定改革方案与布拉格之春的《莫斯科条约》，随后，全盘恢复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从理论上对改革和其理论基础进行了批判与否定。捷克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至此夭折。

这样的结局，显然使一切拥护改革的人们感到失望和沮丧。但是，改革既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要求改革的人们又总会在失望之余去总结教训，以使第二次、第三次行动能够成功。捷克改革所出现的曲折给人们提供了些什么教训呢？

改革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不够而仓促上阵，是失

败的最根本原因。

和匈牙利在改革正式开始前在党内统一了思想，并在组织上、意识形态上和经济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不同，和南斯拉夫党内基本一致地自觉要求改革更不同，捷克的改革既是迫于形势，又是一哄而起。因此，在开始体制改革时，党内思想尚不统一。尽管民众已在推进改革，但党的领导阶层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具体实施的方案步骤，都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对立，在党内主要领导人更替之后，这些分歧也没有完全解决。这表明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是不充分的。它又导致宣传工作的乏力，干部培养的不足，和组织系统的紊乱，以致整个管理系统还不能迅速适应改革的环境。一旦改革中出现突然事件，上至中央，下至基层，均束手无策。再加上政治上的矛盾，党的领导方法的保守，终于出现许多不可控制的混乱局面。尽管"布拉格之春"中出现的工人学生游行，新闻检查制度的取消，到最后出现联合发表的《二千字宣言》，表现了民主运动的高涨，但问题是党内领导阶层还处于能否战胜反改革力量的政治斗争之中，无暇也无力引导这一运动，而只是被迫应付这种不断变化的局面，这必然影响改革的正常步骤，使在政治上尚缺乏分娩条件的改革，过早地宣布自己的诞生，以致于被外部反

对派势力所扼杀。而在这时，改革派领导人也没对这种外部力量有足够的认识，在思想上物质上也未作好应付外力的充分准备，没有采取措施控制国内局面的发展，以避免刺激外部的反对势力，终于导致悲剧的发生。

捷克1968年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流产了，但布拉格之春产生的深远意义是无法抹杀的。捷克改革的民主运动对社会主义各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不仅同情捷克人民，从捷克人民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更为重要的是，实践的失败，并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之光泯灭。它照亮了后继者的道路。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学者、专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奥塔·锡克，尤里·考思塔等，流亡国外，继续从事研究和探索，进一步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他们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模式，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6-3 锡克模式——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理论尝试

奥塔·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最著名的经济学

家，曾任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政府副总理和经济部长，设计了1968年捷克经济改革的方案，并亲自参与领导了改革运动，苏军入侵后定居瑞士，在风景秀丽的“中立之邦”，最终完成了被称为锡克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计方案。

锡克模式的基本前提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与企业自治。它的理论基础是通过对利益关系的分析和对现代经济运转的分析，论证了市场关系的必然性，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可能性。

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益关系的分析，是锡克的得意之作。锡克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有内在矛盾，即具有二重化倾向，一是利己主义的利益，二是由社会关系制约的满足他人需要的利益，即利它主义的利益。同样，集团利益也因为集团成员个人利益的强度作用而表现出差异，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它对生产、分配、流通等经济活动产生根本性的制约作用。锡克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分析，得出了商品生产只与私有制相联系，社会主义社会将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结论。但是他们所观察到的对象只是私有制下的商品关系，而如果从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那么就可以看到，商品经济的主要矛盾并不是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

的矛盾，而是一种更深刻的更具有普通性的矛盾，即社会集团的利益矛盾。这是商品生产的最终的根源，它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个人利益、集团利益的差异及其独立性，必然地要求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

因此，锡克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决不象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交换的“外壳”而已，也不仅仅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交换方式，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必然形式。具体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客观经济条件的认识具有局限性，在经济信息的收集处理，生产方向，投资结构的调整上不可能与客观需要完全吻合，从而最终会表现为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二是在社会主义现阶段人们利益上的矛盾，同样会使经济中产生各种矛盾。例如，在旧体制下，人们为了得到较多的奖金，只是倾全力完成数量指标，而不关心产品的需求与质量，甚至不惜提供假情报，修改统计数据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种由利益关系产生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传统的教条理论根据马克思的几条原则，就宣称通过中央指令性计划完全可以克服这些内在矛盾；他们不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利益结构，也不承认集团利益的矛盾，使得“计划规律”

与经济规律对立起来，导致经济生活矛盾的加剧。而数理经济学派与计划计算学派（包括苏联的康托洛维奇·诺沃日洛夫）在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时，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改善计划的科学性，提高情报的准确性，企图利用现代电子计算机与数学工具解决这一矛盾，也看不到利益关系的本质与市场关系的必要性。

因此，锡克指出，要解决人们利益结构上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唯一的途径就是利用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即市场关系，利用市场来制约生产者，对社会劳动产生客观评介，调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它不仅仅是一种摆设品，而是实际的经济调节力量。

然而，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益结构与私有制商品经济中的利益结构又有着区别，因为生产关系作为客观力量迫使个人、集团在追求个人利益时，还要追求一种共同利益。公有制前提下出现的利益一致化，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按照社会的意图加以计划管理，公有制企业的相同地位使得共同协作成为可能，这是社会实行计划管理的基础。但是，这种计划管理决不可能否定企业的本身利益，也保证不

了企业的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完全一致化，它最多提供一个社会性的方向，而每一企业的生产与社会需要的矛盾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加以消除。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管理与市场机制有可能并存且互相协调。

锡克模式的另一重要理论支柱是从经济运转角度，分析了经济平衡、市场机制、计划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了计划管理与市场机制的不同作用领域及其结合点。

锡克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出发，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经济平衡的条件，得出了经济平衡增长必须依靠国家对剩余产品分配实行调节的结论，认为国家的非生产性投资是吸收过剩产品和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重要条件，因此，他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进行了修改，在两大部类后又加上了一个第三部门（D′），即：

$$(1)\ Pr_1 = C_1 + C_{11} + (S_1 + S_{11} = J_1 + J_{11})$$

$$(2)\ Pr_{11} = V_1 + V_{11} + R_1 + R_{11} + (St_1 + St_{11} = D')$$

$$(3)\ V_1 + R_1 + St_1 = C_{11} + J_1$$

Pr_1为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价格总值；

Pr_{11}为被生产出来的消费品价格总值；

V_1为第一部类中所有生产人员的纯工资（扣除税款后

的原工资和新增加的工资即$V = mV$）；

V_{11}为第二部类中所有生产人员的纯工资；

R_1为同一部类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R_{11}为用于第二部类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S_1为第一部类中资本家和雇佣人员的储蓄；

S_{11}为第二部类中资本家与雇佣人员的储蓄；

C_1为第一部类消耗掉的生产资料；

C_{11}为第二部类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

J_1为用于第一部类追加投资的那部分储蓄；

J_{11}为用于第二部类追加投资的那部分储蓄；

St_1为第一部类中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缴纳的税金；

St_{11}为第二部类中资本家和雇佣人员缴纳的税金；

D'为国家用于第三部门的总支出（靠征税所得并主要用于直接和间接消费的支出）。

上述宏观生产结构的确立与宏观收入分配相协调，表明生产与消费、储蓄与投资、国家税收与社会开支之间的均衡关系，这是均衡增长的条件。这一条件称为宏观平衡。在宏观平衡条件确立的前提下，结构性的不平衡仍可能出现，个别部门、个别商品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但这种结构性的不平衡不会导致宏观平衡的破坏，它会毫不困难地通过市场机制得到克服。而这种结构性的平衡可称为微观平衡。

在现代经济中，宏观经济平衡与微观经济平衡

的条件经常会被破坏，但原因不一样，宏观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的原因在于利润和工资的分配同两大部类生产不相协调。在各种产品按比例增长条件下，如果国民收入中利润部份增长快，工资增长慢，这时就会出现消费品生产过剩，消费品生产部门就会缩减投资，就会迫使第二部类也开始减产，导致经济衰退。而微观不平衡是产品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是由于消费习惯、市场信息等原因所致。

锡克认为，针对两种不平衡产生的原因，社会主义应采取不同的措施来消除它，宏观不平衡的解决只能通过国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和控制加以解决，而微观不平衡则须通过市场机制来克服。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却认为只能用排除市场机制的指令性生产计划来解决宏观上的紊乱，这实在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既然宏观失衡并非源于市场，那么克服这种失衡的出路决不在于排除市场机制，而只能对宏观的收入分配实施调节。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失衡与周期性经济波动在于其国家无力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实施强有力的调节，迫使经济实施自然约束，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全有可能通过更完善的市场机制来保持微观经济的平衡，而同时通过实施宏观的收入分配计划，对国民收入、积累与消费、投资

与储蓄进行有意识的调节，维持社会总供求与总需求的平衡，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

这一理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应该保持市场机制的作用，以维持微观经济的平衡，而计划只在宏观的收入分配领域里发挥调节作用，两者的作用可以并行不悖。

锡克模式运转的核心是市场机制。它对于企业的经营，市场供求的结构，生产者、消费者利益的平衡起着调节者的作用。但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否则企业不会关心自己的生产结构适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要，并力求提高效率。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基本条件可归纳为：（1）买方市场；（2）充分竞争；（3）利润差别；（4）均衡价格；（5）投资发展；（6）企业活动；（7）企业的关闭。

为了完善上述条件，锡克在其模式中构造了一个以市场机制运转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结构：

第一，实行企业的独立化。企业作为独立经营的实体，与任何行政机关脱离关系，它唯一可依赖的，就是市场。当然，国家仍然保持着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所有权，企业独立支配这些生产资料，但不是实行企业所有制，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收入的分配上，国家可通过财产归属权而取得一

部分收入的支配权，同时对收入在各个部分的分配实施调节。除此而外，企业对生产、投资的选择和利润的支配都具有支配权。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自治与经理负责制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在企业中主要设立三种机构，一是管理部门，它是企业的行政领导机构，由厂长、经理实行负责制，处理企业日常生产事务；二是工人自治委员会，它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有权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经营战略等，并直接任免企业的经理，当然，自治委员会成员须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三是工会组织，它负责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协调各种机构之间的关系。而政府的一些管理部门及一些行业组织，主要职能在于确立本部门、行业最优的技术发展战略，组织技术攻关，培训干部，预测市场等。

第二，取消指令性的生产计划，由企业根据市场供需状况制定具体的生产计划，同供需单位订立合同。企业可以自主招收和辞退职工，上级管理机关不得用行政命令加以干涉。企业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自主地决定生产的专业化和联合化，或参加公司，或退出公司等产业组织。企业有权决定本身的发展规划，技术开发计划，投资计划，风险自负，上级管理机关也不可横加干预。在收入分配上，除了工资与分红占利润比例由计划控制外，奖

金的发放，也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与劳动的贡献由企业自主决定。

第三，企业自主地决定纯利润的使用，即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投资决策，包括企业的扩建与创业。由于现在企业必须满足市场的需求，并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才能在竞争中获胜，因此，究竟是选择技术改造性的投资还是单纯扩大规模，由企业根据当时的实际效益核定，其投资方向也就不会偏离社会需求结构的引导。企业对投资要负担全部风险（投资失败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个人收入），使利益与决策连结起来，可以减少滥用社会投资而不负任何责任的现象。当然，由于单个企业对市场的预测及其准确性毕竟有限，尤其是在创业时，更需要长远的预测，这就要求国家管理机关与行业协调组织利用其特殊地位与功能，进行较长远的预测分析，向企业提供决策的信息。但这不是代替企业进行决策，而是为企业的决策提供参考与服务。只有那些经济的基础部门与公共部门，才需国家投资的直接介入。

第四，广泛利用市场机制的最重要之点在于实行市场价格。只有实行市场价格，才有可能开展企业之间的竞争，才能形成均衡价格。否则，利用市场机制难免成为一句空话。在这方面，锡克模式在

捷克1968年改革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演变。在1968年改革过程中，国家没有完全退出投资领域，行政性的投资决策不可能完全根据市场信号。因此，模式中保留了由计划部门通过核算成本与利润来确定生产价格的形成，但这种计划确定的生产价格并不是需要企业具体服从的产品价格，而是对主要产品大类规定的一种基础价格，它只对国家或企业的投资和生产选择起指导作用，不是传统的指令性的行政价格，这种价格本身也随着市场的变化而不断地加以调整。1968年改革失败后，锡克模式就更趋向于价格的自由形式，计划测算价格的过程仅仅被作为改革过程中的过渡措施，一旦通过测算调价后，现有计划价格水平接近市场价格，就必须放弃任何管理，由市场自由竞争形成均衡价格。

当然，这一模式也考虑到了市场竞争机制在现实经济中的不完善，它的积极作用会受到干扰，因而提出了维持市场机制运转的外部措施：一是实行反垄断措施，限制部门内企业的过分集中化，而当国内市场难以竞争时，可引进国外市场力量，打破垄断，或者由国家收取垄断利润税；二是利用税务、银行、统计机关观察企业的收支与供求状况，定期公之于众，提高市场透明度，减少盲目性。

锡克模式还设计了相应的宏观控制机制。

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必须废除指令性计划。那么宏观控制怎么办？锡克通过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分析，从苏联、东欧诸国在完善指令性计划指标的设置方面多次折腾的教训中，归结出一个宏观控制的方案，那就是实施宏观的收入分配计划，以保证经济的平衡与稳定增长。

宏观收入分配计划（简称宏观计划）的任务，是调节社会工资总量与社会消费品总量、社会物质资本、利润总量与生产资料产品总量的平衡，具体可归纳为下列几项：

（1）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

（2）按照所希望的生活质量的发展，从宏观比例上调节消费的发展；

（3）调节投资比例，以调节经济发展速度；

（4）保持或改变个人收入政策；

（5）保持或达到所希望的劳动时间，职业变动及社会医疗保障等条件；

（6）使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所希望的一致、和谐；

（7）创造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条件，合理的工业及城市布局；

（8）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结构与能源基地；

（9）达到社会所希望的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

这些任务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所以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那么，如何保证这些目标得以实现呢？

在锡克模式中，这种宏观计划是借助于调节一定的分配过程来实现的。即通过对生产的预测和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控制来引导生产、投资和消费。在两大部类比例协调的情况下，部门内部各种产品供求结构，通过市场机制加以协调。这样，宏观计划就在不排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前提下，发挥其功能。将经济发展导向计划目标，而不是直接给生产与投资划框框。

这一宏观计划的基本实施过程为：第一，预测生产的增长，由此可以计算出需要增加多少投资，增加多少劳动力，并推算出生产力提高的实际可能性，从此再推算出大致的利润水平；第二，根据社会所提出的计划目标，如经济增长速度，个人消费与社会消费的比重等，并根据投资与增长之间的客观比例（投资系数），决定社会产品的使用，其中主要对国民收入的调节。规定补偿性投资（重置投资）和纯投资的比重及其增长速度，并确定个人消费与社会消费的比重。生产增长预测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调节，是不断反复互相作用的过程，这两者互相接近与协调，就保证了计划目标的实现。

这一宏观计划在实施中要借助于一系列强制的或非强制的经济调节手段，这些调节手段顺序按以下五个步骤出台：

（1）政府按计划规定统一的工资等级表；

（2）计划规定税收在利润中所占的比例，以确定社会消费的规律；

（3）规定职工分红在利润中所占的比例。而规定了税收与分红的比重，也就规定了纯投资在利润中的比重，也就基本上决定了对生产增长的调节；

（4）计划必须预测个人储蓄在工资中的比重，并限制消费信贷的总额，以保持消费信贷与个人储蓄余额的平衡；

（5）计划控制投资信贷的总规模，以保持投资信贷总额和利润中的储蓄余额及个人储蓄中可用投资部分总和的平衡。

此外，宏观计划对税收的使用还应进行详细分类，确定社会福利、劳务开支、行政开支、国防费用的比例，其中，国家基础部门与重要能源部门的发展资金同样要由宏观计划规定。

总之，宏观计划的基本实施手段是控制几个主要的收入分配变量；它借助于第一个调节变量工资，第二个调节变量税收，第三个调节变量利润分

红比例，第四个调节变量消费信贷，加上对工资储蓄比例的预测，就可保证第二部类的生产与社会消费的平衡。而通过对纯利润和投资信贷的控制，就可使纯投资额得以控制，保证第一部类生产与社会投资规模的平衡。通过对社会福利与劳务开支的调节，则保证了两大部类生产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平衡。

因此，锡克指出，能达到宏观经济平衡的，不是排除市场机制的生产投资的指令性计划，而是控制收入分配变量的宏观分配计划。

6-4 创新与矛盾——锡克模式的实践意义

苏军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格之春的梦想，锡克模式在捷克尚未一试身手，就消声匿迹了。然而，它却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在许多国家的改革理论与实践中，可以看到锡克模式的影子，其中，首推匈牙利及我国的经济改革。

匈牙利在1968年经济改革初期，为了搞活微观经济，一举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宏观间接控制未跟上，造成了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失控现象，尤其是

投资总量、消费基金总额失控，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施之以行政收缩措施，则收效低，代价大，不利于微观经济的放活。后来，从建立健全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入手，实行了企业收入的三阶段调节措施，从而使指令性计划取消以后，总投资与总消费基金的膨胀得以控制。

锡克模式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同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当向企业放权后出现投资与消费基金膨胀，行政控制处于收缩与放活的两难处境时，人们认识了锡克宏观收入控制理论的作用，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这在下面我们还要详细论述。

除了南斯拉夫自治理论外，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改革理论与方案中，锡克模式是最彻底地利用市场关系的样本。可以说，他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经济运行学说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是独树一帜的。无论是理论上的批判，还是实践中的困难与阻力，都抹杀不了其巨大的理论、实践意义。

锡克模式的产生，是力图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分析、解决社会主义现实经济矛盾的尝试。它有力地批判了教条主义者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捍卫者，给形成于斯大林时期的传统学说以致

命的打击。锡克认为，教条主义者虽然口口声声喊叫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只是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个世纪前的某些结论，甚至只择其片言只语来指导实践，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条化与实践中的种种矛盾困难。因而，他坚决主张以现实经济运动为理论支点，通过剖析社会主义的利益关系以及经济运行矛盾、规律性，来提炼经济理论，设计经济运行的模式与改革方案。锡克的以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为基本格局的体制模式，不过是其思想实践的结晶。这些认识过程及其理论结果，实际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改革实践的发展。

然而，必须承认，世界上没有至善完美的理论。拓荒者的路，不可能笔直，有创新，就会有矛盾与局限性。锡克模式的产生，也受到理论、实践以及历史环境的种种限制，因而存在着种种矛盾与缺陷。

第一，锡克模式推崇市场机制及其企业的独立性，但没有对国有制财产关系的相应改革予以重视，没有充分认识到国有制条件下企业自治所带来的追求人均收入极大化及其利益关系的矛盾。锡克承认市场条件下，企业具有的独立性与利益要求，认为这是自主经营的内在动力，他也考虑到了自治

企业追求人均收入极大化的行为，这必然导致企业个人收入膨胀，投资扩张，而积累率低的弊病。因而他主张通过宏观收入分配计划的调节、控制来制约企业的消费、投资、积累过程。但这种宏观控制纯粹是外部力量的干预，是强加于企业的约束。锡克模式的很大缺陷就是没有考虑从所有制关系入手，调整企业的行为，使企业内部产生内在的控制力量来。作为独立的企业，内部没有追求积累、发展，承担投资风险的内在机制，企业不可能长期稳定发展。这已为经验事实所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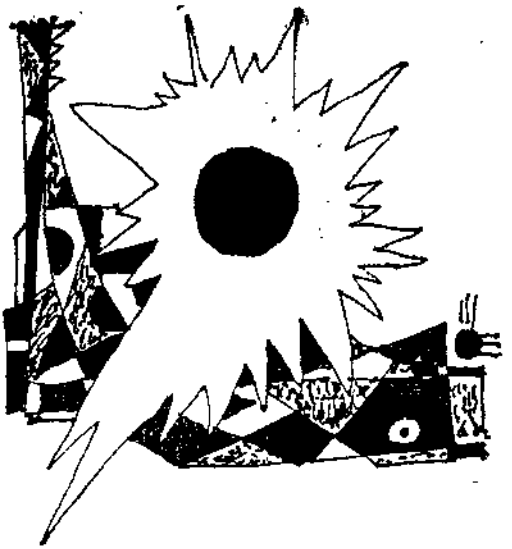
锡克承认这一点，但他因当时的历史条件及认识的局限，根本没有考虑国有制财产关系的改革问题，因而转到用宏观计划控制企业收入分配以追求供求平衡的方法上。然而事实是，这种外部控制，本身与独立企业的利益要求存在着矛盾，外部控制紧了，势必影响企业利益，也就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积极性，收入控制放松了，则收入分配很容易失控，导致消费与投资的扩张，影响经济平衡。这样宏观分配计划将势必不可免地处于控制与放活两难局面。

第二，锡克模式坚决地否定了指令性的生产、投资计划，认为它是阻碍企业独立经营，干扰市场供求平衡的根本原因。然而，他没有根本地认识到

这种指令性的生产、投资计划是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必然逻辑结论，而在不改变国有制财产关系时，引进市场机制取代指令性生产、投资计划，同样会带来新的矛盾与困难。在财产关系没有变革的前提下，企业既不承担使用财产的风险，又没有使用财产本身收入的权利，市场机制的反应就变得迟钝了，这对企业的生产决策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与创业活动中，没有财产关系基础，必然地出现任意性，违反市场供求结构平衡的合理性原则，各企业都竭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占据有利位置与市场份额，其必然的结果是出现投资结构性失调。从实践中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企业的“短期效应”，投资集中于技术低、收效快、周期短、规模小的项目，都想尽快见效，增加收入分配，而对于长期项目，基础工程，技术高、风险大的项目则没有兴趣，不求企业的长远稳定发展。另一个例子就是一哄而上，重复投资，重复建设。有利的项目大家一起上，造成结构失调，企业不怕投资亏损，不承担财产风险，无论是工人与管理人员，就是破产了，也一走了之。可见，在不考虑企业内部财产关系调整的情况下，放弃指令性生产、投资计划，而实行市场调节会带来许多不易解决的矛盾。

对于这个问题，锡克模式的一个亚种——尤里·考斯塔模式，倒是涉及了。现在移居西德的考斯塔，作为锡克的学生、同事，基本上接受了锡克模式的主要思想，他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实践的考察，也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案，主张引进市场机制，但在改革计划问题上，考斯塔模式与锡克模式出现了差异，考斯塔同意放弃逐级分解的指令性生产、投资计划，但他仍坚持要保持一个约束性的计划目标，这个目标可以通过间接控制手段，如财政税收、信贷的调节，以保证各个分散企业的行动与计划目标趋于一致。在此条件下，考斯塔认为计划的作用不仅限于收入分配，而且要涉及生产、投资及公共部门，尤其在投资问题上，他提出宏观控制不可完全放弃。一是中央宏观决策对总的投资方向与结构仍要进行调节，不可完全由利润率引导；二是一些重点工程项目的投资，仍要由计划机关进行直接决策，以保证社会效果。虽然考斯塔模式在改革计划体制的程度上没有锡克模式来得彻底，但它在国有制生产关系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情况下，提出的这些方案更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因而更具有过渡性特征。不过，考斯塔本人也承认，他的模式比之于锡克模式，更注重于近期的改革方向，而锡克模式则注重于未来的体制目标。

综上所述，锡克模式完整地绘出了一幅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蓝图，它与传统体制的根本差异，在于经济运转的指导力量不在于中央计划，而在于市场机制，宏观收入分配计划只是保证市场稳定运行的工具。他认为，这样的社会更人道，更民主，更赋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当然，由于当时理论、实践矛盾的焦点及认识上的局限，锡克模式对国有制财产关系的改革未予重视，给其模式的运行带来了困难，但这丝毫不损害这一理论模式的创造性意义，正是由于它的理论开拓，才使得后来者能站在坚实的基石上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第七章
改革实践的命运多舛和经济学说的群芳并起

不做尝试的危险和失败的危险是不相等的。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将损失巨大的利益，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损失的只是一点人类劳动。

——培根

7-1 几经波折

有必要把视野转向波兰。否则，我们就遗漏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画卷上的一片精彩画面。

波兰素以它旖旎迷人的风光和灿烂绚丽的文化，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波兰也以它倍受蹂躏的历史和不屈不挠的抗争，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在今天，人们更为感兴趣的，恐怕已不是华沙的绿荫，肖邦的旋律，密茨凯维支的诗歌和抗击沙俄的胄甲，而是它引人入胜的社会主义经济运

行学说和几经波折的改革实践。

作为苏联的毗邻和德国的友邦，波兰今天的三十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国土，是苏联与德国在战后重新划定的。随之而来的是历史赠予波兰人的另一件礼物，那就是和匈牙利一样，波兰在苏联的帮助下，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并建立了中央集中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

经过二次大战浩劫的波兰，有六百万人丧生，75%的工厂和三分之一的农田毁于战火，经济损失高达196亿美元，约相当于战前全国财富的38%。借助于苏联模式能够迅速集中财力和物力的优势，以及人民从法西斯铁蹄下挣脱后迸发出来的生活热情，波兰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社会主义经济成份迅速扩张。在此基础上，1950年起的六年计划，开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工业化进程。目标是雄心勃勃、鼓舞人心的：农业年均增长率要达到7%，工业则为17%，人民生活水平也要以每年6%的速率提高。

然而，在似乎生机盎然的经济背后，已潜伏着危机。前面分析过的苏联式传统体制的弊病，同样也传染给了波兰；尽管六年中作过经济目标和政策的调整，使工业增长达到了预期目标，但国民收入增长，农业发展和生活改善的预言却都没有兑现。波

兰在初步完成工业化的同时，社会与经济生活中的矛盾也在不断滋生。

1956年，苏联的“解冻”春风吹进了波兰。它导致波兰改革力量的活跃，同时也逐步暴露了官僚主义严重的波兰党政领导集团与改革派及人民之间的尖锐对立。终于，在6月28日的波兹南，发生了工人与军警武装冲突的流血事件。

这一事件既是矛盾激化的结果，又是解决矛盾的开端，它成为波兰第一次改革的前奏曲。同年十月，哥穆尔卡重新回到了党的领导岗位。他曾在1946年因反对沿袭苏联模式，主张“走适合波兰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①而被投进监狱。在结束了屈辱和磨难之后，哥穆尔卡顺应了“解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改革呼声，开始以改革来探寻波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使波兰成为继南斯拉夫之后，第二个企图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7年至1958年，波兰对原有经济体制作了若干尝试性的改革：相继撤销一些部和中央局，将部分领导权下放到地方；扩大企业自主权，指令性指标由几十项减至四项；建立工厂基金（相当于工资

① 哥穆尔卡：《在华沙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946年11月30日），〔波〕《新路》1947年第1期。

基金的2.5%，或超额利润的50%）用于奖励工人或职工福利；颁布了建立工人委员会法令，让职工参加管理。等等。

但是，由于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党内和社会上反改革力量未被削弱，改革派施展不了身手，难于争取到群众。结果，这些初步的变革并没有真正全面贯彻。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苏南缓和陷于僵局后，反改革力量增强，改革终于在1958年开始停顿，某些方面还走了回头路。

六十年代中期，苏联、东欧的改革进入高潮。面在波兰，由于第一次改革夭折，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与日益发展的生产力的矛盾，群众改善生活的要求和高积累、高速度战略的矛盾，人民民主的要求和官僚主义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内外的夹攻，使哥穆尔卡布署了第二次改革。他的具体措施有：进一步减少中央的指令性指标，突出盈利指标的作用；建立自负盈亏的联合公司来领导一组同类企业，公司对中央机构负责，有权调动所属企业资金，改变其年度计划，并有权直接与国外市场联系；国家投资拨款改成银行贷款，收取固定资产使用费；加强计划科学性（如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等）；重视使用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

遗憾的是，这次改革和第一次改革一样，由于

同样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致使改革停停走走，时进时退，不时被各种阻力干扰。经济和社会中的矛盾没有得到缓解，最终导致了1970年12月工人为反对物价调整与政府发生冲突的流血事件，哥穆尔卡被迫下台。

在乱世之年接替哥穆尔卡的是爱德华·盖莱克。他从"十二月事件"中汲取了教训，正确地提出了要把维护劳动者利益，经常与工人阶级保持联系作为工作中心的主张，但是，他却没有找到实施自己主张的正确方法，而是不顾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发动了以"高速发展战略"为先导的第三节改革。

"高速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外资来弥补资金不足，改变国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实现"第二次工业化"，然后靠新形成的生产能力生产商品出口换汇来偿还外债，并实现"高工资，高福利"政策，满足人民改善生活的要求。体制改革，则只是实现这一发展战略的手段。1973年1月，波兰开始推行"新经济财政体制"。在原有联合公司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组织规模，把各个企业"按完整的工业循环周期"组建成经济性大型联合公司，直属中央领导。中央当局的行政指令缩减，主要以"系数"来调节企业活动。例如，在收入分配方面，不再规定工资基金限额和就业限额，

主要通过规定系数“R”来调节工资增长速度，使企业工资基金随“新增净产值”的增长而增多。其计算公式为 $F_1=F_0\left[1+R\left(\frac{PD_1-PD_0}{PD_0}\right)\right]$（下标1和0表示本年度和上年度；F＝工资基金；PD＝净产值，R＝系数，且$0<R<1$）。收入分配方面的系数管理还包括给干部的奖金，其数额也是按照一个类似的系数“N”从利润中提取的。此外，大公司在投资、制定物价方面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既然体制改革只是服务于发展战略，面不是为解决波兰经济中的根本矛盾，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传统体制。这样，第三次的改革，实质上只不过把部份行政管理权从中央下放给大公司，企业仍然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没有独立的权利和利益，经济发展目标受制于长官偏好的问题依然如故。结果，经济生活中的积弊与日俱增，而错误的发展战略导致波兰经济在一度繁荣之后，益发走上不可收拾的普遍退缩之路。

本来，传统体制中就缺乏微观积累机制，高福利、高工资正好迎合了个人收入增长的欲望，致使工资增长超过生产增长，消费基金膨胀。1971年至1975年，波兰货币工资总额增长了60%以上①。与

① Nove · Alec

此同时，高速发展使投资集中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缓慢，消费品严重短缺，人民有钱买不到东西，不满情绪增长。政府又只好在不变动消费品价格的前提下，以价格补贴来刺激农业生产，财政负担日益沉重。

另一方面，消费基金膨胀导致投资资金奇缺，只能依靠大量举债，来维持高速发展要求的巨额投资（1971年至1975年，投资额增长130%）①。可是，由于体制未变，投资效率很低，以新形成生产力提供产品换汇还债又达不到预期效果，而举债额本身又超过了“安全线”（一般还本付息不宜超过外汇收入25%，波兰1975年就超过此线。1979年和1980年，全部外汇收入都必须用以还债），这势必导致外汇收支不平衡，整个经济陷入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陷阱。

到七十年代后期，总供求和供求结构失衡越来越严重，波兰政府只得最后使用调整物价这一招。可是，群众十多年来已习惯于收入不断上升，并因此形成了工资和物价不取决于客观经济因素，而取决于官方意志这样一种观念，涨价也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而这时的波兰政府，不是实行民主，向群众承认决策错误和说明困难真相，而是简单地粉饰

① Nove · Alec]

太平，堵塞言路，压制民主，这就更是火上加油；再加上政治、宗教上的政策失误，群众与政府对立的情绪终于在经过数次小摩擦后，酿成了1980年以“团结工会”为首的工人与政府的巨大冲突。

这场冲突使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波兰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但是，这一昂贵的代价也不是白付的，它既教育了波兰人民，也教育了波兰执政党和政府，那就是，只有彻底的改革，才是波兰的出路。波兰党和政府终于在1980年秋组建了经济改革委员会，着手进行第四次改革的准备工作。

吸取了第三次改革先天不足的教训，从卡尼亚接任盖莱克开始，到现任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执政近五年，为改革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先是制定改革方案并广为宣传，同时培训干部，逐步实施改革方案，最后才进入全面改革。1981年9月，经过反复讨论，多方征求意见，初步确定了改革方案，其要点是：（1）实行党政分离、政企分离、中央计划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体制，取消对企业的一切指令性计划指标，中央计划以经济发展和宏观调节为主，并主要运用经济杠杆来保证计划实施。（2）给予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平等发展的权利。（3）对企业实行自主、自治和自负盈亏的“三自”原则。联合公司被取消，企业可以自主决

定一切经营活动，如确定用工人数和收入分配形式，允许企业自行确定产品价格，决定产品品种、数量以及更新或扩大再生产，企业自负盈亏，利润除上交比例税收外（60%），余下的由企业自行支配，用于奖励、福利或发展生产。企业长期亏损，则必须倒闭整顿。企业内部实行职工自治，以工人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保证工人参与管理，以加强工人阶级对经济活动的责任感，发挥他们的监督作用。改革方案还根据上述要点考虑了配套的调节机制的改革。例如调整价格相对水平，改固定定价制度为含有官定、调节、合同、自由四种定价方式的混合定价制度；根据公平原则和刺激职能的要求改革了工资制度，一方面把工资基金增长与企业纯产值或利润挂起钩来，另一方面规定工资的上下限，并征收工资税和“职工鼓励基金”付费，从宏观上控制收入增长；银行与财政分家，对货币发行量承担责任，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形成的固定资产要按净值付息；税收制度也根据调整收入、合理负担经济危机后果和调节供求的原则作了改动；在外贸领域中，是在重新强调国家统一对外的前提下，采取了工贸一体化和鼓励出口等许多新政策和措施。

希望终于看到了！波兰在1982年实施改革方案

后，经济从危机的“谷底”开始回升。1983年国民收入比1982年增长4.5%，是连续四年下降后的第一次上升；同时，工业生产增长5%，劳动生产率增长6%，农业喜获丰收。外贸增长率则高达11.1%，从而成为几年来的第一次顺差，市场状况也有好转。1984年，国民收入又比上年增长3.5%，农业再获丰收，外贸又出现顺差。经济进一步好转。改革的实践与成效锻炼了干部，也教育了群众，拥护改革的人越来越多。

当然，很难预测第四次改革的发展前景，因为这艘船本来就是在“战时状态”的惊涛骇浪之中驶出的，前进的航道上还有许多险滩暗礁：一是经济虽然复苏，但离稳定平稳发展的要求还相距甚远，西方的“经济制裁”和国际市场的不利影响还比较大；二是反对改革的力量尚能形成威胁；三是这几年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尚未完全形成；四是改革的理论基础还不够坚实，尤其是对计划与市场调节在微观层次上的衔接，对现行改革方案实施后会出现的新问题缺乏研究；五是经济生活中旧体制的惯性仍在起作用。波兰的改革之船能否绕过这些险滩暗礁，现在尚难定论。不过，即使还有更多次迂回曲折，也不能阻挡它最终驶向光明的彼

岸。所以，重要的是怎样从已有的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使这些以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教育波兰人民，也教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以避免在今后的改革中少走弯路，不再翻船。

那么，我们能够得到哪些经验教训呢？

就波兰四次改革的社会与经济条件而言，应该说一次劣于一次。第四次改革则是在最严重的危机中开始的。如果按照通行的“改革时机论”——应选择在经济平衡、资源充裕的时期开始改革——波兰根本没有第四次改革的条件，但实践的结果，至少就目前而言，它却是最有成效的。这一成果的奥秘何在？它与前面几次改革的失败比较，确能给我们不少启迪。

首先，是波兰人，尤其是领导阶层，对改革的必要性有了比以往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有了破釜沉舟、力求从改革中寻求生路的决心。有了这种决心，才会对改革作出长期部署，并把它当作经济工作中心，而不是服从其他目的的工具。有了这种决心，改革就不再是小修小补，而是对旧体制动大手术。而正因为如此，改革才能起到缓和经济矛盾，促进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的作用。

其次，波兰以往的改革是在缺乏政治与经济民主，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的前提下进行的。

广大群众不理解改革，并因为对官僚主义和政治不民主的不满而把改革视为长官意志。党和政府领导人采取提高收入来平息众怒的错误方法，则更使群众在经济要求无法满足时，一併发泄愤懑，最终使改革受阻，政治危机爆发。然而，在最近的这次改革中，虽然准备阶段不长，但注意发扬民主，在思想和组织方面作了许多工作。改革方案是在五百多名各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共同工作下起草的。草案公之于众后，又在议会、群众组织、知识界和报刊上展开了广泛讨论，征求意见，进行民意测验，特别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工资、物价、劳保等问题，更是与工会反复商讨。在进行了六个月的修改补充后，改革方案才正式确定，并在实施中边听取意见边修正。波兰还吸收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参政，目前八位副总理中，有三名是非工人统一党人士。此外，波兰政府一方面动用一切舆论工具宣传改革，一方面进行干部培训。1983年的春季考核，有85%以上的干部及格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改革以来几次调高了物价，却都基本上能取得人民谅解。1981年3月的民意测验表明还有75%的人反对价格改革，1982年1月这一比重下降为15%。干部队伍中反改革势力也在逐步削弱。

1984年下半年开始，波兰党和政府更是直接与

工人磋商重大经济问题。由于磋商过程就是工人参加决策的过程，这就同时为实施改革奠定了基础。这一“民主模式”的产生，有助于减少改革带来的社会摩擦，增强经济振荡的社会承受力。因此，它不仅对波兰这样一个天主教源远流长，人民有着传统的民主素质，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强烈的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样也值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借鉴。

再次，波兰改革的曲折说明，如果经济还没有转向由市场引导产业结构变动和增长，政府能否根据客观比例来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具有重大意义。盖莱克的苦果，根子就在于无视波兰国情和客观规律，制定了错误的“高速度、高工资、高福利”发展战略，采取了畸形的偏重重工业的产业政策。

最后，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波兰经济与政治的动荡，和理论家不能真正参与中央决策有极大关系。事实上，每一次改革缺乏彻底的比较全面的方案，缺乏充分的思想动员，缺乏百折不挠的决心，缺乏灵活多变的手段，都不仅仅与官僚主义作风盛行相关。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领导者没有从理论上真正认识波兰社会的矛盾，没有从理论上把握社会和经济运行的规律。波兰不是没有优秀的理论家和

理论，而是领导者们忽视了自己民族中的这些精华人物，无视他们创造的宝贵财富，只是在形式上而没有在实际上让他们参与决策，结果贻误了整个民族的大事。这真是一出发人深省的悲剧。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我们必须吸取波兰的教训，在自己国家的改革进程中，加强理论探索，尊重理论工作者的劳动，使人类一切精神财富都能服务于改革。这当中，当然也应该包括对引人注目的波兰经济学说的研究和借鉴。

波兰的经济学家究竟为自己的民族和世界贡献了一些什么样的精神财富呢？

7-2 波兰的幸运—三位经济学家

英国经济学家亚历克·诺夫曾以极其羡慕的口气写道，波兰极其幸运地拥有三位杰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兰格、卡莱茨基和利平斯基①。而事实上，诺夫只是提到了波兰经济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改革时期的波兰经济学界是群芳并起，人材济济。除了上述三人之外，弗·布鲁斯，布·明兹及

① 亚历克·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伦敦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1983年英文版，第146页。

费席尔等人，都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有很深的造诣。

兰格，这位三十年代勇敢捍卫过社会主义的斗士，于1945年夏回到祖国，并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和国务委员，担任过计划、预算和财政委员会主席及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由于实际上影响不了决策，兰格没有显赫的政绩，但他在学术上的发展却不减当年。在祖国的土地上，他写就了《经济计量学导论》、《最优决策》、《再生产和积累理论》、《整体与局部—系统行为通论》、《经济控制论导论》、《政治经济学》、《统计学理论》等著作与论文。细细分析这些涉猎面很广的著作，不难发现，兰格已不象早期那样，纯粹从理论角度来构造社会主义资源配置体制，而是更多地从他生活的现实——已建立苏联模式的波兰——出发来研究问题。因此，除了讨论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外，他还集中探讨数学工具怎样为计划服务，如何正确确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如何改革现实体制等。早期对一般均衡理论及福利经济学的偏好，现在已附属于上述几个方面的探讨。

那么，兰格现在又是怎样从波兰实际出发，思考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问题的呢？

兰格肯定苏联模式有其产生的理由，各国的模

仿也有其原因，那就是：（1）国防需要和集中资源解决落后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需要；（2）工业化和农业迅速现代化的“外加任务”的需要；（3）缺乏有经验和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因而只能由中央机构少数人来作决策；（4）经济结构简单甚至原始，中央代庖一切的难度不高。

但是，兰格认为苏联模式作为“官僚集权主义”方法，只是“借助于战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也被“资本主义国家用于其他目的”。所以，它不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永久性办法”，而只是过渡时期的产物①。如果在社会生产日益庞大，投入产出关系日益复杂，资源稀缺要求经济增长从粗放转向集约，工人阶级增强了参与管理的能力和自觉性的情况下，再不顾国情因循守旧，那只能酿成种种恶果：（1）经济中各种比例失调，尤其是投资膨胀导致过度需求，形成卖方市场，而这又使计划陷入偏好投资的恶性循环；（2）计划失误，尤其是由于中央机构反应的时滞，往往在问题被发现和解决之前，后果已不可逆转；（3）企业缺乏自主权，事无巨细要经中央批准，

① 兰格《关于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若干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87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问题》上书第101页。

得到许可后则已事过境迁，因此不能有效调节供求和进行创新；（4）缺乏调动企业与个人积极性的有效手段；（5）工人难以影响决策，经济生活官僚化倾向严重，因而存在一种“新式，‘异化’的危险”。①

怎样才能铲除这些恶果呢？兰格自有主张。

在充分肯定哥穆尔卡关于建设有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兰格首先要求纠正以往的发展战略。他认为，波兰既没有形成苏联式自给自足经济的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也没有这样做的外部压力，因为波兰参与国际分工的条件比斯大林模式建立时期优越得多。因此，波兰应该参加国际分工体系，重视技术革命，把经济从耗费资源的粗放型转向提高效益的集约型，并重视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而不应该盲目模仿苏联。

兰格更力主通过改革建立一个新的经济运行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则是：“从过度集中后退”，②在多种所有制成份并存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的经济体制。兰格认为，集中计划的主题应当是：国民收入在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分配；

① 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215页，第29页。

② 兰格：《关于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若干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19页。

与之有关的经济增长率，工资基金和居民其他收入；为满足需要而生产的商品价值和流通的通货数量；主要的投资。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基本商品的生产，也要由国家计划决定，其他商品生产，则由企业自己决定。企业之间的关系，以直接合同制度为基础，以取代自上而下的物资分配制度。企业内部实行自治。利润则应当变成判断企业是否完成它的社会经济任务的基本标准，并且要把利润与企业物质利益挂起钩来。兰格还强调计划机构必须用经济工具取代行政命令，引导而不是强制企业和消费者服从计划。而经济工具中，价格居首要位置。除了少数存在完全竞争条件的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外，其他多数商品的价格必须分层次由各级政府决定。

很显然，新的兰格模式留有三十年代“试错”模式的痕迹，但是，它又更多地顾及了波兰的现实，从而对“试错”模式做了重大补充和修正。那就是，兰格看到了市场机制“不提供充分的基础来求解增长和发展问题”①，所以，他强调要把“长期投资从市场机制”中取出来，强调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重要性。

① 兰格：《计算机和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185—186页。

由此完全可以说，对经济决策分层次归属的思想，实际上并不是兰格的同胞布鲁斯的首创，在兰格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影子。

与兰格并驾齐驱的另一位卓越学者，是以研究经济增长见长的米哈依·卡莱茨基。这位攻读工程技术、又因贫困辍学的退伍兵，由于谋生偶尔闯进经济学的殿堂，不想却成为摘下皇冠上明珠的佼佼者。早在三十年代，他按照马克思、卢森堡、杜冈的思路，探寻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和长期发展的机制，形成了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理论。1933年写就的《试论商业周期理论》，标志着他实际上比凯恩斯早三年，就创造了一个包括凯恩斯学说所有重要内容的经济学体系。1954年12月，卡莱茨基辞去联合国的职务回到波兰，1956年获教授职称，57年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并主持了1961年至1975年的15年远景规划制定工作。在实践的同时，卡莱茨基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等书，从宏观的动态的角度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

卡莱茨基在阐明了社会主义国民收入计量的一般原则后，首先绘出国民收入实际增长率决定模型：

$$\gamma = \frac{1}{k}i - \frac{m}{k}(a-\mu) \qquad (1)$$

$$(k = m + \mu)$$

γ = 国民收入增长率；

m = 投资系数，即一定生产性投资能带来的国民收入增长的比例；

a = 折旧系数，即设备损耗引起生产能力缩减而产生的国民收入减少的比例；

μ = 改进系数，在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通过改善生产能力的利用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长比例；

u = 存货平均周转期，即存货增加与国民收入增量的比例；

i = 投资率，即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比率。

在假定m、a、μ、u不变的前提下，实际增长率唯一地取决于投资率i，即对（1）式中的i微分，得到

$$\Delta\gamma = \frac{1}{k}\Delta i \qquad (2)$$

卡莱茨基继尔给出一个社会的自然增长率决定模型：

$$\gamma = \alpha + \beta + \alpha\beta \qquad (3)$$

α = 劳动生产率，取决于技术进步等；β = 劳动力自然增长率，取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等。

（3）式规定了社会潜在的最大增长率。因此，（1）式决定的实际增长率，不可能突破技术进步和人口自然增长所规定的界限。并且，由于[illegible]

制和社会因素的限制，实际增长率往往达不到潜在的最大增长率。

首先是积累与消费冲突的限制。卡莱茨基指出，积累率i的提高一方面带来长期增长率提高，另一方面导致短期消费率c下降，如果c下降超过一定限度，会引起一系列社会矛盾，并导致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其次是劳动力供给的限制。在技术进步中性的假定下，如果存在劳动力储备，使实际就业率c高于劳动力自然增长率β，那么，只要投资率i增长足以维持既定的劳动生产率α，实际增长率可进一步提高而超过（3）式的规定，但是，劳动力储备总会竭尽，增长率最终也就要回到(3)式规定的幅度上来。再次是国际贸易的限制，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是开放的，自然供给有限的资源，可通过出口去交换，但这一交换会遇到国内生产能力和国外市场的限制。这就限制了经济增长。

当然，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突破上述的限制，而这往往又要求增加投资，因而又会碰到积累与消费冲突的限制。因此，必须在考虑各种限制的前提下，来求解可能达到的最大国民收入增长率和相应的积累率。求解的准则是：在劳动力供求和进出口贸易平衡的条件下，积累率变动引起的增长率增加的长期利益，和积累率变

动引起的消费率下降的短期损失之间相平衡。即：

短期消费率的净损失为 $\Delta e = \frac{\Delta i}{1-i} w(i)$ （4）

（$w(i)$ = 抵制系数，表示反对削减短期消费的倾向 $\overline{W}$ 越高，表明人们感到增加同量积累带来的消费损失越严重。i增长过快，或时间过长，均会使 $w(i)$ 上升）

积累率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增长则为（2）式所示，$\Delta\gamma = \frac{1}{k}\Delta i$

平衡点既（2）=（4） $\Delta\gamma = \frac{1}{k}\Delta i = \frac{w(i)}{1-i}$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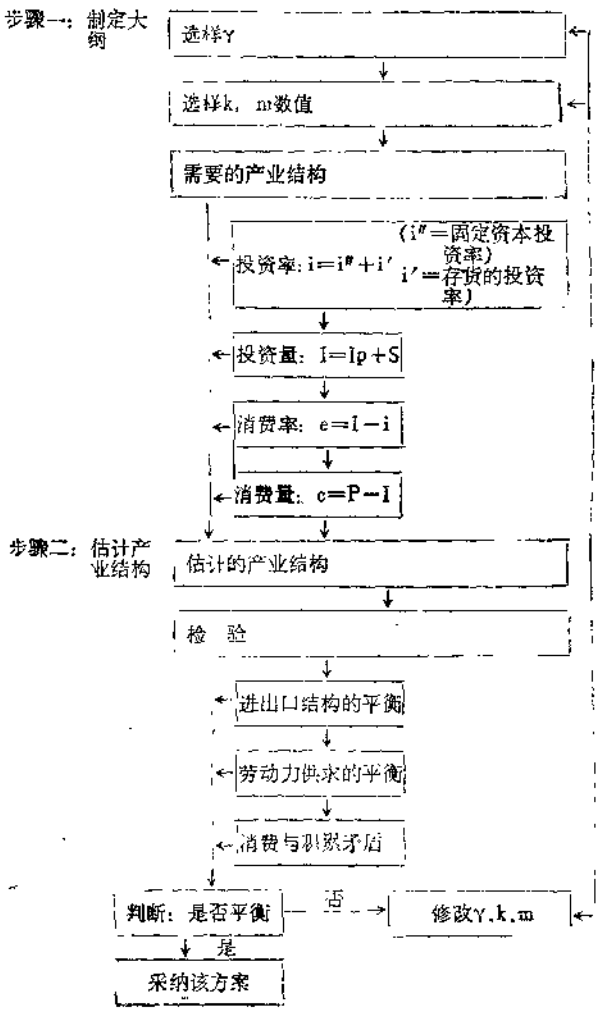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卡莱茨基还指出：合理的增长率和积累率需要合理的增长结构与投资结构相依托。如果投资效率稳定，总增长率决定于积累率，后者又依存于投资品生产部门的增长；投资品生产增长又取决于投资的部门分配比例和资源限制。如果投资品增长小于积累率提高后对投资品需求的增加，则必然导致投资品短缺。所以，产业结构也是积累率、乃至实际的国民收入增长率的限制条件。

根据上述理论，卡莱茨基认为，不考虑上述限制，盲目追求高速增长，必然会使消费率过低，引起人民不满，必然会遇到技术、组织和资源的限

制，必然会使产业结构失衡，并导致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膨胀和总供求失衡。因此，卡莱茨基在主持制订波兰15年长期发展规划时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方法来进行的，其要点可以下列框图来表示：

不言而喻，卡莱茨基偏重于从技术的角度，用规范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因此，他没有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实际的积累率与投资分配比例是怎样决定的，也没有涉及财政、银行、政府各级管理部门与企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而仅仅把投资膨胀、结构失衡的原因归结为中央政府不顾客观限制盲目追求高速增长，归结为技术上的失误，体制方面的现实便因此被忽略了，这当然是一个缺陷。

但是，这决不是说卡莱茨基的理论没有现实意义。且不说卡莱茨基从技术角度揭示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比哈罗德等人的更细致和全面，并且，这一模型的建立，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以计划管理为出发点的。因此，（1）它以确定适度的国民收入实际增长率为目标出数，而不象哈罗德模型中把实际增长率也当成内生变量；（2）引进了不依赖于有效需求的独立变量——改进系数μ，这是社会主义特殊的经济现象（资本主义经济中，μ依赖于社会有效需求的大小）；（3）把投资与消费的


步骤一：制定大纲
选择Y
选择k，m数值
需要的产业结构
投资率：i=i″+i′
（i″=固定资本投资率）
i′=存货的投资率）
投资量：I=Ip+S
消费率：e=1−i
消费量：c=P−I
步骤二：估计产业结构
估计的产业结构
检　验
进出口结构的平衡
劳动力供求的平衡
消费与积累矛盾
判断：是否平衡
否
修改Y，k，m
是
采纳该方案

关系作为增长的重要枢纽，并特别强调 w(i)——抵制系数的作用，这也显然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主要矛盾；（4）把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联系起来，作了详尽分析，说明社会主义投资的非市场导向使投资分配与产业结构变动显得更为重要。而这一切，决定了卡莱茨基理论不仅从技术角度，而且从社会关系角度，对控制与协调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的动态增长运动，有着实用价值。这不仅在传统体制下是如此，在改革之后的新体制下亦是如此。因为随着改革使企业自主权日益扩大，宏观经济协调不仅不能削弱，而且日趋重要。协调的方式要改变，协调的内容却同样是上述宏观的动态的比例关系。只要人类生产的一般技术关系不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规定性不变，卡莱茨基的理论就有生命力。遗憾的是，波兰政府长期内把在卡莱茨基主持下作出的发展规划视为“保守主义”，一度推行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增长缓慢，社会矛盾加剧。也就是说，他们是从反面为卡莱茨基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明材料。

亚历克·诺夫提到的利平斯基，是卡莱茨基的老师，波兰德高望重的学术界老前辈。他是改革的热情支持者。直到九十高龄，仍一再撰文陈述改革的必要性，因而为他的晚生们树立了极好的榜

样。

波兰经济学的另一分支，是以明兹为代表的正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派。与兰格、卡莱茨基不同，他们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不大，对苏联人的学说却颇有研究。例如，明兹在他的代表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使用的范畴，就大部分为苏联教科书所有。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学说没有独到之处。波兰的学术环境和改革现实，使明兹派的学说更贴近现实，从而表现出与苏联人的差别。其一，除了与苏联教科书一样，把生产关系列为研究对象外，明兹还把经济效益列为对象，并由此讨论了许多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其二，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生产资料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的矛盾。不过，认为国家是直接占有，企业是间接占有，这点又与南斯拉夫不同。其三，承认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性，承认劳动者的被雇佣地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与企业的生产目的存在矛盾等。根据这些认识，明兹派也抨击传统模式而主张改革。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改革主张基本接近苏联的“局部完善派”，与波兰前几次改革的方针比较吻合。这使明兹派在理论界取得较高地位，他们的学说也因此具有较大影响。

除了老一辈理论家外，波兰经济学界也不乏新

人。他们当中有因对波兰和东欧经济的实际运行作了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和描述而闻名于学术界的泽林斯基和格兰尼克，也有因设计了分权模式而声名四扬的弗·布鲁斯。由于后者的学说自成一派，并影响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所以，有必要向读者作专门的介绍。

7-3 布鲁斯模式

弗·布鲁斯曾在兰格和卡莱茨基任教的华沙计划统计大学当过学生。五十年代哥穆尔卡发动第一次改革时，布鲁斯年方三十五岁。他在担任华沙大学教授的同时，先后身居计划委员会经济调查司司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要职，成为兰格和卡莱茨基的年青的合作者。1972年，布鲁斯卸职离开波兰，先后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等学校任教。

布鲁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思想，主要发表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社会主义所有制政治制度》等书。概括起来，包括以下三部份内容：

1. 经济模式划分理论

布鲁斯认为，“经济模式”与“社会经济制

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社会经济制度反映生产关系，决定某一经济的基本运行原则，而经济模式只是显示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或运行原则。在同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下，具体运行机制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里大有选择不同经济模式的余地。例如，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制，共同劳动和按劳分配，可是，这并不排斥在公有制的组织形式、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的范围、劳动者参加管理的形式和程度、物质刺激的方式等等方面的差别。所以，为了解决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的框架内采取不同类型的模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是现实存在。

那么，应当怎样来区别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模式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布鲁斯的标准是不同层次经济活动决策权的归属。

按布鲁斯的观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决策权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次是宏观经济活动的决策权，涉及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如：经济的增长速度；国民收入在积累和消费之间分配的比例；积累基金（投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之间分配的比例；消费基金在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分配的比例；重要投资项目的取舍；消费基金的分配原则等

等。

第二层次是企业经常性的经济活动决策，简称企业决策。这一层次的决策涉及的是国民经济的局部活动，包括：产出的规模和结构，即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投入的规模和结构，如用什么生产资料和技术，用多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进行生产；销售的方向和供应的来源；小型投资的决策，劳动报酬的具体支付形式，等等。

第三层是家庭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决策，简称个人决策。它的基本内容是两项：一是在收入既定条件下的个人收入支出决策，即选择多少用于消费和怎样消费；二是职业和工作地点的选择。

根据以上三个层次经济活动决策权归属情况的不同，布鲁斯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模式划分为四种：

①完全集中模式。这是一种完全没有市场因素的经济模式，三个层次的经济活动决策权都由中央集中掌握。布鲁斯认为，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形式。

②集权模式。这是一种第一层次的宏观活动和第二层次的企业活动集中由中央来决策，只有第三层次经济活动才是由个人或家庭自己来决定的模式。布鲁斯指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苏联在三十

年代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模式就是其典型代表，后来为东欧国家仿效。就是进入改革之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还是未脱出这一模式的基本框架。

③分权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不仅第三层次的个人活动决策分散化，第二层次的企业活动决策权也分散由企业自己掌握，只有第一层次的宏观决策权仍由中央握有。布鲁斯又把它叫做“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并把改革后的匈牙利经济运行归入这一模式。

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是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理论概括，其特征是三个层次的经济活动决策权全部分散由个人或企业来掌握。

2．各种模式的比较和目标模式的选择

在以上四种模式中，那一种模式最有利于资源配置呢？布鲁斯是在比较中选择自己认为比较理想的模式的。

他首先否决第一种模式。理由是，第三层次经济活动——职业与消费选择，按其经济性质，只适用于由个人或家庭自行决策，除了战争等非常时期例外。

对于另一极端的第四种模式，布鲁斯也投了反对票。他虽然对于这一模式有利于发挥企业的积极

性，争取微观组织的高效率的优点给予肯定，但是，他认为这一模式的弊病盖过了它的优点。首先，在这种模式下运行的经济不可能有高积累率，却有实现高消费倾向的现实条件。这是因为收入用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不是由社会，而是由企业决定的，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把企业劳动者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当作主要目标，于是，收入更多地流到个人的今日消费的口袋里，而不是投入共同的积累。其次，总供求失衡。因为，在这一模式中，在消费基金膨胀的同时，企业为进一步增加收入而投资的愿望并不曾泯灭，借款投资成为惯用手段，这就导致投资也膨胀。结果，社会对投资品和消费品的购买力都大大超过可供商品的总量，短缺或物价飞涨也就是必然的了。南斯拉夫通货膨胀率特别高，1970—1980年，物价上涨了259%，而同期匈牙利只上涨31%，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再次，这一模式的失业率高。企业受增加每个或员净收入目标的驱使，会比资本主义企业更倾向少雇工人；在考虑投资时，也必倾向采取更节省劳动力的方案。在劳动力充裕的国家里，势必造成大量劳动力闲置。南斯拉夫的失业率高固然有其它原因，但上述体制方面的作用也是不能排斥的。这种模式的最后一个弊病是缺乏全面的协调机制。各个地区，各个企业都从自

己利益出发，根据市场信号扩张生产，结果必然出现重复建设和市场波动，在国际市场上的自我竞争和地区及企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也不可避免。

余下来可供选择的，只能是第二种集权模式和第三种分权模式。而这两种模式的宏观决策集中化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企业经常性活动决策权的归属上。为此，布鲁斯一再强调，选择的关键，是比较企业活动的决策权集中化好还是分散化好，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分权模式是一种较之集权模式有更多优点的模式。

照布鲁斯的说法，集权模式具有以下特点：①决策集中。企业象个小媳妇，日常的经营活动，都要由“婆婆”——计划机关集中决策，企业俯首贴耳地按婆婆的指令办事就行了；②等级森严。各级政府的计划形式是“金字塔”式的等级，下级计划由上级计划规定，上级计划分解为各个下级计划的指标，层层下达执行，不得僭越；③垂直联系。在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纵向信息运输，企业与企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横向联系只起补充作用；④货币失去原来意义。无论在经济核算和资源分配上都是实物形式占优势，货币不构成企业选择的基础，因而不再是在市场起作用的“积极的货币”。

集权模式有自己的长处，那就是能够保证在经济发展方向上的高度选择性，即把资源集中用于国家认为必须优先发展的部门。这对于经济结构的迅速调整，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发展目标的实现等，确实收效神速。但是，这一模式所取得的成就，是以巨大的资源投入为代价的，是不可能长寿的，原因在于它的效率很低。

布鲁斯继尔分析集权模式效率低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有这样两条。一条是“棘轮原理”，另一条是指标体系的矛盾。就前者而言，计划的棘轮使生产任务只能增不能减，且今年增得越多，明年指标越高。企业不愿做被鞭打的“快牛”，总是低极生产能力，高极耗资。而计划机构则相反，往往脱离实际，往下压生产任务，卡物资指标，砍投资项目，这样，计划失误无法免除。就后者而言，既然企业活动由“婆婆”决策，“婆婆”就要订出一整套指标来控制“媳妇”。可实际上，指标之间存在矛盾，上级计划机关也不可能对每个指标都严加控制，其重点往往落在产量或总产值上，结果使企业忽视成本，疏漏提高质量，不愿进行创新，经济效益下降。

分权模式可以避免集权模式的上述缺点，这是布鲁斯的结论。他的理由在于，当企业经营活动的

决策由企业自己作出时，那就意味着：①国家不再给企业下达指令性的指标，企业独立地根据市场行情和自身利益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国家计划规定的目标对于企业只起指导性；②企业需要的生产资料在市场上自行采购，产品在市场上自主出售，而不再受制于国家物资部门和收购计划；③企业经营好坏的判断标准不再是计划指标，而是利润（在价格合理的前提下）。在这里，棘轮效应和指标体系的矛盾消失了，集权模式的低效率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

当然，在作出上述结论时，布鲁斯没有忘记，他偏爱的分权模式是不同于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因此，他还强调了分权模式的另一特征，那就是宏观决策仍由中央作出，宏观的实物平衡计划仍然保留，而不象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那样，把这一层的决策权也拱手让给企业。

现在问题来了：中央的宏观决策如何控制微观经济活动，使千千万万个企业的活动既独立自主，又不脱离中央决策的目标与范围呢？布鲁斯也承认，这是他的分权模式中最难的问题。他的解答是：间接控制。

首先，布鲁斯认为，宏观经济活动由国家决策，实际上就给企业以至个人活动规定了界限。例

如，重要的投资决策权是掌握在国家手里的，国家决策决定了那些部门得到多大规模的发展，从而也就决定了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企业只能在这一计划决定的结构中活动。如果国家投资建了钢厂，钢厂就只能生产各种钢，而不能生产消费品；反之建了鞋厂，该厂就只能生产鞋而不能生产投资品。宏观决策还决定个人经济活动的范围，例如国家规定了积累规模、各部门增长速度、企业生产方向，也就决定了工作岗位的多少和工作内容的划分，从而给出了就业选择的范围。同样，工资政策、收入政策也会对消费品构成发生影响。例如采取高收入政策，则使必需品之外的消费品的社会需要增加。

其次，布鲁斯认为，国家可以制定一些目标函数来控制企业经济活动。这些目标函数不同于集权模式下包罗万象的具体指标，而是牵牛鼻子的原则目标。例如，规定企业以争取最大总产量，或争取最大总利润等为目标。当然，在价格合理的条件下，总利润是最合适的目标函数。因为，如果要求企业产值最大，企业则会增加投入品，甚至尽量采用贵重原材料来增加总产值。如果要求净产值最大，企业固然会节约原材料，但不会考虑用工成本的节约。

再次，布鲁斯提出，国家必须用经济杠杆——

价格、工资、信贷、税收等，来调节企业的经济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指令性的硬性规定，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企业各行其事的自发性。例如价格，它不能由个别企业操纵，而必须一方面反映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另一方面反映社会的偏好。因此，国家必须对它的形成保持有效的影响，除了充分竞争的商品价格外。又比如，信贷上银根抽紧还是放松，利率提高还是降低，也是国家影响企业活动的重要工具，因而也不能由信贷机构自行其事。

因此，在布鲁斯看来，这种模式是完美的。它既保持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性，又利用市场机制，而利用市场机制不但不会削弱计划经济，而且会使之更完善。因为在这里，市场机制不是使生产与交换服从于自发过程的工具，而是使个别企业的活动适应于表现在计划中的整个社会偏好的工具。国家计划由此可以从一些繁琐的细节中摆脱出来，多多考虑长远大计。企业的积极性也能得到充分发挥。

3．最优模式的实现条件和运行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布鲁斯不是清谈家。他不愿使自己设想的模式成为空文，而希望它能得到实际应用，并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因此他对这一模式如何付诸实现的问

题，也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政治民主化。布鲁斯认为，从集权模式向分权模式转换，不仅是经济改革，而且是整个社会，尤其是政治的改革。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与政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从动态过程看，经济关系的变革更是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变化。布鲁斯还指出，正因为经济与政治交织，政治体制又是同所有制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资料国有化仅仅是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第一步，是克服劳动异化的开始，只有实现生产者完全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才能最终克服异化。因此，政治体制的变化必须是向民主化推进，向工人自治推进，才能使生产资料占有进一步社会化，使经济上的分权得以实现。

根据上述思想，布鲁斯提醒人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注意下面两个问题：一是改革必然会遇到官僚政治的既得利益的阻扰和反抗，对此万不能掉以轻心；二是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关心改革，投身改革。

居次的条件，是宏观经济均衡。布鲁斯指出，集权模式中宏观失衡，可以通过配给制强行维持经济运转。分权模式不容许这么做，因此，宏观平衡就显得更为重要。否则，市场机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垄断抬价，投机倒把等行为必然会出现。布鲁斯主张使需求稍微超过供给，造成一个有限的卖方

市场，从而可以更有力地刺激供给。但又不至于象资本主义那样出现生产力不能充分利用的局面。

最后，布鲁斯强调建立新模式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按他的说法，原则性是指改革不能只实行目标模式中的一部分原则，而放弃另一部分原则。因为它们作为一个模式的原则，具有内在的逻辑的联系。如果从不同模式中抽出一些不相干的要素拼凑在一起，往往比效率虽低但能连贯运行的模式更糟糕，这就好比用不配套的新零件拼成新车子，运转起来反而不如自成一体的旧车子一样。而正因为要讲原则性，布鲁斯又强调改革的配套，强调在设计好方案之后的一揽子行动。在他看来，零敲碎打不足以冲垮旧体制，却容易犯乱拼乱凑的错误。

当然，强调原则性不等于舍弃灵活性，布鲁斯懂得这一辩证法。因此，他同时又明智地提出，要允许改革在某一时期和某种条件下，在某些环节上对原则存在暂时的偏离，以防陷入事事追求完美的公式主义泥淖。

7-4 完美中的不完美

就系统性和完整性而言，布鲁斯的模式理论，可

以与兰格、锡克和南斯拉夫人的模式理论媲美。在引进市场机制方面，它们的总体思路也是一致的。然而，布鲁斯的目标模式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貌。

对于否定国家所有制具有社会所有制的某些特征的观点，布鲁斯是不赞成的。尽管他也呼吁反对官僚主义，主张政治民主和工人自治，他却不是国家反对派。他批评南斯拉夫由徒具形式的自治体之间的协议来决策某些宏观活动，或对企业收入分配的放任自流，结果造成了“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归结的那些恶果。他坚决主张应该由国家代表社会对经济进行有计划的调节。这就将他的目标模式与南斯拉夫人的自治模式区别开来了。

然而，如果说强调国家宏观的计划调控是布鲁斯目标模式的特点，那么，它与同样强调这一点的兰格和锡克模式的区别，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兰格那里，国家调控的目标是社会各类产品供求平衡。“试错”方法实际上是在模拟市场，以刺激企业调整产品的品种与产量，调整对生产要素的需求。这种计划调控的依据，是市场供求，是消费者偏好。而对经济的宏观比例的调控，兰格却没有多加讨论。因为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在三十年代初，人们对宏观比例的认识还极肤浅，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比例变动的特殊机制的认识，更是一片空

白。因此，兰格只是从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原则或福利经济学原则的角度，讨论了积累与消费的分配权的归属，而没有考察这一权力的不同归属是否会导致积累与消费的不同比例，这些比例会造成什么经济后果，以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和对策。此外，对兰格来讲，他的模式假定劳动者有选择职业自由，企业有雇工自由，这就足以借助劳动市场的作用，把工资限制在一定水平上。与此同时，价格的变动不仅是现有生产的调节器，也是扩大再生产的调节器。因此，就不必劳驾中央机构来操心工资总水平和投资方向问题。

在布鲁斯这里，情况却不同了。事隔多年，社会主义经济的消费饥渴和投资膨胀倾向已暴露无遗，投资失误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布鲁斯不能视而不见，而他又知道企业不会自觉抑制“双重饥渴”，或自觉根据社会需要选择投资方向。因此，他比兰格更加高明地主张，由国家来掌握宏观决策权，决策的内容是宏观经济比例和主要投资项目；决策的依据是社会的偏好，而不仅仅是消费者的偏好。这些显然与兰格模式是不相同的。

布鲁斯模式与锡克模式的差别，似乎不象与兰格模式的差别这样清楚。因为从整体上来说，它们都要求在宏观上进行计划控制，在微观上引进市场

调节机制。所不同的只有两点：其一，锡克只强调国家决策和控制消费、积累、投资等总量，以保证国民收入稳步增长。至于投资与消费基金具体使用，他主张原则上由企业与个人自行决定，只有基础设施、非盈利部门或特殊需要仍由国家掌握。布鲁斯则在锡克的宏观决策中，加进了主要投资方向这一内容。他的理由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卖方市场与垄断，市场自由价格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供求，并引导供求平衡。因此，足以左右国民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投资，必须由国家选择而不能由市场引导，否则必定引起混乱；其二，锡克模式的目标是尽快地过渡到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布鲁斯则强调国家应根据社会偏好参与价格确定，而不能让市场供求成为决定价格的唯一力量。

然而，细细分析一下上述不同点及其指导思想，我们却可从中发现两种模式之间的重大差别。

显然，锡克基本上是按西方经济学的思路来区别经济的宏观与微观界限的。他认为，宏观比例指总供给、总需求、总投资、总消费等经济活动总量之间的关系，微观比例是指需求或供给的具体结构之间的关系。两类比例性质不同，调控方法也不同。宏观比例是否平衡，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分配是否符合再生产规律；微观比例是否平衡，在商品

生产条件下，取决于市场机制能否正常起调节作用。资本主义危机是宏观失衡，根源在于私有制使国民收入分配不能符合再生产规律，而不在于存在市场调节。传统模式的弊端，则在于企图在微观领域中取消市场机制，来避免患资本主义的危机病，却不在宏观平衡上多花气力，结果宏观与微观两败俱伤。由此，锡克得出这样的结论：宏观比例应由社会统一决策，计划调节，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这一调节的基础；而微观比例则应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布鲁斯的出发点与锡克不同。他划分宏观与微观决策权，不象锡克那样以经济变量为标准，而是按中央应该集中决策和控制些什么这一主观判断来决定。他的判断是，市场具有迅速的信息反馈能力，可以解决中央计划因现代信息技术局限的决策困难，因此应该将市场机制引进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但是，市场又有缺陷——供求波动，以消费者偏好为调节依据而可能与社会偏好相悖，垄断与总供求失衡造成机制失灵等。对此，布鲁斯企图以宏观计划决策来抵补，因而，他把决定主要投资项目，把对价格的调控，列入中央宏观决策范围。这样，他的模型中的宏观调控，实质上就不限于总量，还包括供求结构这类微观比例。企业的自主

权，事实上也只限于在既定部门内调整产品品种与数量。

应该承认，布鲁斯试图以宏观决策来避免市场调节的失误，动机值得称道。如果考虑到改革中存在总供求失衡，价格体系不合理，要素与资金市场尚未建立或健全，商品市场透明度低，以致市场不能很好地调节投资这样的现实，布鲁斯模式比锡克模式似乎更有现实意义。但是，如果撇开改革时期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就布鲁斯想避免市场固有的弊病，就他本意是设计目标模式而言，这一结论就站不住脚了。

以投资为例。虽然布鲁斯承认，构造无缺陷模式是天方夜谭，应该避免模式内在基本原则的不统一，但是，他的上述主张恰恰犯了他自己提出的大忌。事实上，市场固有的缺陷，又是它发挥作用的机制。没有供求不平衡，就没有价格波动，从而也就没有资金流动和供求趋于平衡。因此，供求波动造成的损失，是供求平衡必付的代价。同样，以消费者偏好为调节依据，也恰恰是引导投资去符合需要的机制。布鲁斯以计划考虑社会偏好为由，强调中央决策投资优于市场引导，其暗含前提是社会偏好优于消费者偏好，中央计划必定受社会偏好制约。在现实中，由于社会条件与技术限制，这一前

提至少在目前尚无存在的必然性。相反，中央计划偏离真正的社会偏好，导致产业结构紊乱的例子，倒是层出不穷。因此，不付代价的投资调节机制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出生。问题的关键倒是，应该对市场调节或集中决策投资所付代价的大小作出评价，来决定投资决策权的归属，并在归属决定后，为减少代价创造条件。例如，把投资判给市场调节，那么，就应努力完善市场机制。反之则反是。

那么，又该怎样判别市场调节与集中决策投资的优劣呢？看来，仅仅以市场机制是否完善，或中央决策是否明智来推断其代价的大小，还不足以为标准。更重要的是，必须从投资决策归属是否与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相一致，来推断其代价的大小。布鲁斯想避免缺陷，结果疏漏了后一种推断，从而犯了他自己也讳忌的违反“原则性”的错误。

在布鲁斯模式中，一条基本原则是微观决策分散化。投资是扩大再生产，与企业当前生产密切相关，与具体的供求结构变动不可分割，因而，其方向的选择，应属微观决策范围而分散化。布鲁斯却主张将它集中，这就违背了基本原则。其结果，必然是资源配置的紊乱。即使假定中央决策无技术失误，经济损失也不可免。其一，按布鲁斯设想，企业掌握的非主要投资决策权，只限于在既定门类中

调整花色品种，企业现有的生产方向也不能转换，这意味着，一方面，现有各个生产门类只会扩张，不会收缩衰败，这显然有悖常理。另一方面，即使有一部门急需扩张，也只能坐等中央投资救援，其他部门即使需求饱和，资金富裕，也只好“见死不救”。这样，产业结构和供求变动仍然是僵硬的，市场的作用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二，布鲁斯没有看到，产品门类的划分不是永恒的，新产业往往从老产业中衍生出来，而衍生的起因又可能是品种的调整。这样，决策标准二重化的矛盾始终存在。企业调整品种的根据是市场价格，是消费者偏好与自身利益，而中央决策投资项目的依据是社会偏好。这两类根据之间存在矛盾，就会导致整个经济结构变动的紊乱。其三，由于认为投资决策集中就可万事大吉，布鲁斯疏漏了现有企业改换生产方向的问题，更没有考虑优胜劣汰和规模经济的要求，因而也就没有设计企业资金流动的机制，如破产制和企业集资方式等。市场机制的奖优惩劣作用，在这里也被抹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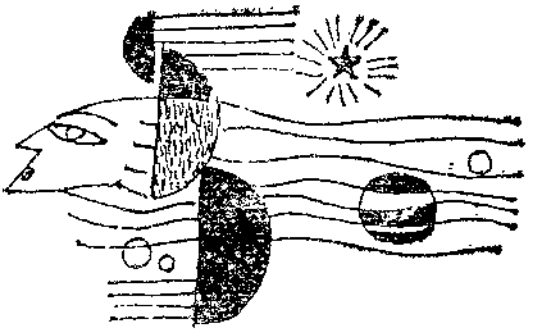
在价格问题上，布鲁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由于价格不仅涉及对投资的引导，还涉及现有生产的调节，决策标准二重化的矛盾就显得更为尖锐。在投资方面，二重标准分别引导企业资金和国家资

金，矛盾还只在于两类资金因决策标准不同而流向不同会导致经济结构不平衡，而不存在同一资金要服从二重标准的问题。而在价格上，矛盾却在于二重标准要在一起调节同一个企业的日常生产行为。中央对某一产品价格施以影响，就是以社会偏好为标准。这一社会偏好或与消费者偏好一致，或不一致。这样，不同产品的生产就受不同标准调节——或是反映消费者偏好的市场价格（社会偏好与消费者偏好一致时，由中央控制的价格也包括在这类价格中），或是受社会偏好制约的价格。而在这种双重调节下，受不同标准调节的不同产品，如果由一个企业生产，决策上的混乱不可避免；如果由不同企业生产，则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系统受干扰。

因此，不能轻视布鲁斯模式与锡克模式的上述区别。它至少提醒了我们：追求至善完美的模式本身就有缺陷。应该以现有条件下代价最小作为选择目标模式的标准。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与锡克模式相比，布鲁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分析，尚嫌着力不够，有失肤浅。这表现在他批评集权模式多着眼于技术困难和政治约束，构想目标模式则较少落笔于收入分配系统。这或许正是锡克所批评的波兰学派的通病，虽然比起兰格来，布鲁斯已大有进步。

把布鲁斯的模式理论与其他理论加以比较，指出其缺陷，绝不是想否定布鲁斯理论的现实意义，而只是为了深化理解。从总体上来说，布鲁斯的目标模式比苏联的“彻底改革派”模式要彻底和完整得多。它的基本框架接近锡克模式，虽有前面所说的弊病，但却比锡克模式更接近改革时期的现实，在当前经济理论的发展水平上，更易为人接受。因此，布鲁斯模式理论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巨大的。人们在匈牙利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在中国的理论探讨中，也会发现它的作用。



第八章
“可行的社会主义”
——比较研究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
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
——卡尔·马克思

8-1 来自西方的关注——比较研究

如果把随社会主义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那么，汇入这条大河的无数涓涓小溪中，有一部分的发源地并不是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东方国家，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转的西方社会。

不应该低估这些小溪流的能量。自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大辩论以来，虽经栉风沐雨，星移斗换，西方的学者并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的观察。他们懂得，简单化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这一现实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搜罗更多的事实才能证明他们那个世界更“合理”，他们要寻觅解决资本主义世界弊端的对策，包括从社会主义经济中得到启发与借鉴，他

们当然也就更多地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把注意力置于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运行：不仅研究苏联，也解剖南斯拉夫，不仅考察匈牙利，也分析中国，并且把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作比较。这就形成了经济学中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比较经济学。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它又逐步生长出两个亚分支。一个分支是比较经济制度学，它以不同的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另一个分支是比较应用经济学，它以不同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的某些领域，如工业、农业、外贸、财政、金融等等，为研究对象。

不可否认，由于世界观和研究条件限制，比较经济学学说中存在谬误。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对于人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选择改革的途径与目标模式，又不乏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且不论即使是谬误也能开拓思路，更不谈比较研究有助于扩大视野，仅就比较经济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而言，他们的学说也不可能没有真见灼识。

美国学者莫里斯·伯恩斯坦曾对比较经济制度学的方法和范围作过精辟总结。他指出，经济制度是指参加经济活动的各个组织，按照一定规则和命令，在商品与劳务的生产、分配和利用等方面的相互作用。它可以被看作一整套的安排。依靠这种安

排，一个社会决定应当生产什么，如何进行生产和如何分配生产成果。

那么，应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经济制度研究和比较呢？伯恩斯坦认为，对影响经济制度的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状况等，都必须了解，目的是研究经济制度的性质和运行状况。这种研究的范围，涉及各种经济组织的构成，相互作用，指示其行动的命令和规则，影响这些组织对这些命令和规则作出反应的动机等。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步骤可概括为以下几个相互独立又存在内在联系的方面：

其一，解出某一制度的社会福利函数，即社会对于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的实际的和总的偏好。解法分为两步：第一步，考察决定这一偏好的各种机制——市场机制、政治程序机制、长官意志机制，分析每一机制对决定社会福利函数的作用程度。第二步，对于在某种类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下，经济政策的目标与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设立的机构和手段的结合所造成的社会偏好，进行研究比较。

其二，弄清某一制度的经济机构和手段。经济机构是指为进行生产和分配所作的比较根本的组织安排，包括企业、家庭、市场、银行、工会及政府。

机关等。它们通常由法律决定，不象经济手段那样变动。在此，伯恩斯坦强调，按所有制来区别经济机构，不如按资源配置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更具有理论意义。

其三，揭示由于经济机构和经济手段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某一制度特有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式。这可以从集权与分权、命令与交易、计划和市场三种角度来考察。

最后，在从实证角度对某一制度作了上述几方面研究之后，还必须以生产量水平、生产增长速度、生产的构成，一个时期内的效率、各个时期相比较的效率，稳定性、个人经济安全、公平、经济自由，按国家的经济结构能够令人满意的对外收支的情况，对于变化的适应性等标准，衡量其作为有机整体的运行结果，并按照社会福利函数的要求来判断其优劣。而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考虑对策。

由此向外延伸，伯恩斯坦还论及了比较应用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围。他认为，这一分支研究和比较经济活动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部份，因此，它与比较经济制度学的研究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一方面，它要求研究者对整个经济制度的概貌胸有成竹，因为经济的某一领域的特点由整个制度

决定。另一方面，它又使人们加深对经济制度的总体了解。

诚然，比较经济学者的研究方法不可能划一。例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E. 纽伯格就创立了一种名曰MID的方法。M指决策动力，I指决策信息，D指由决策权归属所决定的决策结构，它包括决策权由谁掌握，和以什么样的机制来协调几个决策者的决策这样二个因素。纽伯格主张从M、I、D三个方面来考察经济体制，并根据它们在这三方面的异同对经济体制进行比较和分类。

不过，从根本上来说，MID方法并没有脱离伯恩斯坦归纳的方法的基本轨迹。它只不过是运用了系统论和控制论语言而已。

这样，尽管比较经济学者不同于马克思注重研究生产关系本质的科学传统，但是，就注重实证分析，从影响经济制度的综合因素和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入手展开研究这方面而言，与《资本论》并无原则分歧。因此，虽然由于比较经济学者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给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材料和研究成果，常给人隔靴搔痒之感，连劳·雷诺兹、莫·伯恩斯坦、伊·纽伯格、艾伦·A·布朗、R.W.戴维斯、阿·格鲁奇，J. 准京斯基、D. 格兰尼克、B.沃德、A.诺维等名家也难

幸免，但他们对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优点的肯定和弊病的批判，对已经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分析，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塑造，仍不失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寻求改革的较好过渡途径和目标模式的思想材料。

8-2 “苏联型经济”能使资源配置有效率吗？

西方比较经济学者把苏联经济视为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典型样本来进行研究。这不仅因为它在很长时间内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本，还因为相对其他同样体制的国家来说，它比较成熟。

那么，在他们眼里，这类经济是怎么运行的呢？

“利用极权主义去完成迅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任务”。①这是他们对苏联型经济所作的高度概括。具体的描绘，则从以下几个特征入手：

第一，苏联型经济的社会福利函数不是由市场机制或政治程序机制决定的，而是由长官意志机制

① L.W.坎普比尔：《苏联型经济：成就和变化》，波士顿1974年版，第9页。

决定的。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由于计划主宰苏联型经济的一切运行活动，因此，计划目标就是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好反映。在苏联，这个目标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因为价格只是制定和监督计划实现的核算工具，它并不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反映消费者偏好，也不影响计划的形成。这个目标同样也不是由政治程序，如民主投票选举决定的，因为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对计划目标的讨论，只限于让代表明白既定目标的意义，以便在此基础上为实现目标而奋斗，而不是让代表们自行构造目标或修正既定目标。事实上，有关经济活动的目标是由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作出的，所以，决定目标——社会偏好函数的机制是长官意志机制。

当然，由长官意志机制决定的社会偏好函数，不一定不反映广大劳动者的意志。它的毛病在于，一旦出现了长官意志违背百姓利益的局面时，经济中没有纠正装置。

第二，苏联型经济的经济机构（组织）大多是受纵向控制的行政附属型机构，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主要是行政手段。

膺服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力量，苏联型经济的经济细胞同样是无数的工农业、商业、运输、建筑、

服务业企业以及各种财政金融机构和教科文机构。它们虽然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但在经济活动中，却不过是中枢神经系统——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各部门或地方分支机构——的行政附属物。与此相应的，是这一中枢神经系统以行政手段、计划指令来指挥和调节这些经济细胞的运动。

当然，西方学者并不排除苏联型经济中存在少数不受纵向行政控制的经济细胞，如能自主决策劳动力供给和个人收入支配方式的劳动者家庭；农业中在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领域中活动的农户等等。由于没有对政府机构的行政隶属关系，它们不受行政手段干预，而在更大程度上受商品生产规律支配。不过，他们又认为，这些细胞的活动对整个经济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苏联型经济的运行格局，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类细胞的属性和行为规范。

第三，苏联型经济的资源配置方法和收入分配方式是集中的、命令式的、计划的，而不是分权的、交易的、市场的。

许多西方比较经济学者都注意到，在苏联型经济中，企业的投入和产出都由主管部门的计划来决定，产品由国家按计划收购，投资决策更是掌握在各级政府机构手里。企业没有自主权，也没有横向

的经济联系，哪怕功能相同或具有投入产出关系，要进行经济交往，就要通过政府机构中介。价格既不反映供给，也与需求无关，仅仅只起核算作用。因此，整个国民经济实际上就象一座巨型的工厂，资源配置完全采取实物型的自上而下的方式。

至于收入分配方式，当然与资源配置相吻合，也是集中的，计划的和命令式的。职工的工资等级和企业的工资计划由各级主管部门乃至中央机构确定，唯一起刺激作用的与指标完成度挂钩的奖励基金也是垂直决定的：指标由政府主管机构给定，提奖比例也由政府确定，它们显然与市场无关。

此外，与存在非行政附属物的经济细胞相对应，苏联型经济中也有小部份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市场调节，如官方允许的农副产品集市贸易和非法的“第二职业”、“黑市”与“灰市”交易等。一些西方学者对这些并不足以影响全局的经济活动也进行了考察。

根据上述三方面基本特征，比较经济学者们对苏联型经济，主要是苏联经济，展开了更为细致的分门别类的研究。他们把触角伸进了经济计划体制及其运转状况、劳动力就业、经济增长、工业组织与管理、农业、外贸等等众多的领域，从不同侧面探索了苏联型经济的具体运行状况，总结了它的优

点和弊端。概括起来看，这些优点和弊端又是以上述三个基本特征为生长点的。

优点——长官意志机制使苏联型经济有明确的和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目标。行政性的经济组织和集中计划管理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式，则保证了迅速集中调配资源以完成经济目标。

以苏联为例。不少西方学者指出，苏联在二十年代末通过长官意志机制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迅速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和加强国防。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则使它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这一目标。在长时期内，它以政府强制的力量维持了高投资低消费的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并把投资重点恒定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从而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建设了与美国相当的国防力量。① 它以指令性指标平衡了紧张的投入品需求，又以棘轮战术（产出指标每年按一定比例递增）强使企业提高产出，从而保证了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从1913年到196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60倍，年均增长率约达8.2%。此外，它还以能够迅速集中调动大量资源的优势，保证了一些计划者认为居于高度优先顺序的投资项目的完成（如火箭地球卫星

① 资料可参见阿·诺曼奇《比较经济制度》第十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的发射），保证了从先进国家引进的最先进技术的快速推广和一些急需的科技项目的开发。

苏联型体制能迅速集中资源并作出具有高度选择性的配置的优势，在经济目标发生变化时也体现出来。近些年来，苏联领导阶层认识到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修正了生产计划和投资计划，其后果在较短时间内就显示出来。苏联农业生产结束长期徘徊不前后开始增长，轻工业增长速度加快，人民生活也有显著的改善。

缺点——或许难以避免感情色彩，在挑剔这一类型经济体制的弊端时，西方学者无一不是毫不留情。指责长官意志机制决定经济目标是践踏民主的人有之，批评高投资，低消费损害百姓，尤其是农民利益的人也有之。而更多的责难则集中于效益问题。

西方学者认为，苏联的高速增长是以资源浪费为代价的，苏联型经济不可能有高效率，原因又在于经济管理体制的上述三个特征。其一，长官意志一旦失误，除了自我修正外无其他校正机制，而由于认识能力有限，不发生错误又几乎不可能。苏联经济结构不合理，过多资源投入军事工业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慢，均与长官意志出现偏差有关；其

二，高度集中管理系统过于庞大复杂，这使苏联在避免了市场供求波动与经济周期循环带来的损失的同时，背上了庞大的计划管理费用的包袱。与此同时，由于计划技术尚不够发达，信息处理和反馈存在时滞与扭曲，行政机构的官僚主义与办事效率低下，一方面使计划难以与经济运行现实吻合，导致资源配置出错，短缺与积压在经济中并存，另一方面使计划经常变更，导致企业无所适从，管理难度提高；其三，企业成为被人摆布的棋子，缺乏提高微观效益的积极性与条件。为完成棘轮性的指标，企业向计划机构讨价还价，一方面力求压低产出指标，另一方面追逐高投入计划和投资。这使整个经济经常处于"紧张"——总需求压力大于总供给——状态。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少了创新和提高效益的外部竞争压力。

由此得出的推论是，苏联型经济的优点，在处于工业发展时期，资源比较丰富但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国家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一旦随工业发展，经济系统日益复杂庞大，资源被充分动员以致出现瓶颈，它的缺点就日益明显而优势却日益消失。这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受资源约束而下降，从而迫使人们把经济发展方式从外延扩张转向提高生产集约化程度和资金产出率方面。而这在原有的高度集

中计划管理体制下是难以办到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了。

因此，从总体上来说，西方学者对苏联型经济体制持批评态度。除了“新左派”等少数学者恪守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生产的经典教义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运用市场机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都表示肯定和赞赏。

8-3 伊利里亚

虽然苏联型经济管理体制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过，但是，各国改革的步伐却不是整齐划一的。西方学者在肯定和赞赏改革的同时，自然也会对各国改革作不同评价。例如，对苏联步幅不大，以后又走了回头路的改革，许多人表示失望。对匈牙利准备充分，步骤稳妥，对传统体制触动较大的改革，虽也有微词者，但大多数人还是褒胜于贬的。最有意思的，是西方学者对最彻底抛弃集中管理体制的南斯拉夫经济的态度。有人高唱赞歌，有人大加鞭挞，也有人毁誉参半。而其中不乏富有启迪性的思想。

最早完整勾画南斯拉夫经济运行的西方学者，

大概可推美国人本杰明·沃德了。早在五十年代，他就以经济学家的职业敏感，察觉南斯拉夫“自治模式”是一脉有开采价值的金矿。他辛勤地挖掘，高兴地收获——从中提炼出了一个完全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机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型：“伊利里亚”模型。

沃德设定：在伊利里亚经济中，生产资料由国家所有，占有和使用权则交给企业。企业向国家上交等于资金稀缺性价格或租金的收入。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仅起监察人和仲裁者的作用。经济活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

在这一前提下，企业具有苏联型经济所缺乏的两个主要特征：

1．企业目标是人均收入极大化

在“伊利里亚”经济中，工人委员会是企业活动的最终和最高决策者。而在个人物质利益驱动下，工人又以获得尽可能大量的个人收入——也就是企业净收入扣除上交国家份额后摊配到每个人身上的工资与利润——为劳动目标。因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均收入极大化是企业活动的终极目标。

2．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对国家来说，企业除了交纳资金使用费外，无其他权利和义务。因此，它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它是

否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商品生产者，能否在市场经营中得心应手，取得可观的利润。

从上述假定出发，沃德娴熟地运用微观经济学工具，描绘了伊利里亚企业的投入产出行为规则。他指出，在只考虑一种可变投入要素——劳动（x）；并且劳动是同质的，工资成本由社会统一规定的条件下，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y = f(x) \qquad (1)$$

（y—产量，x—工人人数）

这时，每个工人的收入为：

$$U = \frac{PY}{X} \qquad (2)$$

（U—人均产品收入，P—价格）

每个工人的平均成本为：

$$K = W + \frac{R}{X} \qquad (3)$$

（K—人均成本，R—租金，W—人均工资）

U与K的差是每个工人的平均利润，使这个差极大是企业实现人均收入极大化目标的要求。而差极大化又要求U和K的斜率相等，即每一工人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时，人均利润才能极大。

显然，沃德认为，伊利里亚企业遵循的行为规则，同样受西方经济学揭示的市场规律制约。但是，沃德又注意到了所有制和企业组织结构不同所赋予它的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行为规则的特殊性。运

用数学和文字工具，把一种可变投入推广到两种可变投入的场合，沃德得出了以下几个十分重要的结论：

其一，在竞争条件下，伊利里亚的市场能实现稳定，但是，虽然企业产量随固定资金使用成本（即R）按同一方向变化，它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却不象资本主义企业是同样的，而是逆向的。当然，价格上升使产量缩小的最低限，一般不低于平均产出等于边际产出时的产出水平。

其二，对资本主义企业来说，只要增加劳动力带来的边际收入，高于因之而增的边际成本，资本家便乐于增雇工人。伊利里亚企业却不然。只有在边际劳动力带来的收入不仅高于因使用他而增加的边际成本，并且使连同他本人在内的人均利润不致于减少时，他才能指望就业。因此，当两类企业处于市场条件与资金占用相同的条件下，伊利里亚企业相对少用劳动力，产出量也较低。

其三，在存在垄断的环境中，伊利里亚企业也具有上述行为规则。换言之，只要有牟取利润的可能性，伊利里亚垄断者将比资本主义的垄断者生产得更少些，价格定得更高些。

以这些结论为出发点，沃德进一步分析了伊利里亚经济其他方面的运行状况，并提出了一些对策

性意见。

关于投资，沃德指出，在长期调整中，伊利里亚企业会把生产规模调整到长期平均成本达到最低点的最佳水平，市场价格也能达到均衡。但是，在此之后，如果价格又突然上涨，它不会象资本主义企业那样继续沿着边际成本曲线增加产量。

与此同时，伊利里亚企业一方面倾向于在投资中提高固定资产比例，以相对减少用工人数提高人均收入。另一方面，因劳动力流动而加剧的工人漠视企业长远发展的倾向，有可能发展为变卖已有资产以增加短期收入，和加快固定资产帐面贬值速度以减少资金付费等行为。

这一切都不利于资源配置。为此，沃德强调，分散投资是伊利里亚经济的潜在薄弱环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国家直接掌握部份投资和对分散投资进行必要调节。这与布鲁斯在分权模式中提出的类似意见可谓是“异途同归”了。

由投资问题沃德引伸出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他认为，为了打破垄断，伊利里亚经济中除了由国家兴办新企业外，还应允许企业或个人以发行债券方式集资创办企业。这和允许银行贷款收取利息是一回事。只不过为了保证伊利里亚原则的永存，国家或企业或个人都不能以创办者的身份成为当然的企业

管理者，新建企业的主宰仍应是工人委员会。至于企业的退出，沃德则从优胜劣汰的角度肯定了它的必要性。不过他指出，退出不一定取破产形式，工人发现有效工资下降而流向其他企业就足以构成退出。

沃德接着讨论了与投资相对应的劳动市场问题。他认为，就工资差别能调节劳动力合理流动而言，伊利里亚企业本身应该有权规定工资差别。但是，人们将遇到拦路虎。低工资工种工人与高工资工种工人的收入攀比，阻碍收入差别的合理拉开。而要赶走拦路虎，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国家应负起调节劳动市场的责任，调节则可采取这样的方法：根据不同种类劳动力供求现状和供求弹性，为其规定不同的等级合同工资，并在追踪供求变动状况的基础上，调整等级差距。如果非熟练劳动供给长期过剩，国家还应规定工资最低限。

随后，沃德把视野从微观转向宏观。他从伊利里亚体制的特征和企业行为规则出发，给出了一个最简化的宏观模型：

$$W = P^0 Y'^0 \qquad (1)$$

（W—货币工资率，P^0—国家规定的产品平衡价格，Y'^0—边际实物产品的平衡值）

$$W = \overline{W} \qquad (2)$$

（$\overline{W}$—国家工资政策规定的货币工资率）

$$Y = Y(X) \qquad (3)$$

（X—就业量；Y—产出，$Y' > 0 Y'' < 0$）

$$MK = P^0 Y^0 \qquad (4)$$

（M—货币发行量；K—收入速度的反商，假定为常数）

$$PY'X = PY - R \qquad (5)$$

（R—固定资产使用付费）

把（2）代入（1），这一模型转化为含有三个未知数P、Y、X和三个参数M、W、R的方程组。

沃德指出，三个变量与参数M同方向变化，也就是说当货币数量增加时，物价、产出与就业都可能增加。然而，虽然参数W的变化就方程（1）看，似乎应有Y和X的同方向变化相伴随，但是，由于单就方程（4）看，在M既定时，Y和P必定朝相反方向运动，而方程（1）又规定了W增加时，P必定不下降，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伴随货币工资率增加的是价格P上升，产出Y减少。因此，要使货币政策直接有效地影响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最好使货币工资率保持不变。

至于参数R，由于方程（5）可变化为

$\frac{R}{P} = Y - Y'K$（且$Y'K = \frac{d(Y - Y'K)}{dx}$），R既定，P和（$Y - Y'K$）朝相反方向变化，而（4）式又规定了P和Y的反向运动，因此，假定M既定，如果R增加，Y也增加。然而，从（4）式看，这将

引起P下降，但（5）式中的（Y－Y′K）的增加又不足以补偿P下降的损失，结果，从相对的角度看，R的变化导致价格同方向变化而产出反方向变化。当然，如果货币量M也变化，而（5）式保持了平衡，即Y的变化相对地大于P，这时，产出将与R同方向变化，而价格却呈反方向运动。

由此，沃德得出这样的政策结论：由于货币量变化使产量变动高于价格变动，货币政策可以作为有力的宏观调节工具。同时，当进入边际产出迅速下降，供给增长日趋缓慢的阶段时，要谨防参数作用发生逆变。这时，货币量再增可能引起产出减少，而固定资产付费增加却可能诱使产出上升。

综上所述，沃德虽然指出了以南斯拉夫为雏型的伊利里亚体制存在的问题，但他对这一体制是肯定的、赞赏的。基于这一根本立场，他当然想弥补这一体制的不足，故而有上述种种对策。而这些对策的立足点，就是南斯拉夫现实经济中缺乏的国家的宏观调节。这显然是沃德的高明之处。为此，在结束对伊利里亚模式的描述时，沃德还专门讨论了宏观调节的依据——由政治程序决定的经济目标与计划，和宏观调节的工具——财政、金融等政策与手段。

尽管沃德在《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对伊利里亚模式的描述有过于依赖数理推论而绝对化，过于

抽象而简单化之缺陷，但他以资源配置为中心，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开拓性工作，为大多数学者肯定。不少人引用沃德的分析，也有一些人则步沃德后尘继续研究南斯拉夫经济。结果，又出现了不同于沃德的分析与结论。

捷克学者杰·范尼克以“工人参加管理的经济”为名，也对南斯拉夫经济的运行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他对这一经济的评价不同于沃德。他不仅批评沃德对这一经济存在的缺陷的分析武断且欠科学，而且，在肯定沃德所陈述的种种优点的同时，又提出了沃德所没有谈及的许多长处。例如，工人为了便于参加决策，使企业规模小型化，在价格上涨时不愿增人增产的行为规则则强化这一倾向，这就保证了市场的充分竞争；劳资矛盾和管理者与管理者的冲突消失，使罢工和其他摩擦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工资成本推进通货膨胀的压力得以减轻；工人委员会比资本家更注意消除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更注意为工人提供福利和劳动保护与劳动力培训；等等。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南斯拉夫经济体制优于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体制。

与此同时，有人走向另一极端而持与范尼克截然不同的评价。例如，在英国学者J·R·沙克尔顿眼里，南斯拉夫经济绝不象范尼克描写的那样和

谐和有序，相反，它处处充满矛盾和混乱。沙克尔顿几乎是逐条逐句地反驳了范尼克历数的优点。例如，其一，垄断产生并不在于企业规模大小，而在于供给是否有弹性和企业能否灵活地进入或退出，南斯拉夫经济恰是供给缺乏弹性，因此市场不能保证有效竞争；其二，沃德所说相对排斥工人倾向确实存在，用类似资本主义的宏观政策也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相反，它不能刺激供给增加却会导致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其三，工人委员并不会自觉去消除外部不经济，因为它也只考虑小团体利益。而提高福利与劳动保护等，恰又成为成本推进通货膨胀的动因之一；等等。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缺乏国家干预，工人管理的经济不仅保留了市场经济的一切通病，而且还会患它自己特有的毛病，因而，它可能运行得比资本主义经济更糟。

8-4 “可行的社会主义”

有的比较经济学者把注意力转向塑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改革的“谋士”。在这方面，亚历克·诺维可称得上典型代表。

1915年，诺维在俄国彼得堡一个孟什维克党人家呱呱坠地，命运之神却使他在英国度过了一生。或许出于对故土的留恋，或许出于对自己民族命运的关心，诺维把毕生精力投掷于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是苏联经济的研究。他在1983年退休之时，又在等身著作上加了一本《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这本著作不仅集聚了几十年研究成果中的精华，而且在汇总散见于以前其他著作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怎么运行的规范性意见的基础上，描述了诺维心目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主义。

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它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所有制和组织结构。

诺维认为，社会分工不仅使企业生产内容不同，并且使各种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与外部效应也存在巨大差异，这就要求产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而这一多样化又要求所有制结构相应多元化。为此，他设想应该有这样几类企业：（1）国营企业——存在于银行、钢铁、电力、重化、能源等行业中，规模庞大，并有垄断性。所有权和经营权均归国家，理由在于：这类企业外部效应大，国家集中经营管理，可避免市场波动，有利于国计民生。与此同时，企业数量少也便于国家集中管理；（2）

国有企业——存在于一般行业中，规模较大。国家所有，经营权则由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及其聘用的经理掌握；（3）合作企业——存在于一般行业中，规模较小。集体所有，工人委员会及经理掌握决策权；（4）私人企业——私人或少数人合伙所有，经营决策完全自主。允许雇工。社会通过法令监督其经营活动，限制其非法致富；（5）个体经营——私人所有，规模较小，不雇工。

在这样的多元化的所有制与生产组织结构中，经济活动由计划和市场双管齐下进行调节。计划调节由中央掌握，职责范围包括：决定投资与消费及其他相关的宏观经济比例；决策中央投资的方向，调节企业的分散性投资；经营国营企业，为其他企业设立行为规范和完善市场机制；干预对外经济活动；限制企业生产的外部负效应，扩大其正效应；管理非盈利部门；调节企业或个人收入过于悬殊的差别；等等。至于市场调节，诺维认为它并不是与计划调节各管一席之地，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为此，他充分肯定消费者偏好约束企业产出决策的意义，认为这是一种给劳动者带来的收益超过政治民主的经济民主。此外，他还在肯定非国营企业应拥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价格控制问题。他认为，在可行的社会主义体制

中，大部份产品价格应随行就市，因为国家没有能力控制好价格，反而会使之丧失正常的调节供求之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又不能完全放任自流，对少数产品，尤其是国营企业产品的价格，还是要加以控制。

按照一般惯例，至此为此，诺维似乎已把他设计的理想体制和盘端出而可以搁笔了。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诺维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一再强调，他的理想体制不是一个绝对和谐，没有矛盾的“最优”模式。因为“最优”在理论上可以实现，成为实际却无可能，去构想这样一个乌托邦又有什么意思呢？诺维的目标是要奉献给人们一个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运行起来又比高度集中或完全分散的体制效益更好一些，并且确实可成为现实的经济体制的设计图。而为了这一目的，他既要承认他的设计图中有矛盾，只能是“次优”，又要揭示矛盾，尽量给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使之真正成为“次优”。因此，他继续讨论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诺维认为，他的体制中，同样可能存在匈牙利学者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中所提出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因此，国家应该设立相应的规则与程序，考察企业经营失误原因，针对不同情

况加以处罚。一般来讲，合作或私人企业应自己咽下经营失误的苦果，对国营企业则需区别对待。如果因价格政策出现亏损，国家应予补贴，否则企业也必须引咎自责。当然，这样做会遇到两个技术困难，其一，国家如何辨清企业亏损是因为价格偏离还是其他原因？量上的测算很困难。其二，工人自治的企业，失误的责任由谁承担？经理？工人委员会或工人？这也难以确认。

不过，遗憾的是，诺维提出了困难，却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当然，如果他是想给愿意按他的设计图建立社会主义的人，留出更大的制定具体政策的自由度的话，这倒又是他的聪明之处了。

第二，诺维在收入政策和劳动力流动问题上着墨不少。他指出，在可行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收入分配中，会产生两大矛盾。一是企业之间收入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将起因于经营条件、国家收入政策、劳动力供求差异等非按劳分配因素。因此，收入差别过于悬殊，会引起公众愤懑。二是企业追求每个成员的收入增长和相互攀比，会引致通货膨胀。解决矛盾的途径在于：国家制定正确的收入政策，以在控制总收入水平的同时，调整过于悬殊的收入差别。调整的依据则为：随生产发展而变化的工人一般生活标准，各种劳动力稀缺程度，和社

会对收入差别的容忍程度。

第三，诺维坦率地承认，从逻辑上推论，沃德等人早就提出的供给缺乏弹性，用工量相对收敛和忽视长远发展利益等伊利里亚企业行为的缺陷，在他的体制中也存在。因为国有和合作企业也是“自治”企业，且又占较高比重。

但是，与沃德、沙克尔顿等人不同的是，他并不把这些缺陷看得很严重。他认为，沃德的结论只适于局部均衡。从市场整体看，上述行为的兑现程度是有限的。因为如果企业考虑争夺市场份额；如果企业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增或部分生产能力闲置状态；如果工人委员会迫使经理不解雇伙伴；如果边际工人的收入与成本难以计算，那么，企业在市场价格上涨时会增人增产。当然，在证明缺陷不严重的同时，诺维也明白，这不等于缺陷不存在。因此，他同时又提出了对策。对于供给缺乏弹性和用工收敛，他主张，国家以直接投资，鼓励企业投资，消除资金、劳动力流动阻碍和提供信息服务等手段，为企业进入和退出创造条件，以形成争夺市场份额的压力；划小企业内部核算与管理单位，便于工人监督工人委员会；国家根据企业用工人数确定与净收入无关的工资率，适量的奖金则以利润为基础；等等。对于忽视长远发展利益，诺维则提出

了这样的校正方案：对工人发放与本企业工龄长短相关，又与本企业长期利润水平（或资产增减水平）相联系的奖金；或采用类似西班牙蒙德雷根（mondragon）公司所用的方法，即向工人发放本公司股票，工人离开企业时股票偿还价值与工龄长短及企业利润增量挂钩。

第四，诺维强调，自治只提供了克服管理与被管理阶层之间的矛盾的组织形式，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矛盾。因此，坚持政治民主化仍然是必要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应该使企业与劳动者真正能够独立决策经济活动，通过市场选择实现经济民主，以减少国家机构强奸民意的可能性；同时，保持企业小型化，减少工人参加决策的困难，以防止少数人操纵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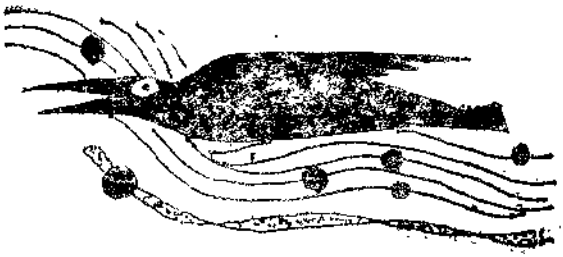
最后，诺维还论及了投资、外贸、物质利益关系和稀缺资源的配置等方面的问题。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可行的社会主义”与布鲁斯分权模式有同工异曲之妙。诺维更多地考虑了劳动者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并把它与引进市场机制联系在一起；诺维更多地着眼于这一体制运行的现实性，因而在设计上更具体，更灵活，更具有可操作性；诺维更坦率地承认他的体制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并设想了对策等等，这都是布鲁斯

模式所缺乏的。但是，就试图有机结合计划与市场调节机制这点而言，两个模式在本质上又是相同的。并且在这里，诺维同样没有解决好“双重决策”标准相互矛盾的问题。例如，诺维同样主张国家直接控制与产业结构变动有关的投资，间接调节由企业进行的创新与短期调整生产的投资，结果，不仅要遭遇到布鲁斯没有解答的决策标准矛盾的问题，而且与诺维自己提出的允许任何法人创办新企业，以弥补企业供给弹性小之缺陷的方案，也发生了冲突。

当然，如果把诺维的“可行的社会主义”体制和苏联、东欧学者们设计的改革的其他目标模式相比较，我们还会得出另外的各种各样的发人深思的结论。

因此，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既然西方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丰富了自己的学说，那么，我们通过比较西方学者和社会主义国家学者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分析与评价，不也同样可以发掘出对中国改革有价值的东西吗？所以，跟踪西方比较经济学的发展动态，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结　束　语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

前面所描述的，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与实践的画卷中，富有代表性的杰作，因其线条独特，构图奇妙，色彩绚丽，倍给人们启迪，因而加以一一述要。而对东欧其他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其它西方学者的评议，因较少特色，本书就从略了。

从上述杰作中，读者不难看到，尽管它们囿于各国国情差异而色彩不同，但底色都没有离开“适合商品经济发展”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的改革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上面描述的一切，归根到底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即为同样顺应历史规律而进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提供借鉴材料，使中国人能在同样的底色上，画出一个最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运行模式。

前面介绍的社会主义各国与我们毕竟同属社会

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相同，发展道路大致一样，他们在改革中走过的曲折的道路，面临的经济矛盾也原则上相同，如上面提及的波兰三次改革，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改革，南斯拉夫的自治运动，苏联六十年代的利别尔曼改革，以及1968年以来的匈牙利改革，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共同问题和普遍行之有效的对策。在苏联、东欧国家改革中出现的理论学说，即本书前面介绍的各种著名学者或经济学流派的思想，也包含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与改革进程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

但是，苏联、东欧各国的实践经验和各种理论，都不能生吞活剥地硬搬到中国的实践中来，因为中国有特殊的国情。中国在改革画卷上涂抹的必将是从自己国情出发的另一种特殊构图和色彩的画面，而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每一个中国人，实际上将在被动地受制于国情或自觉地认识国情并对它加以改造的条件下，来充当涂抹这一画面的绘画人。但是，如果有更多的中国人属于后者，那么可以肯定，中国的画面将比苏联、东欧的改革画面更加绚丽壮美。朋友们，让我们大家都来加入后者的行列吧！